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學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2020.3

2020年9月 第3期 (总第87期) 第22卷
Sept. 2020 No.3 Sum.87 Vol.22

報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收录期刊

二〇二〇年九月第三期(总第八十七期)第二十二卷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召开2020年教师节座谈会

徐彬院长出席并讲话

9月10日上午，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召开2020年教师节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云南省委主委、学院院长徐彬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学院党组书记蔡勇，常务副院长何云葵，党组成员、副院长杨春禄出席会议。

徐彬代表学院领导班子向全体教师表达了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并就如何建设一支政治坚定、师德高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提出要求。



徐彬指出，社院的教师，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师大时强调的，做“四有”好教师。一是有理想信念。作为政治学院的教师，要牢固树立理想信念，做好行为示范，将理想信念传递到学员身上。二是有道德情操。无论在教学期间、课余时间，还是家庭生活中，都应体现教师的道德模范作用，把修身作为第一要务。三是有扎实的学识。要正确处理变与不变的关系，变的是形势政策，不变的是基本理论，要跟上形势，就要有渊博的知识作为支撑。四是有仁爱之心。社院的学员很特殊，他们经历丰富、才华横溢，但师生之间要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尊重他们，也要正视自己的强项，永远保有自豪感和自信心。

徐彬要求，要按照《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要求指导工作。一是要有专业的学科。社院主要的专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面还有统战理论、新型政党理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打造的专业学科。二是要以政治共识教育为核心。社院教学与党校不同，最主要是突出政治共识教育，通过讲理论、讲故事、讲历史三种方式，把政治共识讲好。要使建言咨政、凝聚共识相互协调，双向发展。三是发挥云南中华文化学院作用。加强对外文化宣传和传播，文化认同是基础，能力素质培养是关键，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四是教师要按照《条例》要求自己。坚定信念，理论基础扎实，严守纪律、严谨治学、品德高尚、为人师表。

徐彬强调，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社院教师。一是要有责任担当，热爱和珍惜自己的岗位，有使命感、责任感。二是要发挥骨干教师的教学力量，发挥联系桥梁作用，做好开门办学，形成系统性的办学模式。三是要开展好科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提出的科研要多搞“集成”和“总装”，多搞“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要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研，通过一些固定、流动的调研点，形成一批结合现实的课题；四是要发挥联系学员、兼职教师的纽带作用。做好教研工作，当好辅导员，确保每一个班次的正常运转。

徐彬要求，社院要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切实关心关爱教师的成长，为他们打造平台，提供更多学习、进修、交流的机会，创造良好的教学生活条件。同时也要坚持用好教师的管理标准和评价指标严格要求，促进教师成长，不断推进社院教学科研发展。

会上，蔡勇同志宣读了《中共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关于表彰2020年度优秀教师先进个人的决定》，与会领导向受表彰教师颁发获奖证书，科研处、教研室5名教师结合教学科研工作作交流发言。学院各处（室）、教学服务中心负责人，科研处、教研室全体教师参加座谈会。

（责编：罗雷）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季刊·2020年第3期(总第87期)

本刊顾问

杨保建 徐 彬 高 峰 李玛琳 喻顶成
张宽寿 杨 洋 李学林 杨晓红

编辑委员会

主 任:蔡 勇

常务副主任:何云葵

副 主 任:陈友康 杨春禄 袁光兴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寅平 李从贤 杨松禄 钟瑞华

侯晓芳 诸 芳 黄 梅 谢灿坤

魏贵华

主 编:陈友康

执行主编:王寅平

副 主 编:杨松禄

编辑部

主 任:王寅平

副 主 任:杨松禄 罗 雷

责任编辑:马弋涵 念兴昌 李亚强 朱家麟

英文翻译:李志凌

封面设计:郭进华

编 务:刘林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目 次

● 统战理论与实践

-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研究 张 璐 (5)
- 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认同问题研究
——基于云南省玉溪市的实证分析 胡 伟 (14)
- 中华文化视阈下文化统战工作的三重逻辑 牟 娟 (26)

● 民族工作

- 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进程调查
——以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为例 闫韶华 (34)
- 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个案研究
——以丽江市为例 赵润华 (42)
- 和谐校园视阈下滇缅边境国门高校大学生民族交往调查
——以 D 学院为例 杨 楠 (49)
- 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策略研究 黄 敏, 余静芳 (59)

● 云南故事

- 再忆巧渡金沙江之战 弘扬新时代长征精神 刘林华 (64)
- 闻一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马弋涵 (71)
- 教育救国：追寻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 念兴昌 (79)

[期刊基本参数:CN53-1133/D*1999 *q*A4*120*zh*P*¥9.00*1000*15*2020-09]

为国而歌：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战斗青春 朱家麟 (89)

●历史与文化

滇菜菜名英译助力滇菜文化对外传播 王 齐 (96)

党恕轩迁居韩城的动因分析 刘国菊, 黄德海 (103)

●发展问题研究

风险社会视域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治理策略研究 仲昭慧 (109)

脱贫攻坚视阈下边疆民族地区传统乡村现代化路径研究

——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传统乡村为例 李亚强 (114)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以下简称本刊)刊发的文章,内容及观点均由文章署名作者自负文责,不代表本编辑部意见。本刊保有对来稿的编辑修改权,若不同意编辑修改,来稿时请特别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在论文发表后由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费中已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著作权使用费及论文的稿酬。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No.3, 2020

Content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the United Front

- A Study of the Organization of New Social Strata Members Zhang Lu(5)
- The Values Identification of Young Generations Concerning Non-public Economic Sector: An Empirical Study of Yuxi City in Yunnan Hu Wei(14)
- The Three-Dimensional Logic in the United Front's Culture-Themed Undertakings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Chinese Culture Mou Juan(26)

Ethnic Affairs

- A Survey on the Ethnic Minority Groups' Modernization in Xinjiang: A Case of City Tumxuk of the Third Division of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Yan Shaohua(34)
- Study of the Founding of a Demonstration Region of Ethnic Solidarity and Advancement in Yunnan: With Lijiang City as a Case Zhao Runhua(42)
- A Survey Geared by the Concept of Campus Harmony on Students' Cross-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Myanmar Bordering Colleges Yang Nan(49)
- Education Methods for the Marxist Outlook of Happiness of Left-behind Pupils of Ethnic Minorities Huang Min, She Jingfang(59)

Yunnan Stories

- Recalling the Battle at Jinshajiang River and Promoting the Long March Spirit in the New Era Liu Linhua(64)
- Chinese Intellectual Wen Yido and His Passion for the Homeland Ma Yihan(71)
- Carrying on and Promoting NSAU's Patriotism Nian Xingchang(79)
- Chanting for the Nation: People's Musician Nie Er and His Youth of Revolution Zhu Jialin(89)

History and Culture

-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ish Names as a Means of International Introduction of Yunnan Cousin Wang Qi(96)
-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on for Dang Shuxuan's Migration into Hancheng City ... Liu Guoju, Huang Dehai(103)

Development Studies

- Educational Approaches to People's Mental Development on Line in Higher-Education Institu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Society Zhong Zhaohui(109)
- Ways of Modernizing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Remote Regions Inhabited by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Campaig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ing at Yunnan Villages Li Yaqiang(114)

统战理论与实践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研究

张璐

(中共湘潭市委党校, 湖南湘潭 411100)

摘要: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变而出现产生, 四十多年来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一个关键举措就是将他们组织起来, 即实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目前,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多处于分散、无组织或组织性弱的状态。造成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是: 家底摸不清, 科学决策依据缺乏; 方式单一, 组织引导效果滞后; 各谋其政, 工作合力难成形; 力量薄弱, 主管部门自身存在问题。因此, 必须以“标准化”“社会化”为前提, 以“集约化”“精准化”为路径, 以“主体化”“再组织化”为保障, 做到精准施策, 提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发展水平。

关键词: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统战工作; 组织化; 再组织化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0)03-0005-09

2001年, 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首次提到“新的社会阶层”, 经过将近20年的发展,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这一群体的内涵和划分方式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和产业结构深刻变动而发生了巨大变化。2006年《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提出这一群体是统战工作新着力点。2015年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被单列为统战工作对象。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 发挥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对于如何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工作、引导其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有一个好办法, 就是组织起来。”^①这一重大科学论断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 提出了根本遵循。

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现状探究

中央统战部统计数据显示, 当前全国新社会阶层的规模为7200万人, 约占总人口的5%。其中, 民营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约4800万, 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约1400万, 自由职业人员约1100万, 新媒体从业人员约1000万, 由于各类群体间存在人员交叉现象, 因而, 上述数据直接加总多于7200万人。^②总体来看,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多处于分散、无组织或组织性较弱

基金项目: 河南省社会主义学院2019—2020年度研究课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研究”(HN20191206)。

作者简介: 张璐, 中共湘潭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

^① 人民网:《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2017年11月22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1122/c40531-29660676.html>, 2020年5月28日。

^② 新华网:《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7300万人》, 2017年1月6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06/c_129434180.htm, 2020年5月28日。

的状态。

(一) 质性研究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现状探究

质性研究即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角度出发,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的依据、机制等进行学理探讨,探究并归纳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机构、程度、特点等。

1. 从社会学的理论出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处于低组织化和非组织化状态

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及体制发生了巨大改变,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社会阶层的划分不再以地域、单位性质、户籍等单一标准为依据,一大批具备高知识高技能的人才进入“体制外”,进入社会的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引人关注的一股重要力量,并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虽然新的社会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呈现了一些共性特征,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新的社会阶层并不能算一个社会阶层,而是一个政治性概念。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一个群体,没有特定的组织机构,没有特定的制度供给,没有必需的组织关联。传统社会通过对“单位”“街道”“公司”进行组织化管理的做法,不适用于新的社会阶层。因此,在社会治理的视角下不同于相对固定的“单位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体制外的“原子化”的存在状态,是游离于“组织”的流动群体,社会流动性较强,组织化程度较低。

2. 从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实现组织化存在天然壁垒

一是依托市场和抵御资本的倾向并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的近1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他们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一方面,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发展的结果,其发展和壮大也紧紧依靠市场经济。没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业渠道不可能多样化,社会仍然流动缓慢,就不会出现原有单位制所不能覆盖的新的社会阶层这一新兴社会群体。同时,市场经济打破了政府对社会资源配置的绝对掌控权,新的社会阶层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从市场获得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各种资源。另一方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以党外知识分子为主,其生存和发展凭恃的是自身的知识技能,对资本有种天然的轻蔑,不屑于变成资本的奴隶和附庸,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如频繁更换职业等方式对资本加以抵御。

二是参与意识强烈和参与渠道不足的局面并存。新的社会阶层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他们希望获取与之相应的社会地位,渴望获得认同与尊重。而且知识分子的个性决定了他们对社会有一份责任感和使命感,对社会的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的呼声很高,他们期待能够独立自主地参与到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去,进而影响政治决策。所以,新的社会阶层的参与意识较为强烈,但是比起体制内人士以及有实力的非公经济人士来说,他们的参与是受限的,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明显不足。

三是观念多元化和组织离心化的状态并存。一方面,作为相对纯粹的“社会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维更加活跃、观念更加多元、人格更加独立、社会参与意识更加强烈。另一方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其他统战工作对象相比,其组织更呈现出来一种“离心化”的状态。所谓“离心化”指的是远离了“党的领导核心”和离散于“统战工作中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所处的各类组织,很多没有党组织覆盖,其管理权也分属党委及政府各个部门,造成了在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时候,没有形成大统战工作合力。

(二) 定量研究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现状探究

目前,从各方面工作实践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问卷调查、信息采集、归纳汇总掌握总体情况并进行数据分析得到了一些结果。笔者对湖南省内60家非公企业调研结果显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结构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表1 湖南省60家非公企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程度

组织结构分类	特征	数量(家)	百分比	组织化程度
行业性/专业性的新社会阶层组织	行业性/专业性、自组织	15	25%	较高
社会性的新社会阶层组织	社会性、自组织	11	18.3%	一般
统战性的新社会阶层组织	统战性、衍生性组织	19	31.7%	较高
党建性的新社会阶层组织	党建性、衍生性组织	3	5%	一般
行政性的新社会阶层组织	行政性、衍生性组织	12	20%	较高

1. 行业性/专业性的新社会阶层组织

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构成主体的行业性/专业性社团是他们的行业/专业组织,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状况、自身愿景、发展难题进行摸底和提供服务,这也包括行业内部产生的商业联合会、智力支乡会等群众自发组织,私营和外资企业、社会组织、中介组织、新媒体自媒体、自由职业的行业协会组织,如长沙市美术家协会、宁乡市新媒体协会、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等。行业性/专业性社团属于独立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自组织,但是目前存在面广量大、成员复杂、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2. 社会性的新社会阶层组织

社会性的新社会阶层组织属于自组织形式,主要分布在城市的楼宇、街区、园区、社区等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该类组织数量大、分布广,具有强烈的“社会人”属性和“体制外”特征,同时他们也有强烈的组织归属感,在自身领域和行业当中形成组织团体,如“两新组织”基础上成立的实践创新基地、公益平台等,联谊互助,开展系列活动。

3. 统战性的新社会阶层组织

统战性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是指由统战部门成立的相关的统战性社团,用以加强组织引导,如知联会、欧美同学会、海联会、留学归国人员联谊会等等。全国各省统战部都建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制度,注重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物色、联系、发现、培养、推荐等。在大统战格局下借助多方力量,由统战部门为主导形成的智库性、联谊性、网络性组织都应归为统战工作的衍生组织,属于统战性组织,如湖南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浏阳和·星公益、湖南长沙“百人会”、天心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等。

4. 党建性的新社会阶层组织

组织部门通过各级党组织吸收党员的形式和机制,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中党员的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人数最多、覆盖面最广的是“两新”组织党建组织,如湖南省湘潭市新的社会阶层联合会成立的党支部,融合了组织和统战工作。整体而言,湖南省内党建性的新社会阶层组织很少,全国比较有名的是北京市宋庄艺术家党支部、武汉“红色引擎工程”等,通过将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嵌入党建工作目标,以实现其组织化的目的。

5. 行政性的新社会阶层组织

司法部门、宣传部门、民政部门、税务部门、网信部门等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所在行业领域具有行政管理和服务的职能,履行组织引领并着手研究解决自身领域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成长发展问题的职责,属于行政性组织,如长沙市新媒体协会,就是在长沙市委网信办的指导下成立的。

此外还有依托各类中介组织等打造的“职工之家”“青年之家”等。^①

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问题析因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因为自身的显著特征呈现出低组织化和非组织化现状,虽然有一定的组织机构正在着力开展工作把他们组织起来做好思想政治引导,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天然的障碍和壁垒。

(一) 家底摸不清,科学决策依据缺乏

要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做包括组织起来在内的任何工作,摸清他们的底数,即掌握他们的人口特征、行业分布、流动情况、财产收入等方面的特点是基础。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以及利益诉求。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政策、开展措施,实现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化。然而,现实中要做到掌握社会阶层人士的底数是存在很大困难的,造成这个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组织归属,致使缺乏统一的底数统计依据、底数统计来源和底数统计频率。

1. 缺乏统一的底数统计依据

目前,我国是依据现今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从统一战线的实践角度,对我国的新的社会阶层进行分类的,即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分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四类群体,但学界并没有对这四类群体给出清晰的定义,也没有与定义相应的指标体系对四类人群进行区分和测量。^②因此,在缺乏统一的底数统计依据的情况下,很难摸清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数量、基本情况。

2. 缺乏统一的底数统计来源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流动性强,统战部门在对其进行摸底时往往依靠街道或者行业协会提供数据。这些数据大多是来自平时接触多的、容易找到的调查对象,比如和街道关系密切的民营企业、比较有影响力的行业协会、大型的社会组织和中介组织中的新的社会阶层。而那些自由职业者的数据少之又少,由于缺乏统一的底数统计来源,获取的数据是否全面甚至是否真实,都存在疑问。

3. 缺乏统一的底数统计方法

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摸底工作做得好的统战部门,可能每年进行一次摸底工作;工作做得不到位的,可能几年才进行一次,这就导致数据的时效性不足。数据更新明显滞后,导致无法达到对新的社会阶层底数的掌握要求。

(二) 方式单一,组织引导效果滞后

在体制控制力减弱、市场经济发展和新科技应用等多重因素合力作用下,愈来愈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把握自己命运”的“社会人”,单位体制的影响力慢慢变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呈现出人员数据不清、流动性大、组织管理难度大等问题,与此相对,存在着对这一群体进行组织引导的方式单一、手段不够等问题,导致了组织引导效果的滞后。

1. 各类型组织覆盖不广

各个类型组织覆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的广度不够,无法兼顾来源广泛、身份多元的整个群体。造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覆盖不广的原因可以从内外因两个角度分析。从内因来讲,整体来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加入组织的意愿和动力不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多是一批锐意进取,

^① 张彩云:《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的对策研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154—162页。

^② 李彦博:《准确掌握新的社会阶层底数:背景、问题及对策》,《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58页。

自信能凭借自身实力来保障生存和发展的人士，他们热爱自由，对于组织的认同度不高，不希望有组织的束缚。从外因来讲，能够覆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组织发育不充分。原来以单位作为核心的组织体系已经不能覆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了，而能够全面覆盖该群体的新的组织体系尚未发育形成，无论是在数量种类、组织结构、组织功能还是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很不成熟，无法实现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全组织覆盖。

2. 引导方式针对性不够

通过组织开展的政治培训、联谊活动、公益事业、群众活动等项目不多，针对性不够强。当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缺少独立组织活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缺乏组织活动所要具备的各项人力、物力、财力保障，所以难以有效开展各项活动。另外，各类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开展的活动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基本都有“同质化”的趋势，并未立足本组织以及组织成员的实际情况来开展，很难满足思想活跃多元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需求，致使活动效果差强人意。

（三）各谋其政，难以形成工作合力

1. “九龙治水”的管理困境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活跃在经济、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因为来源的广泛性，分属不同的部门进行管理和开展组织服务。当前，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主要由各级党委统战部门的新阶处负责，新的社会阶层组织登记管理则主要是由政府的工商、民政、科技、文化等部门负责，新的社会阶层协调服务又主要是由工商联负责。各个部门管理当中又存在一定的重叠和交叉，但是信息数据和管理资源并没有实现共建共享，没有达到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真正组织起来的目的，存在着九龙治水、各管一头的管理困境。

2. “两张皮”式组织建设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已覆盖的领域也存在党建和统战各自为政“两张皮”的情况，组织部门和统战部门各司其职，其他有关部门互不参与，造成了“小党建”“小统战”的局面。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即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数量不多、群体力量不大的时候，统战部门和组织部门的分工明确，统战部门负责做体制内党外代表人士的工作，组织部门负责做党员的工作，而一些群团组织负责承接党外代表人士及党员二者之外的工作对象，各基层党组织则负责托底。在新的社会阶层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加深，工作难度不断加大的今天，仍然沿用之前的工作思维和模式，必然造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中出现“真空和空白地带”，使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士基本不在党的工作可及的范围之内，严重影响了党的整体工作。

（四）力量薄弱，主管部门作用发挥不够

1. 对社会阶层人士的“组织起来”认识不足

新的社会阶层主管部门在思想上对于如何发挥组织作用团结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存在许多困惑。

一是许多基层党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员的责任意识不强、了解不够。许多基层党组织思想固化窄化，认为党建工作仅仅是组织工作，将统战工作以及群众工作放在不重要的位置，认为这两项任务与党建无关。作为党组织负责人，只知道要对组织工作负责，而常常容易忽视自己在统战工作上第一责任人的身份。党组织中的党员对《党章》中所规定的“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条必须履行的义务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多属于党外群众，没有积极主动去联系了解他们的状况，没有做好他们的团结引导工作。

二是统战部门也存在思想认识误区。统战部门的认识误区在于严格区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当中的党内人士和党外人士。他们认为统战工作只是针对党外人士开展工作，基层党组织来承担党

员工作,那就无法依托基层党组织,只能自己谋划打开工作新局面。除党外干部政治安排方面与组织部门有合作外,其他几乎无党建色彩,导致区域内许多群众只知有统战组织而不知有党组织。^①

三是许多与新的社会阶层密切相关的部门和单位党组织也忽视统战工作。把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仅仅作为口号喊一喊,行动上却很少做出有效的作为,对党组织和统战部门进行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配合不力。

2. 组织壁垒存在,党内党外界限比较生硬

一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严格区分中共党员和非中共党员作为是否作为团结服务引导的对象。只有非党员才能加入联谊组织,那些“两新”党组织及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党员则不能加入。二是各类党员组织受组织原则和传统意识影响,对本可以群众身份纳入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拒之门外。这样非常不利于党员发挥联系、团结、组织群众,做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职能和作用,不利于发挥组织作用团结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3. “两新”组织党组织发展不均衡、作用发挥效能不平衡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分布在“两新”组织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基本依托“两新”组织的党组织和工作力量来开展。虽然“两新”组织党建“两个覆盖”,即“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工作大幅推进,但还是存在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很多不稳定因素使得“两新”组织自身运转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变动频繁。因此,“两新”组织的情况很难被上级党组织和对应的监管单位全面掌握,党的工作覆盖跟不上。有的地方虽然党的组织覆盖率高,却并未发挥应有的功能。另外,社会组织对比非公企业,由于多种原因,如多头管理、很多权责关系不清,没有普遍树立抓党建抓管理的责任意识,在组织运转方面缺乏规范,工作队伍不齐,加大了组织建设和管理的难度等,造成“两个覆盖”率增长缓慢。

对“两新”党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指导性和规范性不够。“两新”党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相关政策,大多显得太过宏观或操作性不强,尤其是如何将党建与统战工作融合的思路非常模糊。由于没有统一明确的要求以及对相关政策精神又缺乏了解和把握,致使基层对于该如何落实政策、开展相关工作有着许多不解之处,非常需要对相关政策文件有规范性的指导。而实际情况恰恰是对于政策精神的解读普及不够,又没有一些可以复制的经验,无法满足基层对政策指导的需求。

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对策研究

(一)“标准化”“社会化”是组织起来的前提

1. 明确标准、摸清底数

一是要明确标准。要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明确定义,按照行业、职业、收入、地位等指标建立量化的指标体系对身份进行判断,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四个类别的群体及群体内部人员影响力进行评估,建立考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影响力的评估体系,从而针对性地制订组织引导的方式方法。二是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信息采集上要注重全面性和时效性。出于对统战对象实施大规模普查或者针对统战工作单独建立数据采集系统需要耗费大量成本,以及在内容上和现有的一些人口调查有重合的考虑,又综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职业和居住地上高流动性的影

^①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依托“两新”党组织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机制研究》,《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第56页。

响因素，在采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信息时，最为科学可行的方法是，依托已有的人口信息采集系统，依靠制度来保障信息的准确性、全面性和及时性。

2. 打破资源壁垒，实现资源共享

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打破资源壁垒，实现信息共享。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① 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各方力量都不能置身事外，必须具备高度的统战工作责任意识，积极参与，通力合作。首要的是必须打破党委和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信息资源壁垒，实现数据信息资源共享，才能全面精准掌握统战对象的基本情况，这是做好统战工作的基础条件。有关人口管理的部门都应将本部门数据库中涉及统战工作的指标对应的统计数据提供给统战工作部门。具体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那些涉及新的社会阶层的指标和影响力评估指标数据可以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调查摸底工作服务。

3. 推动各方融合，形成合力

组织部门和统战部门等各方力量在工作队伍、平台载体、方式方法、工作机制等各个方面的融合，促进“组织、队伍、阵地、方法”四位一体，共同实现组织、统战和群众工作多个目标。组织部门与统战部门紧密配合，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纳入党建体系，共同与相关政府部门形成统战工作合力，多层次多领域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加强联系服务引导。要不断创新，推进党建工作与统战工作融合，通过一定的方法来解决统战工作力量不足的问题。比如说聘任经验丰富的党建工作指导员兼任统战工作信息员。发挥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作用，促进党员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结。在阵地融合方面，以建立或利用原有的党建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公共服务平台等平台为基地，定期组织社团活动，开展各种学习，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接受服务有阵地。在工作方法上，以多样活泼、轻松有趣的方式，寓教育引导于潜移默化之中。各部门协同努力，共同促进党的组织工作、统战工作、群众工作不断向好推进，实现共赢。

4. 树立分层分类的组织运作思维，推动组织模式“社会化”

以基层党组织和统战性组织为依托，准确把握组织起来的科学内涵，有针对性地树立相互融合、分层分类的组织运作思维，以社会化、网络化的方向途径组织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巩固共同的政治基础。要以组织为基本依托，其中最重要的组织是基层党组织和统战性组织。党组织作为政治核心具备网络健全的优势，在将统战工作融入党建工作的实践中，可以尽可能地扩大统战工作的覆盖率。在一些目前没有成立党支部的“两新”组织中，可以通过明确“两新”组织中的专职管理人员兼任统战工作联络员，规定其工作任务和职责，建立起工作上的联系；也可以建立不在任何具体社会组织之内的联合支部。统战组织作为统战工作的重要力量，要以社会化的方式拓宽覆盖面。例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组织可以覆盖到省、市、区、县各个层级，也可以按照类别分别成立像企业管理技术人员联谊会、新媒体人员联谊会等。无论是何种组织方式，在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时，都必须用他们乐于接受的方式方法。工作内容上要紧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观情感和客观需求，工作形式上更适应他们的思维方式、工作环境和话语体系，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以真诚之心交流帮助，以责任之心服务引导，在实践活动中增强团结，进一步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① 习近平：《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统一论坛》2015年第6期，第4页。

(二)“集约化”“精准化”是组织起来的途径

1. 盘活存量,充分开发利用现有组织的力量

要充分开发利用现有组织的力量,特别是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自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政协组织、群团组织等枢纽组织载体的作用。政协组织要发挥大团结大联合的优势,进一步加强政协委员中在社会组织任职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团结联谊工作。群众团体和统战社团要创新完善组织方式、运行方式、活动方式,进一步激发组织活力,广泛吸纳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中新的社会阶层党外人士,发挥枢纽组织作用,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团结引导。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平台载体作用,拓宽团结联系渠道。同时,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中的群团组织建设和推动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强化“两新组织”党组织的引导功能,要从“两新组织”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关心的问题入手,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多形式、多层次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2. 创造增量,建立和完善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形式

要通过建立一些新兴的组织形式团结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根据行业、兴趣、地域等特点建立一些新社会组织,让他们自主选择对他们有吸引力的组织来加入。完善相关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多种政策措施,支持、鼓励、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立与自身实际情况和需求相符合的各式各样的团体类组织或行业协会。按照实体化、可视化、集约化的要求建设一批统战实践创新基地,充分发挥其创业培训、实践锻炼、综合服务、建言献策、公益服务等功能,使其成为团结凝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桥梁和纽带。在互联网时代,可借助大数据的力量,建立各种能够保持互动联系、互通信息优化、及时疏导情绪和提供帮助的线上的群众组织。

3. 精准探索,重点突破薄弱环节

以服务主动、功能全面的基层政府组织为依托,运用精准化治理方式,实现多元高效准确地解决突出问题。要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设置合理的目标管理评价指标,分类制定组织引导方式方法。针对民营和外资企业中的管理技术人员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地位较高,政治参与意识也较强的特点,应重点依靠政治类组织提升政治素质。针对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更加关注个人业务水平的提升、职业发展空间的扩展和相应薪酬福利的保障等方面的情况,要重点借助行业性/专业性社团组织加强日常联系沟通。针对新媒体从业人员在网络舆情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情况,要以他们所在企业或者社区中的党组织、群团组织或参与的各类社会组织为基础,线上线下共同发力,提高他们的政治意识。针对自由职业人员思想独立、相对分散的情况,可以借助基础性组织如社区、楼宇、街道等将他们逐步组织起来。

(三)“主体化”“再组织化”是组织起来的保障

1. 树立“头雁”,加强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这一群体在纵向和横向分布上都存在扁平化和离散性等特点,要将四类群体中具有代表性和标杆性的“头雁”式人物作为主体对象,纳入统战工作视野。

一是主动物色挖掘。在新的社会阶层中,有一些才能出众的“动员精英”通过影响被动员者之间的关系,影响着各类组织,尤其是自组织的网络结构、规范建立,以及资源流动和社会监督。这部分群体是统战部门需要特别关注的重点对象。统战部门应当积极作为,从中发现和挖掘自然涌现出来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代表性人物。

二是方向性培养选拔。通过政治引导和政治资源配置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代表性人物往代表人士方向培养,提升代表性人物的凝聚力和辐射面,从而加强这四类群体的组织化建设,更好地解决各个类型、各个层面的分散性和覆盖面问题。一方面要建立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

代表性人物的经常联系。通过积极有效方式联谊交友，落实列名联系制度，经常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代表性人物见面谈心、交流思想，在“两新”组织中建立联络员制度，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意见诉求，不断增进了解、理解和团结。另一方面要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代表性人物进行重点培养，使其成长为新的社会阶层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和示范性人物，乃至成为代表人士。通过他们以点带面联系、团结一批具有相似价值观的新的社会阶层精英人士。通过这些代表人士将长期分散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发挥相互帮助、相互引导的作用。

2. 搭建平台，实现“再组织化”

将处于“原子化”和非组织化状态的新的社会阶层进行重新组织、整合，即通过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搭建沟通平台，以便这一群体加强社会参与，这就是对新的社会阶层的再组织化。

一是通过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实施有效的措施鼓励新的社会阶层群体建立多类型的组织团体。统战部门要与其他部门一起，有意识地增加对一些新的社会阶层自组织的资源倾斜，帮助他们扩大宣传，让他们成为统战部门的工作抓手。鼓励尚在成长发育期的自组织向更成熟、更强的自组织形态学习借鉴，缩短自组织的成长过程，营造自组织之间相互支持、相互监督的长效发展氛围。

二是要打造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工作品牌和平台，促进新的社会阶层内部不同群体的交流活动。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工作是促进新的社会阶层事业、扩大新的社会阶层影响的重要增效剂。在以工作品牌和平台加强新的社会阶层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的过程中，增强他们的认同感、凝聚感和归属感，从而促进新的社会阶层再组织化。

三是要建立健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系机制促进新社会阶层的再组织化，使党委和政府决策“上传下达”落实到基层。基层在新的社会阶层再组织化过程中，有关部门应该将涉及到本部门的相关决策政策进行操作性解读，通过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立健全沟通机制，对基层分阶段分步骤地对新的社会阶层再组织化进行指导，保证党委和政府决策很好地落地。

责任编辑：念兴昌

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认同问题研究

——基于云南省玉溪市的实证分析

胡 伟

(玉溪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玉溪 653102)

摘 要: 年轻一代主导下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 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利益。“两个健康”必须立足于价值观认同这个前提, 将个人梦、企业梦与中国梦凝聚在一起,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的认同必须以时代特征和个体价值行为为出发点, 坚持“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的导向, 为年轻一代“两个健康”提供共同信仰、政治认同、社会认同基础, 提供恪守的价值标准, 其价值观认同的路径, 既包括教育培训的理论路径, 也包括制度供给、环境提供和社会互利交往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年轻一代;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价值观认同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3-0014-12

年轻一代主导下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 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利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取向, 在其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 总在不断地自觉构建和选择进程中, 其选择的依据是自己人生的原则确立和生活的目的与意义追求。价值观的形成既是一种生活的过程体验和感悟, 更是一种精神家园的构建和寻找, 它从人们生活中生发出来, 并与人的主体意识和自我实现的要求内在相关的政治现象、经济现象、文化现象、社会现象结合起来, 通过不断的转化、创造与实现, 形成包括功利、道德、公正、情感、信仰等不同层面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理念和思想体系。因此, 引导年轻一代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和非公企业健康发展就必须立足于价值观认同这个前提和基础。

一、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构成的时代特征和价值观认同的导向

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 当他们肩负起经营主体责任的时候,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开始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 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必然带来人们价值观的深刻变化。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经济建设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在其价值构成上有其共性, 但其内部也有较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对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认同的培育和引导, 要尊重其主体性, 不能简单地强调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否则将导致统战工作的虚化和泛化。价值认同的培育和引导不能将个人的精神追求排斥于外, 理应结合其合理需求, 将个人梦、企业梦与中国梦凝聚在一起,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简介: 胡伟, 云南省玉溪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哲学和统战理论。

（一）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构成的时代特征

在一般的意义上，我们以30年为一个周期来划分人的代际更替。第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大多出生于20世纪40至60年代，他们都是创业者。以此类推，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则主要出生于20世纪70至90年代，由继承产业的接班人和新一代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创业者两个群体构成，它们的价值观构成具有明显的群体性和时代性特征。

1. 价值选择的自主性是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构成的显著特征。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法治建设不断进步、非公有制经济地位明确并构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与老一代非公经济人士不同，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具有更明确的角色意识。因此，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普遍都具有权利和责任意识，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期望和追求，有其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我评判标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伴随着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凸显、利益诉求差异性的出现，人们的身份意识开始觉醒。显然，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自主性基础之上的，并基于对利益的自主追求来赢得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2. 规范意识、法治意识明显增强，追求发展环境公平和自我权益的保障是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构成的内在需求特征。与老一代创业者过分强调政治资源，过分依赖政府权力不同，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基本完善，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社会角色意识明晰的发展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普遍有了规范意识、法治意识，更关注自主财产的保障权、发展规则的话语权、发展环境的公平权、政治待遇的平等权。显然，随着规范意识、法治意识的确立，自我权益保障的内在需求明显增强，如果内在需求的实现路径明显滞后于他们在经济社会中所占的分量，就容易导致其对发展环境产生质疑。他们更强调拥有与国有企业一样发展的公平权便是这种内在需求特征的集中体现。

3. 塑造企业价值，凝聚团队精神是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构成的鲜明特征。非公有制经济经过近40年的高速发展，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已经告别了野蛮成长的阶段，他们明显地意识到只有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客户创造价值，企业才会有广阔和长远的生存空间。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与老一代创业者最鲜明的区别在于，他们已经有了明确的企业家责任和使命意识，开始自觉自主地追求企业家精神。从我们调研的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来看，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已经开始塑造企业价值，提出了企业发展的核心理念，正告别单纯的财富追求，走向把企业发展当成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事业追求。

4. 层次性、差异性和动态性是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构成的现实性特征。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的构成本身是有层次性和差异性的。对于第二代接班人来说，上一代已经为他们提供了平台和发展的基础。一方面，做强做大、创新突破是他们最重要的价值选择，另一方面，他们的价值选择又必然或多或少受到上一代的影响和制约。而对于新一代创业者来说，他们需要的是自信、创新来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价值选择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相对更为突出。由于经营规模、资产构成、从事行业和生活经历、教育程度与个人素质存在差异性，也必然最终反映在对待财富、对待资本运营方式、企业发展目标和社会责任担当不同的价值追求上。

（二）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认同的本质及意义

对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价值观认同其实是一个“价值主体之间通过变化着的关系（对话、交往、混乱）使自身的价值观念或价值结构获得重新定位和重新调整的过程。”^①因此，价值观认同是建立在主体自觉需要的基础之上，立足于平等的交往和实践活动，通过对人生意义和理想信

^① 贾英健：《认同的哲学意蕴与价值认同的本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1卷第1期，第13页。

念的重新定位,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在情感和信仰上追求共同的价值目标。

从这个维度来看,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认同的本质,就是在尊重其价值主体性的基础上,通过发展环境的供给、社会规则的确立、社会责任的引导,促成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个人身份得到社会的认可,个人利益需求、情感和信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因此,研究和探讨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认同的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为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提供其价值取向的共同信仰基础。促进“两个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基础之上才有成功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主体。因此,只有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增强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的认同,才能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享有国家主人翁的角色意识,从而为自己的事业注入精神动力。引导和培育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认同,目的在于推动其形成并且践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取向,在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同时,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2. 为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提供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基础。绝大多数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把经营企业当成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追求。从价值观的构成来看,我们赞同美国心理学家罗克奇(Rokeach)将价值观区分为终极性价值观念和工具性价值观念两个方面。终极性价值观念应当是全社会认同和追求的价值观念;工具性价值观念是与自身利益需求相关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就必须把终极性价值观念和工具性价值观念统一起来,在实现个人精神诉求的同时,真正地把民族振兴、国家强盛同自身发展结合起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3. 为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承担社会责任,树立发展信心提供恪守和遵循的价值标准。价值观认同的根本目的在于以国家主导的主流价值观为根本导向,通过个人价值主体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能够以这些价值原则作为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或以全社会认同的共同理想、信念、尺度、原则为追求目标,并自觉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标准。因此,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价值观认同就是要不断改变自身价值结构以顺应社会价值规范,使恪守和遵循共同的社会价值规范成为其自觉接受、自觉遵循的内在需求。这种价值认同将有助于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按社会普遍认同的标准来规范企业发展行为,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将个人梦、企业梦与中国梦凝聚在一起,增强发展的信心和自信。

(三) 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认同的导向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引导,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做到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①这就从根本上为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认同指明了方向和导向,其价值观认同的核心导向就是“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具体来说,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认同的导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个人财富的增长和利益的保障必须有国家的强大和党的正确领导做支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正是以富民强国为根本的国家价值理念和执政党的价值追求,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利益诉求与党和国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才使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和权益保障。因此,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认同培育和引导也应当立足于拥护改革开放,培养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通过价值观认同培育和引导,使

^①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 俞正声出席会议并讲话》,2015年5月21日, <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5/0521/c172467-27034028.html>, 2020年4月13日。

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价值观取向上坚持把个人事业与国家事业、民族事业紧密相连，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2. **企业的社会价值体现在企业家敬业精神和承担的社会责任上。**富而思进在本质上强调的是感恩和回报社会，只有这样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才能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认同。“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作为企业社会价值的体现就是要做到义利兼顾、德行并重，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否则，对国家、集体和社会的责任感缺失，最终会被国家和社会抛弃。

3. **创新是企业获得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结构性的过剩，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已经告别了产品需求的饥饿时代，迎来了供给侧改革时代，民营企业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要突破先辈，赢得发展的生机，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必须树立创新发展观，把创新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4. **诚信守法是企业生存的基础和保证。**以诚为基础、以信为准则、以法为标尺的诚信守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无形资产，更是企业的价值财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对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来说，守法诚信的养成是个过程，只有通过不懈的教育引导和社会实践交往才会形成其价值观认同，并成为其自觉的行动。

二、年轻一代非公经济人士价值观认同的现状和问题

为深入了解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认同的现状，找出其在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方面的差距和问题，探讨引导和培育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认同的路径和方法。我们选取了云南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最活跃、最迅速的地区之一，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具有一定普遍代表性的玉溪市进行实证分析和研究。

（一）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认同的现状

我们同玉溪市委统战部、工商联采取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形式，全面分析和研究了当前玉溪市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状况和价值认同情况。本次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150份，收回有效问卷10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95%。调查对象所在企业涉及机械制造、酒店、农产品加工、食品、电子、环保、生物科技、现代物流建材、机电设备等行业。

1. **主流政治认同感比较强。**从调研情况看，基于普遍较高的自身素养，玉溪市年轻一代非公经济人士认同非公有制经济的利益诉求与党和国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障。大部分人在实践中体会到，企业能发展，走上致富路，主要是国家的制度安排和党的政策好。因此大多数人都拥护现行的社会制度，愿意维护党和政府的好政策。问卷调查显示，年轻一代非公经济人士对“你认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回答，有92.9%的调查对象选择“非常重要”，并且普遍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充满信心。对“你怎样认识‘中国梦’与个人梦想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回答，有43%的调查对象选择“我的个人梦想就是实现‘中国梦’”，89%的调查对象选择“我的个人梦想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对“事业成功和企业发展最重要的依靠”这一问题的回答，有92.9%的调查对象选择“党的改革开放、富民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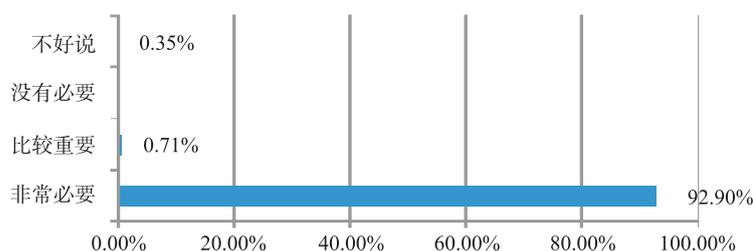


图1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观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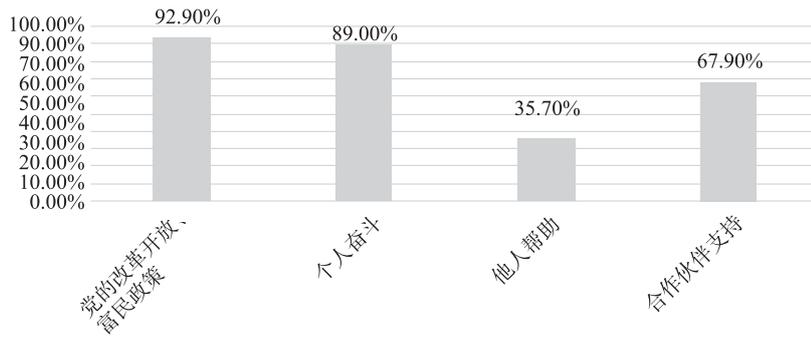


图2 事业成功和发展依靠价值认可

2. **政治取向清晰，参政议政意愿强烈。** 问卷调查显示，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以70后、80后为主体，学历普遍较高，其中本科学历接近一半，少数有海外留学经历，他们部分就是共产党员，绝大多数关心国家大事，注重学习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精神，学习领会中央对非公经济的路线方针政策，愿意学习新知识，接受新理念，不断增强对自身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调研走访中发现，玉溪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意愿强烈，争取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对政治参与普遍持认同态度，认为企业家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参加工商联组织对企业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问卷调查显示，100%的非公经济人士都愿意参加青年企业家联谊会、协会等组织；59.3%的调查对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愿望，17.9%的调查对象希望加入民主党派。他们乐于通过参加政治组织和参政议政等活动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意愿，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及企业知名度，部分非公经济人士希望通过参加工商联、企业家协会、行业协会等组织活动，为非公企业的健康发展寻找社会管理途径，在落实市委、市政府的政策的同时，为非公企业主阶层代言。

3. **社会价值的选择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明显的相似性。** 问卷调查显示，玉溪市年轻一代非公经济人士将经营管理企业的成功视为自己的价值体现，并表现出企业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相似性。对“您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最应该提倡的价值是？”这一问题的回答，选择排序为：诚信（96%）；公正（89.2%）；爱国（78.6%）；法治（78.6%）；民主（71.4%）；和谐（67.9%）。对“您认为企业家精神应包括？”这一问题的回答，选择排序为：诚信（100%）；爱国（96.4%）；责任（92.9%）；奋斗（89.2%）；学习（82.4%）；风险（50%）。对“您认为非公群体应该普遍提倡的价值观念是？”这一问题的回答，选择排序为：诚实守信（96.4%）；依法经营（96.4%）；爱岗敬业（78.6%）；勇于创新（78.6%）；热心慈善（67.9%）；共同富裕（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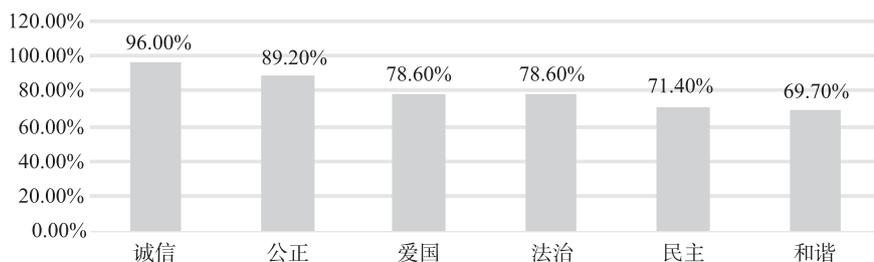


图3 当前中国社会最应该提倡的价值

4. **对规范企业经营能力的认知具有相对全面性。** 调查显示，玉溪市年轻一代非公经济人士对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有着独到见解。多数非公经济人士都能够“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立足自身实际，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相结合。一是围绕企业特色创办企业文化载体。调查发现，玉溪市年轻一代非公经济人士对企业文化有更高的认识，对国家的政策走向较为关注，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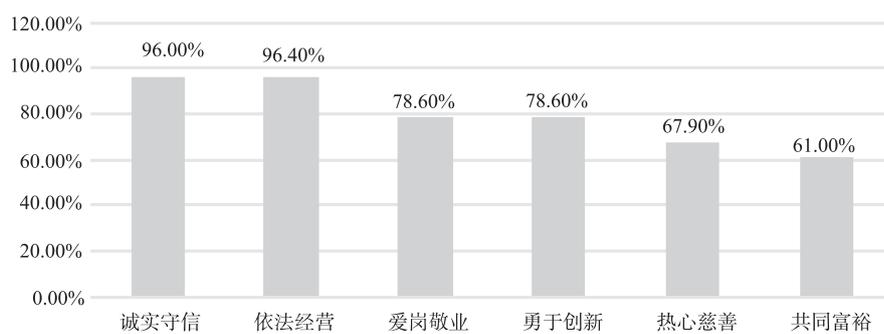


图4 企业精神价值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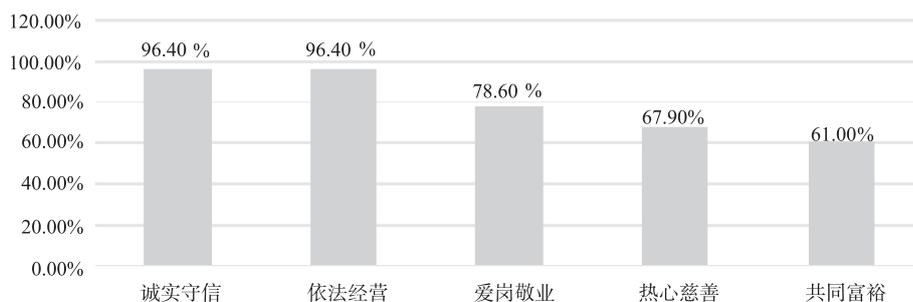


图5 非公群体应该普遍提倡的价值观念认同

企业发展有清晰的目标和信心。如云南尚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上尚若水，浑然天成”为自己的企业文化。云南高原农产品有限公司以“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价值”为发展理念，增强企业凝聚力。二是围绕企业发展构建活动载体。如云南新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开展文化学习、技能培训、文艺活动，使员工真正感受到“新昊人”的主人翁温暖，公司被易门县政府表彰为“劳动和谐幸福企业”，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生产积极性。三是围绕企业创新构建服务载体。玉溪市大部分非公企业都能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开展行之有效的文化娱乐活动，并为员工订阅大量的党报、党刊杂志，丰富员工的文化生活。四是围绕企业发展构建工作载体。多数非公经济人士在解决员工思想问题的同时，也大都注重解决实际问题，90%以上的企业都能够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70%以上的企业为员工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为广大员工筑起了温馨的家园，员工们把感激之情投入到工作中，用拼搏精神回报企业。

5. 责任担当意识较强，财富观具有相当普遍的正能量意识。玉溪市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大多能冷静地看到自己相对于前辈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也能谦虚地向父辈学习吃苦耐劳的精神，对致富思源、义利兼顾、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表现出积极的社会责任意识。问卷调查显示，对“与老一代企业家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93%的年轻一代非公经济人士选择“与老一代企业家可以经验互补、方法共享”，67.9%的调查对象选择“需要老一代企业家指点迷津”。对“您选择创业的主要原因”这一问题的回答，有67.9%的调查对象选择“想实现自我价值”，57%的调查对象选择“想创造社会价值”；对“您创办和经营企业的目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有85.7%的调查对象选择“奉献社会报效国家”；对“您如何看待自己所拥有的财富”这一问题的回答，“财富来源于社会，应该回报和用于社会”认同率达100%。

(二) 年轻一代非公经济人士价值观认同存在的问题

由于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结构多元，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思想意识的独立性、动态性较强，其思想状况和价值认同有趋于复杂化和矛盾化的一面，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对待。

1. 少部分人信念纠结，价值观选择趋于多面性。由于对国情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和过程缺少透彻和全面的认识，以及受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价值的影响，部分年轻一代非公经济人士的终极

价值和工具价值并不能完全统一，一方面，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在具体价值选择上更趋于以自我利益为主导。因此，在具体行为追求上既渴望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但又对党和国家的理论、道路、制度坚守的信念不够坚定。由于经济社会的进步和企业员工素质的不断提高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样化，少数非公经济人士难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凝聚精神力量的思路和办法，导致企业员工凝聚力不强、活力不够。问卷调查显示，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最后决胜阶段”这一问题的回答，有82.4%的调查对象选择“充满信心”，也有14%的调查对象选择“信心不足”，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示，也是一个摆在党委和政府面前的严峻课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2. 在代际传承方面存在两极分化现象。调研发现，玉溪市年轻一代非公经济人士在“守业”还是“创业”的选择上，体现出不同的价值选择和观念。有的由于家族多年的生产经营熏陶，较早地介入了企业管理层，顺利地实现了新老交替；也有一部分“创二代”，受现代教育的影响，不愿意甚至是拒绝接班，而是致力于自己感兴趣的新兴产业开始自主创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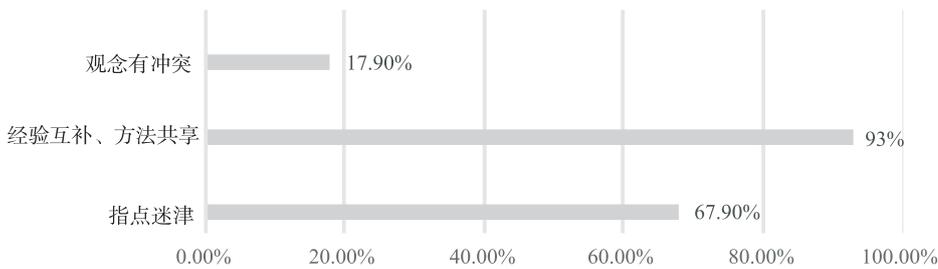


图6 与老一代企业家的关系价值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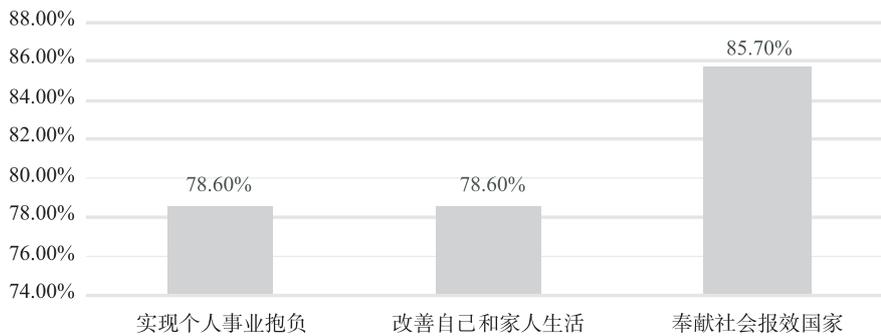


图7 创办和经营企业的价值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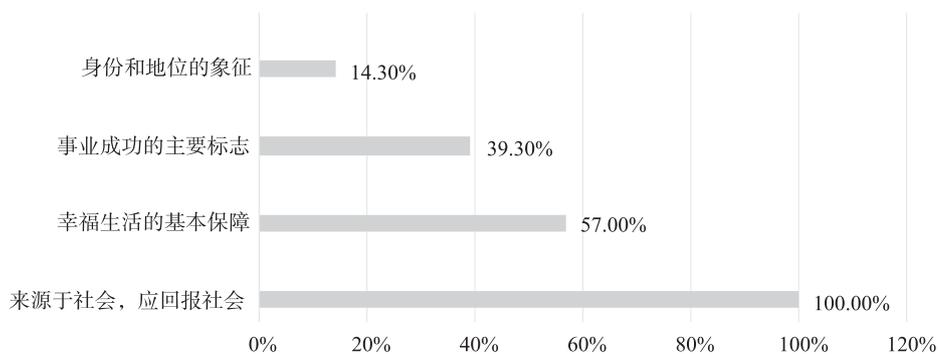


图8 对自己拥有财富的价值认同

3. 对发展环境满意度不够高。由于部分领导干部对加快非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在具体工作落实中，过多地追求政绩，忽视中小企业和本地企业，存在对非公经济差异对待的现象。具体表现为服务不到位，办事效益低下，审批慢、办证难，只注重招商引资，忽视存

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影响了年轻一代非公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更影响了加快企业发展的信心。如玉溪市委出台的《玉溪市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三个实施意见和《玉溪市重点产业招商引资若干优惠政策规定》等系列政策文件，但由于这些政策的配套措施还不是很实，政策落地效果不是很好，部分企业“不知道有哪些政策”。“用地难”“贷款难”和行政职能部门在服务上的不到位等仍然是困扰非公经济人士及企业发展的难题。加之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及企业转型升级的挑战，部分非公经济出现生产经营困难，导致了非公经济人士对企业发展前景的担忧，对企业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思考不够、积极性不高。问卷调查显示，对“非公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竞争是否公平”这一问题的回答，没有人选择“非常公平公正”，有35.7%的调研对象选择“一般”，占比较高。对“你认为民营企业家群体在社会上地位如何”这些问题的回答，有61%的调研对象选择“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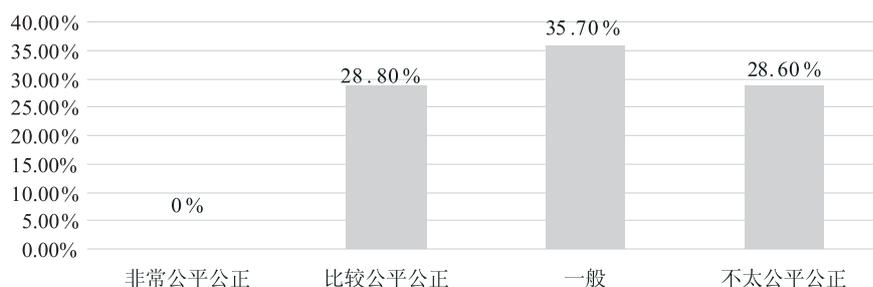


图9 非公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竞争是否公平价值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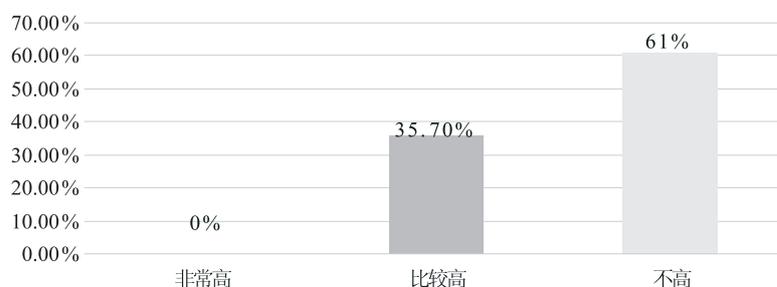


图10 民营企业家群体在社会上的地位价值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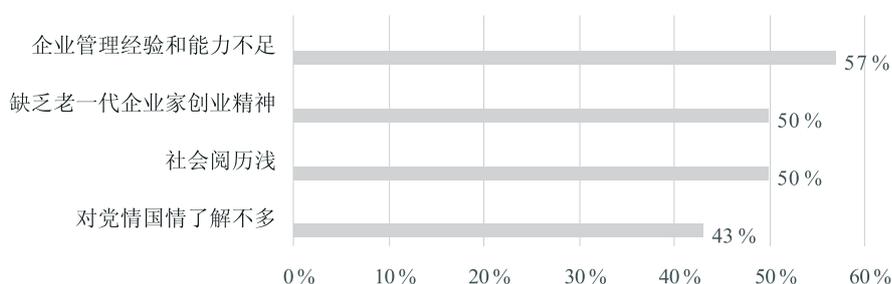


图11 年轻一代企业家待提升的素质认同

4. 对企业经营管理能力认知差异化明显。从调研情况看，玉溪市年轻一代非公经济人士大多数无论是白手起家还是子承父业，都能够顺应时势、创业创新，企业运营有声有色、引领潮流；但也有部分非公人士感觉自己难以跟上时代进步的步伐，有的则认为不能很好地把握企业发展的好时机，发展方向上存在迷茫问题，不能很好地适应转型升级的要求，发展陷入困境。问卷调查显示，对“你觉得年轻一代企业家哪些方面有待加强”这一问题的回答，有50%以上的调查对象显示出“企业管理经验和能力不足”和“社会阅历浅”。调研发现，玉溪市非公经济发展存在阶段性矛盾，突出表现为“四个不够”和“六多六少”问题。即规模总量不够大、产业层次不够

高、发展后劲不够足、市场竞争力不够强。存在“个体户多、私营企业少；小企业多、叫得响的企业少；原料型企业多、深加工企业少；低端产品多、高端产品少；小老板多、高素质的企业家少；单打独斗多、集群发展少”。这一矛盾导致部分年轻一代非公经济人士对企业转型升级有畏难情绪。

5. **认知与行为的养成存在差异。**尽管大部分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价值观认同上高度认可和赞同市场经济的伦理原则，高度认同守法经营和诚信经营，但也有相当部分年轻一代非公企业家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思想，在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过程中，或者是单纯地追求效率，或者是采用不正当竞争的手段欺骗消费者，或者是压低劳动者的工资福利以降低成本，显然与其所认知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

6. **统战工作合力不够，与非公经济人士的互动性不强。**实际工作中，由于工商联对非公企业主阶层开展工作，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民间性性质，其作用的发挥仅仅限于团结、教育、引导和建言献策上，缺少对非公企业主进行具体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部分具有对非公企业管理和审批权限的部门，缺乏统战意识，只是机械地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甚至以行政化的手段来推动和命令非公企业的发展，导致统战工作难以形成合力，部分非公经济人士不了解，也不理解统战工作，对统战工作参与的积极性自然也不强。从调研情况看，玉溪市大部分年轻一代非公经济人士愿意主动向各级工商联、有关部门以及各类商协会组织靠拢，认为可广泛交友、获取更多信息、寻求有力资源，并通过组织发声呼吁，展现了年轻一代积极向上的一面；但也有个别年轻一代非公经济人士不愿意与党政机关部门打交道，甚至一些人加入了组织，但不响应组织号召、不参加组织活动，停留在“自我”小圈子里。

7. **政治安排不尽合理，难以体现非公企业发展的正能量。**从玉溪的实践来看，列为政治安排对象的非公经济人士往往过分强调其经济实力和公司规模，忽视了其先进性和典型性，有些政治安排对象，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缺失，以功利性为主，其积极参政的目的是有机会接近权力阶层，为建立广泛的关系网络创造机会，有利于获取个人利益。由于受名额和渠道的限制，许多政治意识强，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的非公企业人士被排除在外，许多中小型企业有被忽视的现象。另外，对非公经济人士的协商和利益表达渠道，除政协、统战部和工商联外，还没有找到其他有效的途径和渠道，受职能和权限的限制，非公经济人士参政的渠道并不通畅，利益诉求机制不健全。受历史和传统的影响，部分非公企业人士认为，其法律地位还不明晰，非公企业人士作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国家主人翁的意识还没有完成建立起来，对其长远发展的信心不足。

三、促进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认同的路径选择

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价值认同引导和养成，必须以时代特征和个体价值行为为出发点，把握他们的成长规律，结合群体特征和思想现状，坚持问题导向，进行正面引导，使其成为主流价值观坚定的认同者。

（一）强化政治融入，促进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认同

强化政治融入，加强政策引导，做好党外人士的政治安排，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一政策的实施，我们应该促使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认识到，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只有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企业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从而确立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政治立场，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服务社会，回报人民。

1. **以政治安排为载体，增强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认同国家政治体制的自觉性。**实践证明，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建立政治认同，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做好政治安排。因此，要加大政治安排力度，根据个人素质、行业特点、企业规模以及社会影响等因素，在各级人大、政协、

工商联等不同层面，将形象良好、热心公益、诚实守信的优秀的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纳入政治视野，进行推荐安排，引导他们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增强他们对国家政治体制的认同，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把政治功能融入企业发展，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作用。强化政治功能，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作用，是促进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进行价值观认同的关键。因此，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要强化政治功能，促进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强化政治价值认同。一要让党员成为非公有制企业的骨干，引导企业的骨干发展成为党员。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主管机关要定期不定期地对党员开展教育，让他们把党的宗旨、党员的责任和对国家的忧患铭刻在心，时时处处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成为企业发展的骨干，让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感受到我们党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从而吸引他们向组织靠拢；二是让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要对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工作者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形成自己的成长和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党和政府支持的正确认识；三要关注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进步。在政治上，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要关心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发展进步，积极吸引符合条件的杰出的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加入党组织。

3. 增强政策落实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升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认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觉意识。党和国家的政策，尤其是与非公经济密切相关的各项改革政策，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相关部门要及时了解和掌握，并在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广泛宣传，有利于他们了解政策制定背景，熟悉政策内容，把握政策精神，自觉遵循党和国家的政策。

(二) 立足实践活动，促进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1. 结合年轻一代的精神诉求，开展个性化的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以增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企业发展的信心、对社会的信誉（简称“四信”）为主要内容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引导工作的重大创举。玉溪市工商联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传统的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教育者起着主导作用，受教育者被动接受教育，教育效果差强人意。就“关注自我、追求个性，主体意识比较突出”^①的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而言，我们在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时，要根据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主体意识较强的特点，立足于他们的生活世界，培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2. 突出重点，促进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不仅是新形势下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所追求的价值共识，也是他们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向。要把核心价值观作为引导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认同的重点，在充分了解其思想动态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让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正确处理好地方与国家的关系，把自己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一起，不断提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认同。

3. 把企业文化平台建设作为促进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认同的重要载体。企业文化是企业价值理念、发展战略、经营之道、外在形象、内在精神、行为规范的集中体现，是为实现企业发展目标而凝聚全体员工认同的共同的价值观。由此可见，企业文化是引导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认同的重要平台。为此，我们要引导非公有制企业重塑企业文化，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并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在引导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认同方面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引导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党同心同德，把目标和行动与党的事业紧

^① 徐晓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取向及其引领研究》，《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1期，第13页。

密结合起来。

(三) 搭建正确价值取向养成的载体, 促进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当社会责任

促进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养成服务国家、回报社会、造福人民的正确价值取向, 肩负社会责任, 用自己的才智服务社会, 必须搭建正确价值取向养成的载体, 实现内在需求与社会信誉的统一。

1. 通过社会公益事业活动, 彰显企业存在的价值。搞好社会公益事业是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为社会作出贡献, 实现自身价值的有效途径。我们要搭建好社会公益事业载体, 引导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参与“光彩事业”“阳光事业”“温馨工程”“同心工程”“希望工程”等活动, 做好社会公益事业和福利事业, 为他们“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感恩社会、关注民生、扶危济困、共同致富”提供必要的手段, 使他们能够实现仁义美德的高尚境界。

2. 树立生态文明意识, 突出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实现低碳发展, 保护生态环境, 即是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出的价值诉求, 也是玉溪目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充分享受良好的生存环境的同时, 也应当承担起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因此, 我们要引导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形成正确的生态价值认识, 把“低碳生产、低碳消费、低碳生活变成自身的使命和价值追求”,^①在非公有制企业的生产运营过程中, 既注重产品质量, 更注重环保要求。

3. 着力构建新型劳动关系, 赢得企业发展的社会信誉。引导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以人文关怀和人性化管理为出发点, 维护员工合法权益, 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 使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明白这是赢得社会信誉, 吸引发展人才的根本所在。

(四) 在社会实践交往中, 引导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养成敬业、守法和诚信价值观认同

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在于以守法和诚信赢得社会信用, 以敬业的工匠精神和创新的时代精神塑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 要以社会实践交往的互利性, 来引导和培育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敬业、守法和诚信价值观认同。

1. 培养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敬业精神。“创业容易守业难”。对于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来说, 如何把父辈打下的基业守好并发扬光大是时代对他们的考验。调研显示, 由于条件较好, 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比起他们的父辈, 艰苦奋斗不够, 因此, 要培养他们的敬业精神。一是增强危机意识, 树立吃苦耐劳精神, 确立远大目标, 促进企业进步, 争当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排头兵; 二是不怕竞争, 不畏艰辛, 勇于挑战, 把企业做大做强, 争当行业的排头兵; 三是以效益为中心, 以名牌产品为龙头, 扩大规模, 重投资、技术、人才、资金, 聚拓市场, 转变发展方式,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2. 养成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守法诚信的理念。企业安身立命之本是守法诚信。要向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灌输守法诚信观念。一是针对非公有制企业多为家族式企业的情况, 引入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在法制框架内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二是建立法律顾问制度, 运用法律思维和法治方法化解各种经济纠纷, 防范及处理法律风险, 为非公有制企业诚信经营保驾护航; 三是加强企业诚信建设, 让企业的诚信理念转化为自觉行动, 在产品价格、质量、服务、销售等方面, 坚持信誉至上、诚信经营, 以重信义、讲信誉、守信用的态度面向社会和用户。

(五) 注重制度环境供给, 促使年轻一代非公经济人士终极价值和工具价值相统一

解决非公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构建亲清新型政

^① 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课题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取向引领问题研究报告》,《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55页。

商关系、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是促使年轻一代非公经济人士终极价值和工具价值相统一，形成社会认同的关键性因素。

1. **平等的政策环境。**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切实解决非公有制准入门槛过高的问题；在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技术政策、贸易政策、人事政策等相关政策的时候，对非公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全面落实税收减免、财政补贴、金融支持等各项优惠政策，解决非公有制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困难；非公有制企业在科技项目、成果鉴定和成果奖励等方面与国有企业享有平等待遇；非公有制企业的各类技术职称人才和其他国有企事业单位一样平等地参加技术职称评定。

2. **平等的竞争环境。**一是市场体系要健康有序。要在市场环境中创造开放、平等的竞争，为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二是利益分配机制要科学合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所投入的不仅是物质资本，还有智力资本；所付出的不仅是简单劳动，还有创新性、风险性的复杂劳动，因此，要制定和实施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法律制度，增强他们发展企业的动力。

3. **平等的舆论环境。**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除了物质利益外，自我价值实现、尊重、声誉等精神需求和精神利益也是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价值认同引导的成效好坏最终是由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精神需求和精神利益是否得到满足决定的。调研数据表明，玉溪科技创新的95%来自非公有制企业。“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为企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财富，他们理应得到社会的认可，特别是应得到社会的尊重。”^②因此，一要积极开展评选表彰先进典型。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舆论评选表彰综合素质高、公众形象好、社会影响大的优秀的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重塑他们的良好政治形象，鼓励人们改变观念，改变对年轻一代非公经济人士的偏见。二要强化大众媒体的正面引导作用。要充分运用各种媒体、微信公众号等现代大众传媒，积极倡导和宣扬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热爱祖国、勤劳勇敢、艰苦奋斗、诚实守信、服务人民的典型事例，给予他们应有的荣誉和尊重，传递社会正能量。

4. **宽松的诉求表达环境。**要打造畅通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上下交流对话，增进沟通信任，促进非公经济组织反映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意见建议，帮助他们解决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2页。

^② 潘慧春：《新一代非公人士健康成长的环境因素分析》，《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28页。

中华文化视阈下文化统战工作的三重逻辑

牟娟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000; 福建武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 中华文化视阈既在时代性维度下坚持了文化的先进性, 又在民族性维度下突出了文化的整体性和独特性。新时代党的文化统战工作进一步凸显了中华文化视阈的重要性, 承续了文化统战工作发展的历史逻辑, 顺应了文化统战工作发展的实践逻辑, 拓展了文化统战工作发展的文化逻辑, 既有利于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 又有助于更好地发挥中华文化的统战优势, 推动文化统战工作的发展。

关键词: 中华文化; 新时代; 文化统战; 三重逻辑

中图分类号: D6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0)03-0026-08

文化统战工作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包括对文化战线的统战工作, 也包括以文化为手段进行的“大团结大联合”。中华文化范畴的提出及其内涵的丰富发展, 是我们党对民族文化认识的重大突破, 为党的文化统战工作提供了新的视阈。梳理中华文化视阈对于新时代党的文化统战工作的意义, 不仅能够进一步深化对中华文化范畴的认识, 而且有利于推动新时代党的文化统战工作更好地承担起统战使命, 发挥更大的统战作用。

一、开启中华文化视阈的历史逻辑

党的文化统战工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新民主主义文化统战工作是党的文化统战工作的开端, 确立了党的文化统战工作的基本思想。随着爱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发展, 围绕致力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目标, 党提出了中华文化范畴并对其内涵进行了丰富和阐释, 开启了党的文化统战工作的中华文化视阈。

(一) 开端: 新民主主义文化统战工作

党领导的全国范围内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统战工作起步于抗日战争阶段。早在1935年8月, 党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提出,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为了促成全中国统一抗战, “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党、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 各名流学者, 政治家, 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 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①, 主张建立全国

基金项目: 福建省委统战部B类人文社科项目“中华文化视阈下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研究”(TB18045s)。

作者简介: 牟娟,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福建武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统战文化武夷山研究基地成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22—523页。

范围内的文化统一战线。随后，党主动加强与全国文艺界的联系。毛泽东在1936年8月10日致函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等文化界名流，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①，加紧推进对文化界的统战工作。1938年3月15日，作为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新中华报》，在第四部《边区文化》专栏提出了“确立全国文化界统一战线”^②的号召，将全国文化界作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对象，全国范围内的文化统战工作全面启动。在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的推动下，1938年3月27日，包括文艺界各方面代表97人发起建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中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③，党领导的全国范围内的文化统战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随着文化统战工作的发展，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指出，无论文艺主张是什么，为了共同抗日，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尽管党是站在广大工农大众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但并不能以此实行文化上的“关门主义”，明确了党的文化统战工作的基本原则。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集中阐述了党的文化统战工作的基本思想。他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出发，提出文化作为政治和经济的观念形态上的反应，在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同时，也必然要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鉴于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这对“亲兄弟”已经形成了反革命的文化联盟，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也要有一个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文化，尽管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思想领导，但在整体上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只能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④，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统战工作的性质。

实践证明，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统战工作既有正确的文化建设方针又具有很强的统战属性。通过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在文化的时代性维度上推动了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在文化的民族性维度上强调了保持独立性的立场和意识，团结了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力量，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汇聚了民族力量。

同时，由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统战工作是在激烈的国内外革命斗争环境中进行的，是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具有十分明显的阶级斗争的特征和性质。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特别是我国成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文化统战工作中的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对执政条件下文化统战工作的发展带来了冲击。此外，尽管毛泽东始终强调不应当“割断历史”，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对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⑤，主张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反对“言必称希腊”，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研究仍然十分有限，“对于这种‘精华’和‘糟粕’的辨别和判断，在当时的条件下还不可能得出具体的结论”^⑥，而且“由于过于强调‘新’与‘旧’之间

① 尚金州、张洪军：《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兰台世界·上旬》2012年第12期，第66页。

② 《新中华报》，第三百二十五期，1937年1月，第374页。

③ 王巨才：《延安文艺档案·延安音乐》（第15册），《延安音乐组织》，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91页。

④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4—705页。

⑤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3—534页。

⑥ 左亚文：《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认知新境界》，《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第5页。

的对立，中国文化的精神生命出现了古今脱节、滞涩不通的问题”^①，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化统战工作的发展。

（二）曲折中发展：爱国主义文化统战工作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将发展文化教育作为主要任务之一，高度重视发挥文化战线工作的作用，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以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和“社会主义文化繁荣”^②，坚持和巩固了党的文化统一战线。但是，由于受“左”的错误干扰，特别是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以及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仍然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判断，广大知识分子受到了冲击，文化统战工作经历曲折，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

百废待兴之际，邓小平复出后首抓科教文化工作，主持召开科教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科学大会，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文化界开展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工作。新时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知识分子的春天”。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出了建立爱国统一战线的主张，首次将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两大旗帜。1981年6月，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将新时期统一战线确立为“爱国统一战线”。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以爱国主义作为最大公约数的新时期文化统战工作实现了政治属性与文化属性最大程度的统一。从此，文化统战工作，有了广阔的历史舞台。

以爱国主义为最大公约数，文化界各条战线以主人翁的精神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推动科教文卫事业发展，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创造出了大量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和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推动文化产业兴旺发达，增强综合国力。积极开展与港澳台地区文化交流对话，助力祖国统一大业。开展海外文化交流，为对外开放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曾列举大量事实，论证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华人世界的文化共性促进了经济参与”^③，海外华人将大量资本投入中国市场，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强大的资本支持。尽管亨廷顿的观点有意屏蔽资本逐利的本性和我国改革开放决策的重要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也为我们展示了基于文化共识的强大经济社会效应。

在党的文化建设和文化统战工作取得重大成效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④等重要论断，表明党已经着眼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以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和独特性增强文化的民族性维度。中华文化范畴引起了学术界关注。在知网上以“中华文化”为主题进行搜索，在2008年至2012年，总共发表期刊论文8019篇，平均每年高达1603.8篇。中华文化范畴的提出和在学术界引起的反响，为党的文化统战工作敞开了更广阔的理论和实践视角。

（三）发展中深化：开启中华文化视阈

进入新时代，“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统一战线性质和构成的表述，成为新时代统一

① 李翔海：《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论习近平中国传统文化观的时代意义》，《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6期，第24页。

② 参见李捷主编：《毛泽东思想研究》（第1辑201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20—134页。

③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49页。

④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37页。

战线工作的最大公约数，内在地包含了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新时代党在宣传思想工作、宗教工作、民族工作、教育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文艺工作等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和安排部署中，都全面贯彻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①的基本理念。习近平在国际交往的多个场合亲自介绍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发展历程，推介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学意蕴、尚德崇礼的价值取向、“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和“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主张各民族文化平等，推动各民族文化在平等包容中“交流互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等命题。学术界高度重视对中华文化范畴的理论阐释。在知网上以“中华文化”为主题进行搜索，在2013至2019年，总共发表期刊论文22342篇，平均每年高达3191.7篇。弘扬中华文化的实践发展和中华文化范畴内涵的不断丰富，为党的文化统战工作开启中华文化视阈奠定了基础。

中华文化视阈的形成既是党的文化建设实践取得巨大进步，党的文化自信自信进一步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取得重大突破的结果，也是对爱国主义文化统战工作的深化，遵循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社会历史逻辑。

二、开启中华文化视阈的实践逻辑

统一战线是党的重要法宝。党的文化统战工作是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的统一，其中政治属性是统领，同时要尊重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文化属性要通过发挥自身统战优势服务于政治属性。新时代爱国主义文化统战工作面临着文化的统战优势发挥不够的挑战，对开启中华文化视阈，增强文化民族性维度提出实践要求。

从政治属性来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统一战线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指导地位。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由于政党具体政治目标的差异和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不能简单地将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指导等同于统一战线中的文化行动和文化手段，即不能混淆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区别。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曾明确指出：“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②这段话对于指导今天的文化统战工作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不能把党内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建设简单等同于党的领导和执政过程中的文化行动。党的文化统战工作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指导地位，但必须要注意区分对象和层次，创新内容和方式，拓宽渠道，充分发挥文化相对于其他手段的统战作用和优势，而不能一概用党的意识形态上的文化立场、观念、方法来要求统战对象。也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族革命力量。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已经是中国大陆的文化主体，但是为了推动祖国完全统一，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建立起了爱国统一战线，以爱国主义精神作为统战工作的最大公约数。

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文化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国内国际、网上网下的竞争乃至斗争日益激烈。文化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同时也表现面临一些挑战。其一，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身文化思维习惯，将加强党的文化统

^①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6页。

战工作当作“回应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演变”^①的政治任务。捍卫意识形态的政治压力在实践中很容易导致政治属性压倒一切，从而将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等同起来，将国内统战工作与国际统战工作等同起来，把文化统战工作等同于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搞“清一色”。既忽视了文化统战工作中的文化属性，也偏离了文化统战工作的统战性质，不利于文化统战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其二，由于近代以来中国被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传统文化不同程度地被“断舍离”，文化建设着重从时代性维度追求新旧文化、中西文化比较中的“先进性”，从民族性维度着重强调的是中西文化对抗中的独立性意识，而对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和独特性方面重视不够、建构不足。中华文化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建构滞后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不能全面立体反映和阐释中国经济政治上的成功实践。西方反华势力加大对国际舆论的控制，将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当作意识形态宣传加以歪曲，将中华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当作中国威胁加以污蔑。这些都导致文化统战工作在海外和国际上遭遇阻力，不利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其三，文化底蕴不足底气不够，文化统战工作避实就虚，重形式轻内容，重数量轻质量，工作走形式做样子，甚至因一味迎合统战对象而失去自我，文化属性缺位，弱化了文化统战工作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

正如亨廷顿所言，“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人民被意识形态所分离，却又被文化统一在一起”^②，中华文化视阈以增强文化民族性维度的整体性和独特性回应了党的文化统战工作面临的挑战。在中华文化视阈下，党的文化统战工作能够推动中华文化复兴并通过中华文化达到“大团结大联合”的政治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目标凝聚力量。

三、开启中华文化视阈的文化逻辑

中华文化范畴涵盖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代表了中华民族独特文化标识。在中华文化视阈下，党的文化统战工作能够以更宏大的文化视阈，更强大的文化力量和更高远的文化境界增强文化的统战属性，更好地发挥文化的统战作用。

（一）更宏大的文化视野

统一战线是有着不同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的社会政治力量，为了共同的目标所组成的政治联盟，达成共识是形成统一战线的关键。文化共识是基于对共同的文化根脉或者价值理念的认同，是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的内在基础和增强统一战线内部团结的内在力量。中华文化视阈能够为新时代文化统战工作全面整合中华文化资源，增强全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提供更宏大的文化视野。

如前所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统战工作处在革命战争的大背景下，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完成对民族文化的系统整理，全民族文化不仅处在“古今脱节”“滞涩不通”的状态，新旧文化内部也是支零散落、命运多舛。爱国主义文化统战工作有了更大的时空维度。但在改革开放初期，解决“温饱”奔“小康”是全国人民最现实最急迫的要求。文化建设首先要服务于经济建设的直接需要，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是形象的比喻。直到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实现更高水平的小康目标，文化建设才第一次进入到党的总体布局，迎来了文化自身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党坚持强调文化先进性的时代性维度，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同时，开始从民族性维度致力于中华文化建设，大力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整理、保护和研究工作。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民族精

① 张改凤：《新时期文化统一战线建设的理论审视》，《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11页。

②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第6页。

神的概念，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中华文化范畴，为整体上突破文化认知上的新旧分段模式奠定了基础。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立足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多年发展的宏大历史视野，在多个场合从整体上阐述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之间“生生不息”的内在联系，突破了从文化的时代性维度下以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裁剪分割中华文化的思路，建立起了贯通中华民族发展的全部历史，整体看待中华文化的民族性维度。从中华文化主体层面，提出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共同创造的，传承了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和密码，“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 and 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①。因此，中华文化是增进民族团结的文化基础，是对内凝聚中华民族合力，对外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标识性文化范畴。从中华文化客体层面，提出中华文化内在地包括了“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②习近平强调，“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挥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③肯定了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全部优秀文化的总和，是一个纵向贯通并统摄中华民族历史、现在、未来，与中华民族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文化范畴。

通过对中华文化主体和客体的阐释，中华文化范畴有了广阔而明晰的时空维度，成为增强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范畴。在此基础上，习近平要求，“各民族在文化上要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④因此，开启中华文化视阈，为文化统战工作整合全民族文化资源，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敞开了极为宏大的统战视野。

（二）更强大的文化力量

源于对民族文化内在价值的深度认同是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础，是维系民族团结，推动民族发展的最根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视阈下，新时代文化统战工作能够通过构建中华文化内在价值体系，贯通中华文化资源的精神血脉以获得更强的文化力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立足于复杂的社会阶级阶层状况和激烈的革命斗争环境，以卓越的战略眼光发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号召，推进了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转向进程，确立中华文化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基本原则，为建构中华文化价值体系提供了重要参照。但是处于革故鼎新的时代大变局下，突出新旧之异远远压倒了对二者内在价值传承的关注。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文化建设紧跟着经济建设的步伐，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文化统战工作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指导，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贡献了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分而治之的状态没有得到整体改变，中华文化形象被红灯笼、旗袍、茉莉花等标签化、碎片化的状况仍然存在，以及在市场作用下出现了以“娱乐至死”为代表的肤浅媚俗化文化产品大肆流行等情

①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5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③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页。

④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页。

况。人们习惯于用西方文化话语体系裁剪中华文化。这些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华文化发展缺少自身内在价值体系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利于文化统战工作走进文化深处。

进入新时代,在中华文化视阈下,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二维视角更加完善,将中华文化资源全部纳入到中华民族文化整体视野下考察,为构建中华文化自身内在价值体系奠定了基础,也提出了要求。习近平提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①因此,新时代党的文化统战工作要立足新时代中国社会实践,在坚持文化先进性的时代性维度的基础上,增强文化的民族性维度,整合中华文化资源,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导,构建中华文化内在价值体系。通过构建中华文化自身内在价值体系,实现民族文化精神血脉的内在贯通和融合,能够对文化资源的内在价值进行深入挖掘、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不仅体现古代中国的韵味,而且充满现代中国的朝气;不仅是中国文化元素的代表,而且是中华文化价值的载体;不仅富有中华文化的温度,而且充满中华文化价值的力量。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②,以中华文化的价值力量增强文化统战工作的统战力量。

(三) 更高远的文化境界

中西文化差异,特别是西方政治势力为实现意识形态渗透和颠覆,蓄意挑起意识形态的优劣高下之争一直是国际统战工作的主要障碍。中华文化视阈将文化的社会主义先进性和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特性统一起来,超越文化优劣对立思维模式,以更高远的文化境界增强文化的统战属性。

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中国始终以社会主义文化为指导,坚持“汲取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在不断实现自身“先进性”的同时捍卫文化的民族独立性。新民主主义文化统战工作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坚决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反对帝国主义、投降主义,反对奴化思想,同时采取“洋为中用”的方针,在推进民族文化现代转型的同时,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经济革命提供文化上的支撑。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来,党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开门搞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旗帜鲜明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培育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成功抵制了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不良影响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渗透,坚守住了中国的文化阵地。

进入新时代,国际社会逐渐成为中西文化较量的新领域。随着中国日益走进世界政治舞台中央,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文化统战工作承担着“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实现“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重大使命。西方反华势力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壮大,在国际舆论场上凭借其文化上的霸权地位,控制国际“话语权”,编制谎言,歪曲事实,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肆意抹黑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形象。加上“由于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各国在面对外来文化进入时

^① 习近平:《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人民日报》2015年12月31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0页。

往往会保持高度的警惕性”^①，在激烈的国际舆论斗争中，我们经常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失语”“挨骂”的境地。因此，“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②而要弥合意识形态对立，形成更广泛的共识，做好国际统战工作，必须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统战属性。

中华文化范畴囊括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是中华民族延续不断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血脉的鲜活记忆，书写着中华民族伟大实践的历史画面，其“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独特的民族文化价值，超越了单一时代性维度下的优劣竞争惯性，强调世界各民族文化在平等开放包容中交流互鉴，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性和高远的文化境界。因此，中华文化视阈为党的文化统战工作贯通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贯穿中华文化独特的价值理念，将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与民族文化整体性、独特性相结合，有着更高远的文化境界。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也足以证明，中华文化的高远境界完全可以超越国家意识形态斗争的优劣对立思维模式，具备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能力。

结语

当今世界，文化已经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和“软实力”较量的重要内容。中华文化范畴的提出及其内涵的丰富发展，是党对民族文化认识的重大突破，在保持文化的时代先进性维度的同时，增强了文化的民族性维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通古今之变”，具有更宏大的文化视野，更强大的文化力量，更高远的文化境界，对党的文化统战工作有着重大意义。

新时代文化统战工作开启中华文化视阈，在坚持新时代爱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拓展了统战工作的文化视野，承续了文化统战工作发展的历史逻辑。中华文化视阈在坚持文化民族独立性的前提下，增强了文化的民族整体性和独特性，有助于破解文化的统战优势发挥不足的现实问题，顺应了文化统战工作发展的实践逻辑。中华文化视阈将文化的先进性和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特性统一起来，超越了文化优劣对立思维模式，以更高远的文化境界增强了文化的统战属性，拓展了文化统战工作发展的文化逻辑。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陈怀平、沈轩羽、李天姿：《“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话语变迁》，《理论导刊》2018年第9期，第86页。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98页。

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进程调查

——以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为例

闫韶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党校, 新疆 五家渠 831300)

摘要: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入贯彻落实以来,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南疆地区发生了显著变化,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进程加快。从人们的穿着仪表看,由保守渐趋开放;从人们的婚姻观念看,自由恋爱深入人心;从人们的教育观念看,越来越重视子女的教育;从宗教活动形式看,世俗化趋势明显;从宗教的影响力看,宗教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力逐渐下降。

关键词: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3-0034-0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地处南疆中心区域。2004年,图木舒克市正式挂牌成立,实行自治区直辖、兵团管理、师市合一的管理体制,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直辖县级市。截至2018年底,图木舒克市年末常住人口18.29万人,包括维吾尔族、汉族、回族等8个民族,其中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共计11.64万人,占总人口的63.6%。

近年来,随着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入贯彻落实,图木舒克市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进程加快,宗教世俗化趋势增强,宗教对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影响呈下降趋势。总体来看,不同的群体现代化程度也不同:从地域上看,城镇及其周围比偏远农村显著;从年龄上看,中青年比老年显著;从性别上看,男性比女性显著。调查工作主要从人们的穿着仪表、婚姻教育以及宗教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力等几个方面进行访谈和观察。

一、穿着仪表的都市化

在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时期,宗教极端势力蛊惑女性说“不戴头巾在后世地狱的火从头发开始燃烧,在家里不戴头巾天使不会进来,晚上不戴头巾睡觉的,安拉不会给她们幸福的生活等”^①。受这种极端思想的影响,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按照学校的要求穿着校服,但担心回家路上受到村里长辈们的指责,出了校门后会立即戴上头巾、换好服装回家。极端势力还蛊惑说:“不戴头巾的女人做的饭是‘哈热木’,不清真。”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地区社会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人们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新疆宗教变迁研究”(14XZJ019)。

作者简介: 闫韶华,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兵团社会主义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宗教理论政策及新疆民族宗教问题研究。

^① 阿衣先木古丽·木天力甫:《喀什市浩罕乡艾孜热提村维吾尔妇女的宗教生活调查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师范大学,2012年。

的传统宗教观念较浓厚，思想观念较为保守，容易受到极端势力的蛊惑。经过深入开展“去极端化”工作，各族群众逐渐认清了极端势力的谎言，极端保守的社会思潮逐渐消退。

案例1：王某，女，37岁，汉族，教师

最近这几年我每年都会去图市（当地人对图木舒克市的简称，下同）六、七次走亲戚（指“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的结对认亲），每次在亲戚家住一星期左右。经过观察，我发现维吾尔族女性晚上上夜校时或连队升旗开会时戴头巾的少些，在家里或去地里干活时就基本都会戴上头巾。我的结亲户家里的老太太六十多岁了，日常也不怎么戴头巾。老太太的大女儿在图市，从未见过她戴头巾。老太太的儿媳妇三十出头，大多数时间不戴头巾，上次来乌鲁木齐办事，打扮很时尚。她孙女十七岁，跟大多女孩子一样，追赶潮流时尚，我送她一条破洞牛仔裤，她还特别喜欢。这两年可以明显感到图市街上女性穿着打扮越来越时尚了，尤其是年轻女孩的打扮和乌鲁木齐没多大区别。

案例1中提到这些维吾尔族女性并没有感到不戴头巾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这与极端思想蔓延时期的情况对比较为明显。在过去一个时期，一些受到极端思想蛊惑的家庭，男性一般会留起大胡子，这样的家庭中女性或主动或被动都会穿上蒙面罩袍，否则就会受到丈夫和周围其他人员的责骂甚至殴打。

案例2：奴某，女，34岁，维吾尔族，图市家庭主妇

我的衣服都是老公给我买的。他见过世面，去过内地很多城市，眼光好，买的衣服也比其他人的漂亮。我的大女儿现在在图市上高中二年级，学习很努力，我希望她能够考到乌鲁木齐的大学去上学。她从小就没戴过头巾，学校不让戴，我也没要求过她戴。

案例3：穆某，女，17岁，维吾尔族，图市某高中学生

我平常穿牛仔裤，运动装，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没有要求我戴头巾，穿那样的衣服（指民族服装和蒙面罩袍）。他们也非常鼓励我，经常教育我要好好学习。爸爸说他自己就是因为以前家里穷，学上的少了，现在要我好好学，一定要考上重点大学，我希望自己能够考上乌鲁木齐的大学，能考上内地的大学就更开心了！

案例2、3的访谈是在2018年8月的暑假，维吾尔少女穆某身着短袖衬衫、牛仔裤、运动鞋，头上扎着马尾辫，显得青春活力十足，对自己的梦想娓娓道来，有追求有理想，与乌鲁木齐甚至内地大城市的同龄女孩几无分别。根据观察，当前，在图市，老年人的穿着仍以传统式样的裙子为主，出门一般戴头巾；中年妇女在家穿裙子多，出门（指去图市市区）穿裤子较多；年轻女孩子基本不穿传统服装，很少看到戴头巾的，打扮穿戴都很时尚。和周边地方农村相比，女性在服饰穿着、头巾佩戴上具有较为显著的区别，图市的女性更为时尚现代。

二、婚姻观念的现代化

维吾尔族的传统婚姻观念中，婚姻基本由双方父母说了算，当事人很难表达自己的意愿。女性在婚姻家庭中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丈夫连说三个“塔拉克”就不得不离婚。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向往自由恋爱，在配偶选择上，父母逐步退出，更多的是由年轻人自己决定。女性在婚姻家庭中地位逐步提高，男性离婚更加慎重，也会更多地征求女方的意见。传统婚礼上，只要由宗教人士念过“尼卡”就成为“合法”（教法）夫妻，体现出宗教在婚姻中的在场原则及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现代婚礼仪式中，依然有请宗教人士念经证婚的习俗，但前提是男女双方已经领取了结婚证。因此，现代婚礼仪式中的“念尼卡”成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民俗仪式。

案例4：买某，男，43岁，维吾尔族，图市国企职工

我自己结过三次婚，第一次结婚时16岁，太小了，念个“尼卡”就结婚了。因为我以前经常

不在家，前妻和我的父母关系不太好，经常吵架，我有一次回来后听说她又和我父母吵架了，我就说这样不行，你和我父母吵架我就不要你了。我离婚时还不到二十岁。其实我还是挺爱我第一个老婆的，我们俩的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也有自己的孩子了。那时候太年轻了，太冲动。你们在大城市工作的多好，恋爱自由，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妻子，我们以前可都是父母说了算，一点选择余地都没有。婚后幸福不幸福得看运气。我现在很珍惜自己的媳妇，每天下班回家我能多干就多干点，我也不会把家里所有活都扔给我媳妇，她在家里要做家务，还得伺候老人孩子，地里的活也得干，挺不容易的。

笔者数次去图市调研都住在案例4受访人买某家里，他自己在企业工作，下班回到家里收拾庭院、打扫卫生、喂食羊群、照顾孩子、帮忙做饭，忙前忙后几乎一刻也不闲着。传统维吾尔家庭中，男性几乎不参与家务劳动，女性除了必须承担繁杂的家务和田地里日常劳作外，动辄还要遭受丈夫及家人的辱骂甚至殴打。与此相比，买某对婚姻的观念更现代化，具有明显的夫妻平等意识。

在传统的婚姻中，结婚念“尼卡”、离婚说三个“塔拉克”表明宗教在婚姻中的神圣地位。宗教极端主义蛊惑信教群众“领结婚证是‘哈热木’”，一些信教群众受到蛊惑煽动之后撕毁结婚证。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婚姻法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宣传，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逐渐认识到结婚证作为国家颁发的证明婚姻合法有效的证件，具有保护婚姻双方尤其是弱势一方合法权益的作用。

案例5：王某，汉族，男，54岁，兵团某单位干部

2015年我在“访惠聚”时，有一次在连队遇到年纪不大的一男一女抱着孩子在外面玩，我就过去和他们聊天。目测孩子年龄和他们自己的年龄，我估计他们结婚时应该不到18岁，就请他们拿出身份证，一看果然没错。经过询问得知，他们确是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就经伊玛目非法念“尼卡”结的婚。

长期以来南疆地区宗教氛围较浓，加之少数民族群众受传统思想影响较大，相当数量的群众分不清国法与教法，甚至在某些人的思想里存在教法大于国法的观念。近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经过不断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不论是宗教人士还是普通群众，法律意识逐渐增强，教法大于国法的错误认知被逐渐扭转。

案例6：阿某，35岁，男，维吾尔族，图市出租车司机

我的婚姻是父母介绍的，结婚之前就没见过面，领结婚证时才见到第一面，相互一点都不了解就结婚了，婚后磕磕绊绊，经过了多年的磨合婚姻生活总算过得舒心一点了。如果我再有一次机会的话，我会通过自由恋爱来选择自己的妻子。我觉得还是现在的年轻人好，婚前自由恋爱，相互了解性格，婚后矛盾少。我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自由恋爱，我也不会管他们的婚姻，这对他们也好。

案例6中受访人所述的情况在过去是常态。传统家庭关系中，父亲是家中的绝对权威，子女婚姻完全由其说了算，这也就导致许多年轻夫妻婚前相互毫无了解，婚后婚姻不稳定，婚姻生活不幸福，离婚率较高。现在城镇年轻一代的父母在子女婚姻问题上与老一代相比已经有了明显变化，一方面是父母逐渐树立尊重子女自由恋爱的意识，另一方面是年轻人对自由恋爱的婚恋形式普遍比较向往。

案例7：吐某，维吾尔族，男，50多岁，图市周边某团群众

我四个女儿，老大、老二已经出嫁了，老三女儿初中毕业后正在图市大唐技校学护士，下学期就要到石河子大学的护校去学习了。毕业以后留在石河子也不错，找对象的事情我尊重孩子的意愿，她找个汉族丈夫我也满意，这没什么不好的，汉族小伙子勤快。只要他们幸福就好。

案例7表明少数民族群众的择偶观也在发生变化，择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本民族或者是否信仰同一宗教，而是以婚姻是否幸福为标准。课题组成员在调研时，还接触到了数例与本案例中的吐某想法类似的群众。在他们的表述中不再提到因信仰不同、民族生活习惯不同而反对跨民族婚姻。群众对跨民族婚姻态度的变化表明宗教因素在婚姻中的重要性下降。

案例8：阿某，维吾尔族，男，24岁，图市某维修店工人

我父母都是连队农民，妈妈四十多岁，爸爸快五十岁了。前年，我认识了一位女孩，她离过婚，但我们俩相互喜欢，可我的父母不太同意我们的婚姻，嫌弃她不会过日子。我俩都在图市上班，现在也不管他们怎么想了，毕竟以后的日子是我们自己过。我和那个女孩现在已经领了结婚证共同生活了。

在传统的维吾尔族家庭，子女婚姻父母说了算，案例8中的阿某属于自由恋爱结婚，尽管父母一直不满意，但是他已经坚定地 and 女方领取了结婚证开始了共同的婚姻生活，而他们的父母也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案例9：阿某，乌孜别克族，男，50岁，图市某团副团长

这两年我都撮合成几桩维汉跨民族婚姻了。以前在宗教极端思想的蛊惑之下很多人对跨民族婚姻有顾虑，担心信仰问题，担心生活问题，更担心来自社会的压力。但是现在看来这些都不是问题，就我所知我介绍那几对都很幸福。现在社会宗教氛围逐渐淡化，社会风气正常了，年轻人的择偶观不再受到极端宗教思想的干扰。不过刚开始给一位维吾尔女孩父母做思想工作的确很不容易，年轻人双方都谈婚论嫁了，女孩的父母就是不同意，我先后三个月才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最后同意女儿和汉族男朋友结婚。

不可否认，跨民族婚姻的确存在因为语言、生活习惯、信仰方面的差异而产生冲突的潜在可能，但是能够最终走到一起一定是跨越了这些障碍。在过去，更大的障碍来自于亲人的不解、社会的压力，而这些压力的存在与宗教极端思想的干扰不无关系，现在宗教氛围逐渐淡化，人们开始以理性的心态看待跨民族婚姻。

此外，从婚礼举办的形式来看，现在在城镇婚礼举行地点也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婚礼一般在自己家里举行，现在在城镇，婚礼的地点则在酒店。农村各个连队都修建了自己的活动中心，婚礼也可以在这些公共场地举办。

三、对子女学校教育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

过去一段时期，因为受到极端思想、大学生就业难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些群众对子女是上学还是“念经”的问题往往存在错误的认识，甚至把宗教信仰与民族捆绑，认为某个民族与某种宗教信仰是一体的，部分群众甚至放弃学业送子女去地下教经点学经，还有些群众拿子女是否学经、学经多少进行攀比。近年来，随着国家各种惠民政策在南疆的落实，以及十五年义务教育全面实施，尤其是就业惠民政策的落实，群众对子女上学之后的前途充满信心。

案例10：艾某，维吾尔族，男，50岁，图市民宗局干部

我们两口子都是国家干部，我们三个儿子。我自己毕业于喀什师院（现喀什大学），我们家老大、老二都在乌鲁木齐上大学，老大在医学院，老二在新师大。老大目前读研究生，老二说他也想上研究生，这个我是完全支持。今年最让我操心的事是老三，他要高考了，孩子学习还可以，希望能够考个好学校。上个好大学是孩子的心愿，也是我们的的心愿。

案例10中，艾某作为国家干部，因为工作需要自己孤身一人在图市，妻子在喀什市边工作边照顾孩子上学，他们的大儿子从医学院毕业后在喀什工作了一年，认为自己医学知识还有不足，又攻读硕士研究生。二儿子在师范院校学习，在哥哥的影响带动之下也准备考研究生。艾某夫妇

的心愿是希望三儿子学经济专业。

案例 11: 吐某, 维吾尔族, 男, 50 多岁, 图市某团职工

我家里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是养牛、养羊、种地。我四个女儿, 老大、老二已经出嫁了, 老三初中毕业后正在图市大唐技校学护士, 下学期去石河子大学的护校学习。希望她好好学习, 将来能在图市医院工作, 那我就很满意了, 如果能在石河子或者乌鲁木齐工作那当然更好。最小的女儿在图市上小学。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 孩子上学不要钱, 家里没有什么经济负担。我对现在的政策十分满意, 不担心将来孩子毕业之后的就业问题。

案例 11 中的吐某是连队普通职工, 家庭经济条件一般, 由于教育惠民政策、就业惠民政策的落实, 他切实享受到了政策所带来的福利, 因此对孩子的前途充满信心, 也十分支持孩子继续求学。在过去, 特别是在偏远地方, 对女孩子的教育一直以来得不到重视, 早婚是一个普遍现象, 至于嫁给谁更是父母亲说了算。但是在本案例中我们看到这位父亲更希望女儿在这个年龄段好好接受教育, 这表明群众在教育理念上的积极变化。

案例 12: 买某, 维吾尔族, 男, 80 岁, 图市某团退休职工

我七岁开始为连队放羊, 一直到退休。我从小没上过学, 维吾尔文也不认识。现在我每天早上吃过早饭就骑三轮车去连队喂羊, 晚上回到团部。有三个孙子在上大学, 有个在乌鲁木齐, 还有个在内地。我每月从退休金里拿出一部分给他们做生活费。我们在团部生活, 方便照顾在团部上学的孙子, 希望他们好好学习。

案例 12 中的老人是兵团老职工, 退休后随大流参加宗教活动, 并在当时社会朝觐热的影响下去麦加朝觐, 经过政策宣传教育之后不再参加宗教活动, 现在生活的重心基本放在带孙子、帮子女劳动等, 目前在城里照顾孙子上小学, 孙子上学之后自己骑电动车回到连队给牛羊喂饲料。

案例 13: 安某, 维吾尔族, 男, 50 岁, 原某团连长

我在连队任过连长、书记, 2015 年辞掉了连长, 主要原因是连长的工资比较低。现在我有两个女儿在上大学, 一个在北京科技大学, 一个在新疆师范大学, 小儿子也上八年级了, 学习也挺好。两个孩子上大学的学费、生活费比较高, 连队收入根本不够。辞职之后除了种地的收入, 冬天贩卖红枣, 夏天贩卖牛羊, 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 10 万元以上。希望将来孩子们能留在大城市工作, 大城市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现在的政策这么好, 孩子好好学习将来就有好的前途。

案例 14: 艾某, 维吾尔族, 男, 56 岁, 某团前连长

我家四个孩子, 老大参军, 现在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老二大学本科毕业, 现在在巴楚县县政府工作, 是公务员。老三是女儿, 目前在昌吉学院上本科, 英语专业。老四是儿子, 2018 年考上乌鲁木齐一所大学, 当初我们不知道是个什么性质的学校, 孩子去上了一段时间才知道是民办的, 现在回来复读, 准备再考一次上个好点的大学。

案例 13 中的安某作为曾经的连队领导, 视野开阔, 很有经济头脑, 他一直比较重视子女的教育, 对子女的教育比较成功, 为此他自己也很自豪。安某为了孩子辞职经商, 还希望孩子能够上研究生, 进一步提高学历。案例 14 中的马某对子女的教育也十分成功, 很多连队职工也很羡慕他。

案例 15: 帕某, 维吾尔族, 女, 44 岁, 某团群众

我有四个孩子, 老大已经上大学了, 其余三个孩子都在上中学。现在孩子们上学都在图市, 离家远一点, 在校寄宿。为了增加一点收入, 我自己也在图市林管站打工, 如果家里没有事情, 我一般不回家, 就在图市居住。每月打工收入有 1300 元左右, 另外还有土地出租收入。现在主要是老大上学费钱, 三个小的上中学花费不高, 我打工的收入就够用了。希望三个小的孩子好好学习, 将来都能考上大学。

案例 15 中的帕某有四个孩子, 在连队属于正常, 她最大的心愿是孩子们都能够上大学, 将来

有份好的工作，为了能够让孩子上大学，她说自己辛苦一点也值得。

案例 16：热某，维吾尔族，女，56 岁，某团职工

我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我们的主要经济收入是在种植场打工的收入，我们老两口每人每月 2000 元左右，另外还有一些土地流转费收入。住在图市消费太高了，水、电、菜都需要钱。家里现在住的楼房是给贫困户的安居房，只需要缴纳少量的房款就可以入住，大部分是国家补助的。进城之后虽然消费高，但是工作的机会多了，另外我们在城里居住，孙子上学都方便，我们也方便照顾他们。我们和两个孙子在城里居住，儿子们在连队种地。

案例 16 中受访者热某夫妇将自己的土地全部流转给种植场，然后被种植场聘用为工人，他们获得土地流转费及工资两份收入，同时自己也选择进城入住，一方面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另一方面孙子们可以在图市接受更好的教育。像热某这样的情况在图市比较普遍，尤其是城郊连队职工，市场意识比较强，他们较早进城从事第三产业，子女也随之进城就学。目前该团的幼儿园、小学、中学都集中建在图市，学校软硬件设施良好，尽管离家远一点需要寄宿，但是许多父母为了子女得到良好的教育还是乐意送子女进城就学。

案例 17：帕某，维吾尔族，女，19 岁，图市某团，乌市大学在读

我 2018 年考到了新疆教育学院，录取通知书出来前我一直拿着手机等待，当我从手机看到我的录取通知书时我特别高兴，当时五家渠那边的亲戚（“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结亲户）都在，他们都祝贺我。我是我家族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爸爸妈妈也特别高兴。我的弟弟妹妹也都特别为我自豪，他们都说要像姐姐一样上大学。

从以上各个案例的访谈中，笔者感受到图市少数民族群众对子女的教育越来越重视，对子女能够上大学充满期望，同时也很为子女考上大学感到自豪，家庭生活重心也基本围绕着子女的教育。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群众的生活重心、关注焦点的转移。这种社会氛围的形成一方面是国家对少数民族教育、就业、民生等大力投入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少数民族群众切实感受到了政策倾斜给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变化，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视野日益开阔，宗教意识日益淡化。

四、各类传统宗教节庆、宗教仪式的民俗化

宗教节庆礼仪对于激发宗教感情、强化宗教意识和扩大宗教影响都具有特殊的意义，故宗教节庆礼仪活动历来为各宗教组织所特别重视。维吾尔族传统节日古尔邦节、肉孜节等，是与伊斯兰教有关的节日，但是目前更多体现出民俗的特征，宗教仪式与娱乐活动相结合，民俗性、娱乐性的含义正逐渐超越宗教含义。

案例 18：艾某，维吾尔族，男，图市民宗局干部

信教群众的宗教情感十分朴素，对许多信教群众来说宗教活动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前，主麻日聚礼、一年两次的会礼，大一点的清真寺参与宗教活动的人数动辄成千上万，但是现在除了老年人，一般年轻人都去上班了，大清真寺有几百人参与会礼已经算是多了。

案例 18 访谈中艾某作为主管宗教工作的领导干部，对图木舒克市当前的社会宗教氛围从宏观上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他认为，一是参与重大节庆参与宗教活动的信教群众总数出现大幅下降，表明信教群众参与宗教活动热情下降；二是参与宗教活动的年轻人人数较少，一方面表明年轻人参与宗教活动热情低，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通过各种就业惠民政策，年轻人就业率显著提高；三是各级政府组织政策宣传教育成效显著，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逐步深入人心，群众对国家的认同度增强，信教群众对政策的理解掌握较好。

案例 19：买某，维吾尔族，男，42 岁，图市企业职工

我们连队以维吾尔族为主，连队南面就是汉族连队。我们单位也大都是汉族。现在每年春节

我们也学汉族在家大门上贴上红对联，觉得贴上对联挺喜庆的。我的汉族朋友非常多，我给汉族朋友用手机发短信、微信拜年。端午、中秋节也会互相问候。前几年过春节刚开始贴，有些人不知道把对联贴到大门上，而是贴在家里的墙上，有些人甚至把对联贴颠倒了（不认识汉字），现在慢慢都知道怎么贴了。现在也有很多维吾尔族知道汉族过年有吃饺子的风俗，去年春节期间亲戚来连队，我看家家户户都是给亲戚包饺子吃。我们现在过古尔邦节、肉孜节跟你们过春节一样，主要是朋友亲人聚会，一块儿吃吃饭，热闹一下。我一直在外面上班，没去过清真寺。连队有清真寺，现在过节也没几个人去，除了一些老年人。

2019年斋月期间，开斋节当天位于图市的主麻清真寺，参加会礼的人数有五百多人，与过去宗教氛围浓厚时期上万人乃至数万人参加形成鲜明对比。目前，从实际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图市传统宗教节庆、宗教仪式的娱乐功能、民俗意味在增强。宗教节庆活动群众参与程度的大幅下降，一方面是由于群众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另一方面也表明宗教节庆在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下降，人们的精神生活正在由单一向多元、传统向现代转变。

五、宗教对信教群众生活的影响力逐渐弱化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体，不仅具有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且还有其特殊的经济基础，并发挥着特有的社会经济功能。宗教实体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可以直接量化的指标有两个：一是宗教实体成员数目的量度指标，二是经济实力的量度指标。宗教意识、宗教组织、宗教礼仪、宗教政治和宗教文化等功能性作用的发挥，都要以宗教实体的经济实力为基础。一切宗教都会因其经济的兴旺而发展，因其经济实力的衰退而削弱，因其经济力量的丧失而消亡，宗教发展的历史本身就证明了这个规律。^①

案例 20：热某，男，维吾尔族，某清真寺住村管寺干部

禁止清真寺收取各种捐赠之后信教群众的经济负担轻了，普通信教群众来清真寺就是单纯的宗教活动，不再具有任何经济负担。以前不一样，修清真寺需要集资，社区聘请宗教人士需要出资，宗教人士的生活费需要出资，各类宗教节庆活动等等都需要信教群众出资。有些地方修建豪华清真寺，各地相互攀比，信教群众的经济负担更大。经济条件好的地区不算什么，但对经济条件不好的南疆少数民族群众来说负担却不小。南疆少数民族群众整体收入较低，群众贫困率较高，你把钱都花在宗教活动上，精力也都投入到宗教上，那你投入到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精力、资金就没有了，没有精力、没有资金，还谈什么发展，脱贫致富也就是空话了。

伊斯兰教的宗教课税“扎卡提”或天课虽然早已被明令禁止，但是，一直以来清真寺还是以各种形式收取信教群众的捐赠，在过去宗教氛围浓厚的时期有些地方甚至一度恢复宗教课税，一方面清真寺本身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也给信教群众造成较大的经济负担。宗教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其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在加强，对于社会问题也越来越有发言权。2017年自治区出台相关政策，禁止清真寺收取信教群众的各种捐赠，合理地引导信教群众的价值取向，减少攀比浪费等不良社会现象。清真寺不再收取捐赠之后信教群众的经济负担减轻了，精神压力也减小了，可以把精力投入到发展经济之上。此外，宗教人士在对信教群众进行宗教方面的服务时收取一定费用，而极端分子是无偿的，无形当中对信教群众产生较大的吸引力，这也成为宗教极端分子攻击爱国宗教人士的一个口实。通过禁止清真寺收取信教群众捐赠，消除了信众通过正规渠道参与宗教活动、获得宗教服务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对抵制极端势力，引导宗教活动在合法、正常的范围内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 陈麟书、陈霞：《宗教学原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25页。

案例 21: 文某, 男, 汉族, 图市某团清真寺驻村管寺干部

清真寺的维护、电费、水费, 这是一笔很大的支出, 以前都是信教群众自己出。有些清真寺修得很豪华, 对信教群众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 甚至一个连队修几个清真寺, 聘请宗教人士的费用也得信教群众自己负担。

清真寺的维护运转需要经费投入, 尤其一些大型清真寺维护经费投入更是巨大, 这些经费都来自于信教群众, 对信教群众在经济上造成一定影响, 更重要的是群众无心发展经济, 不正常的宗教氛围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巨大干扰。目前当地群众的关注焦点逐步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来, 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增多, 一部分群众在本地可以实现就业。通过劳务输出的形式, 一部分少数民族也可走向内地就业市场实现就业。一般中青年人就业之后就不再去清真寺了, 他们把精力投入到了发展经济上, 宗教的社会影响力因此也会逐渐减弱。

案例 22: 张某, 41 岁, 男, 汉族, 兵团某单位干部

2016 年, 我们第一次看望亲戚, 从乌鲁木齐带礼物过去太重, 我们计划到图市之后再买。我们在一家超市买一些食品的时候, 专门找有清真标识的商品。超市老板说你们不用找了, 普通食品没那些标识, 再说人家维吾尔族群众现在自己来超市购物都不管那个了。我们听了之后才放心购买。

在极端宗教思想的蛊惑下, 一个时期以来清真泛化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 甚至一些人借此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宗教的社会影响力出现不正常的扩大。近几年来, 经过对清真泛化问题的大力治理, 社会氛围渐趋正常。

案例 23: 崔某, 41 岁, 男, 汉族, 兵团某单位干部

我的结亲户原来是连队清真寺的伊玛目, 现在辞职不干了。他自己在连队开了一个小饭馆, 每到礼拜时间都得放下饭馆的生意去主持礼拜, 太影响做生意了。在清真寺当伊玛目虽然有政府发放的生活补贴, 但是一个月只有 400 多块钱, 按现在的物价水平有点少, 孩子结婚要花钱, 生病要花钱, 修房子要花钱, 根本不够。再说现在做礼拜的人越来越少, 宗教活动越来越冷清, 他自己说感觉没有存在感, 体现不出自己的价值。

案例 23 中辞职的伊玛目是出于经济的考虑, 从经济人的角度讲这无疑合理的决策。信教群众一天五次的礼拜活动的确不适应现代的生活节奏, 传统式的宗教活动与现代快节奏的工作生活方式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矛盾, 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工作机会, 在宗教与工作之间他必须有所取舍。

案例 24: 热某, 男, 维吾尔族, 70 岁, 某团清真寺前伊玛目

我年轻的时候学的经, 在连里当了三十多年的伊玛目。我没去经文学学校学习过, 也不懂阿拉伯文。现在年纪太大已经辞职了, 以前当伊玛目的时候有国家发放的生活补助, 但是辞职之后就没有了, 另外年龄也比较大了, 地也种不成了, 我正在向连队申请, 请连队帮忙联系到什么地方去当大门执勤人员。现在政策好得很, 我相信连队会帮忙解决生活问题。

在宗教氛围浓厚时期, 宗教人士在信教群众中地位较高, 宗教人士备受尊崇, 宗教教职人员炙手可热, 有些家庭往往萌生让子女从事宗教职业的愿望, 在父母等亲人的鼓励支持下一些青少年走上了宗教学徒道路。这一方面是出于朴素的宗教观念, 另一方面是出于提高家族在当地社会地位、社会影响力的需要。现在却是宗教人士主动辞职从事其他工作, 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宗教氛围的淡化和宗教热的冷却, 以及宗教对信教群众的影响力的下降。

宗教自身经济基础的弱化在客观上使得宗教的社会影响力下降, 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宗教职业对少数民族青少年及其家长的吸引力, 使人们从事宗教职业的意愿降低,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现实的生产生活中去, 从而进一步促了进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转型。

责任编辑: 杨松禄

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个案研究

——以丽江市为例

赵润华

(丽江市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丽江 674100)

摘要: 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新形势下做好民族工作的内在要求。云南省丽江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的嘱托, 正抓紧抓实加快推进创建工作。基于丽江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现状, 丽江市采取了加强组织领导、着力改善民生、深化宣传教育、巩固创建阵地等方面的实践举措。研究发现, 当前创建工作存在经济发展滞后, 示范区建设资金投入不足; 短板问题突出; 产业结构单一, 部分示范点建设特色不突出, 与示范区建设标准差距大; 重视落实不够, 责任监督问效不到位等问题。由此, 建议通过提高思想认识, 建构示范区建设的合力机制; 深化宣传教育, 改进宣传教育的载体和方式; 夯实巩固成果, 提升创建工作水平; 增进民生福祉, 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政策举措进一步加快创建进程, 提升创建水平。

关键词: 丽江市; 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区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3-0042-07

丽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和多宗教并存的地区, 位于长江经济带金沙江段的重要节点, “美丽的贫困”依然是该市的基本市情。全市有2个少数民族自治县、15个民族乡、11个世居民族(汉、纳西、藏、白、傈僳、彝、普米、苗、壮、傣、回), 全市总人口中少数民族占比为60.9%, 在云南省16个州市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高。丽江是纳西族、白族、藏族和汉族等多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的交融区, 也是我国古代“茶马古道”的重要枢纽, 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在这方风光多样、生物多样、文化多样的土地上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共处共生关系。

加快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创建, 将有利于提升丽江城市品牌形象, 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丰硕成果, 并促成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在滇西北形成“示范带”“示范圈”, 进而巩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的长治久安。

一、丽江市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实践举措

近年来, 丽江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立足市情、丰富内涵、创新形式, 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大力改善各族群众民生福祉, 全市各族人民的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巩固提升。

基金项目: 2019年度云南省社院(校)科研协作课题“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建设个案研究——以丽江市为例”(2019SYXTB022)。

作者简介: 赵润华, 丽江市社会主义学院市情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讲师, 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一）加强组织领导，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的政治基础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为思想引领，以打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展示窗口为工作目标，扎实推进各项创建工作。

1. 强化顶层制度设计，明确建设目标

对创建工作的重点任务进行分解，以指标的形式促使创建工作的各项任务具体化、可量化。制定了《关于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民族团结进步创一流的实施意见》《丽江市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实施方案》《丽江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2019年工作积分标准》《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施方案》等规范性文件，明确提出到2020年把丽江市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的展示窗口。^①从政策层面对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的意义要求、步骤任务、措施保障等方面作出具体安排和部署。

2. 加强组织领导，夯实政治责任

在创建过程中始终秉持以民族工作谋划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注重强化党对创建工作的领导地位。第一，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履行增进民族团结的政治责任，明确要求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配齐配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县（区）认真落实副处级以上领导挂钩互观互检迎检点制度，确保创建工作能落地、见实效。第二，将创建进展情况纳入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议题进行专题研究，通过定期召开常务会议听取工作开展的汇报，分析研判存在的问题和短板，着力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第三，严格执行月报告和月通报制度，强化各级各单位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抓细抓实，把创建工作抓在平时，抓在基层。第四，加强调研督导，找差距、补短板。市委书记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专题调研提出具体要求，市委统战部长、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深入县（区）调研督导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为基层问诊开方。

（二）抓牢发展第一要务，打牢民族团结进步的物质基础

丽江市矢志不渝坚决完成全市各民族共同步入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聚焦经济发展，聚焦精准脱贫，着力提升民族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全市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均得到明显提高。

1. 着力补齐短板，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一是，高速公路通达和里程不足短板正加快补齐。在建的5条高速公路工程顺利推进，已经建成通车的永宾高速公路，华丽、丽香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二是，民航和铁路加快升级，动车实现零的突破。国际航线新增15条达78个通航城市。大丽铁路加快升级，动车实现从无到有零的突破，每天有进出丽江市动车10对。三是，水电、通信基础设施持续改善。如玉龙县龙蟠乡的提水工程、永胜县程海的补水工程均已开工建设，金沙江中游航运基础设施建设正着力推进，全市水库蓄水总容量3.96亿立方米。加快农村电网、城市配电网改造升级，云南省首个5G试验基站顺利开通，深入实施“智慧丽江”“互联网+”建设。

2. 聚力动能转换，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第一，旅游产业平稳增长。全市以旅游整改为重要契机，不断提高旅游的内涵和服务质量，2019年来丽游客第一次超过5000万人次大关，旅游总收入第一次达千亿元。第二，高原特色农业迅速发展。不断强化各县（区）农业的标准化、示范化建设，逐步形成一县一特色的产业格局。永胜县被国家列为产粮大县，华坪县被云南省评为一县一特色产业示范县，玉龙县被云南省评为旅游扶贫示范县。第三，新型工业发展有新突破。丽江市双创园入选省级创业园区，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丽江分中心成立，5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新型工业发展增速创近6年来新高。

（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的社会基础

自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按照云南省的统一部署，丽江市脱贫工作总体框架是以国家提出

^① 赵坤玉：《我市出台实施方案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丽江日报》2018年8月3日，第1版。

的“两不愁三保障”扶贫政策为引领,结合实际,扎实推进精准脱贫,不断提升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水平。

1. 聚焦底线任务,扎实推进民族地区精准脱贫

第一,攻坚战役破障前行。2014年以来,全市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19.9万人减至2019年的0.94万人,共脱贫18.96万人,年均脱贫2.7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原来22.14%下降到1.01%。^①

第二,既定贫困县如期实现脱贫目标。通过共同努力,2018年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已通过脱贫验收,2019年永胜县做实脱贫验收准备工作,2019年宁蒗彝族自治县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基本达标。第三,全市境内的直过民族傈僳族,人口较少的普米族均已实现脱贫致富。着力抓好三峡集团、大唐集团、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集团帮扶对丽江市少数民族(普米族)、直过民族(傈僳族);玉龙县、宁蒗县普米族;永胜县、华坪县傈僳族聚居区精准脱贫。第四,全市所有涉藏乡(镇)已全部脱贫出列。贫困地区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贫困群众获得感、幸福指数与以往相比明显增强。

2. 强化政府职能,加快民族地区民生事业发展

第一,大力推进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着力推进学前幼儿园建设,全市适龄儿童的毛入园率为77.87%,公办幼儿园的毛入园率则占比超过85%。完成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验收评估,小学毛入学率为116.54%,巩固率为99.64%,初中毛入学率为126.36%,巩固率为98.58%,进城务工随迁子女100%入学就读。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1.5%。^②第二,城乡人居环境得到质的提升。全市各乡镇的“厕所革命”项目如期完成,城市垃圾分类正式启动,水生态文明城市创建通过验收,仅2019年就完成棚户区改造3450套、农村危房改造2.43万户。第三,大力推进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建设。全市村卫生室已完成达标建设,分级诊疗制度正积极推进,市妇幼保健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市中医院等项目正全力推进。

(四) 巩固创建阵地,增强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基础

阵地建设是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性工作,丽江市立足自身实际,始终坚持立标杆、树典型,不断巩固和完善阵地、渠道建设,积极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建设。

1. 着力培育领头雁,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建设

第一,紧盯目标,打破丽江市长时间没有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的“尴尬”局面。补齐创建工作短板,强化点对点指导。2019年12月,古城区大研街道义尚社区文林村民小组成功入选第七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单位)。第二,积极选树典型。2019年9月,古城区大研街道办事处、华坪县人民政府成功入选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丽江市民杨文胜、马红升评选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受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大会的表彰。^③截至2019年,全市已有11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11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2. 巩固主渠道主阵地,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第一,创建过程中注重深入基层社区。大研街道北门社区的民族杂居现象较为突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显得尤为重要。为有效促进各民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北门社区以城市基层党建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创建相结合的方式,共同推进原住民与“新丽江人”共建共享共治的局面。第二,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学校。3名教师获得云南省第三届民族团结教育创新活动一等奖,7名教师参加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说课比赛并获奖,全市有81所学校创建成为云南

^① 丽江日报评论员:《进位升级成效显著——一论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四届七次全会精神》,《丽江日报》2020年1月16日,第1版。

^② 金振辉:《丽江市教育短板调研报告》,《2018年丽江市调研课题报告汇编》,2018年12月。

^③ 李映芳:《丽江2个集体和2名个人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丽江日报》2019年10月1日,第2版。

省民族团结教育示范学校。第三，狠抓旅游服务窗口的创建工作。把民族元素、民族风情、民族文化融入为来丽游客提供优质旅游服务中，做到民族团结创建深入优质服务窗口建设，把旅游服务窗口打造成展示民族团结进步良好形象的最大平台。

（五）深化宣传教育，筑牢民族团结进步的思想基础

不断强化对全市各族干部群众的宣传教育，通过丰富和完善宣传教育的载体，引导各族干部凝心聚力谋发展，齐心协力促团结，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认知。

1. 强化对干部职工的民族团结教育

一是，将各级党组织学习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作为一项硬指标抓紧抓实。通过“三会一课”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宗教工作重要论述精神，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及时走进各级党校、社会主义学院（校）课堂，做到日常学习与专题学习共同抓。二是，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温国史党史，教育引导干部职工全身心投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实践中。三是，注重将宣传教育融入各项工作中。利用“法宣在线”平台，面向丽江市干部开展了民族宗教相关法律法规的知识比赛。积极发挥市、县（区）工、青、妇等组织的作用，向广大会员、妇女同胞、青少年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会同各级扶贫部门，在精准脱贫过程中组织开展创建宣讲活动，使创建工作深入扶贫一线。

2. 注重群众性交流活动的宣传教育

第一，制作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动漫视频。以在公共场所的LED屏进行播放等形式，提高群众知晓率，促进各族群众积极参与创建工作。第二，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强化“网络宣传+”。建立“丽江民族团结进步”微信公众号，在“丽江统一战线”“古城之窗”“玉龙之窗”“美丽华坪”“民族团结进步中的永胜”“宁蒍新闻”等微信公众号发布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标语，发布创建工作动态，加强对创建工作的宣传。第三，注重节庆活动这一重要载体的宣传作用。丽江市民族分布众多，民族节庆参与面广、参与人数多，尤其在火把节、阔时节、三朵节等重大节日节点，积极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极大促进各民族间和衷共济、和睦相处。

二、丽江市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面临的挑战

总体来讲，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全市各级干部团结一心，共建共创，逐步形成了党政主导、共建共享的创建工作格局，但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仍存在重视不够、群众参与度不够、监督问效不足等问题。其中，丽江市各级财政财力有限，脱贫攻坚任务较重，对创建工作资金投入较为有限，成为创建工作中最大难题。

（一）经济发展滞后，示范区建设资金投入不足

全市经济“总量小、基础弱、市不强、民不富”这一基本面依旧没有改变，造成示范区建设投入资金不足，可投入的配套资金有限。第一，经济总量小、财政收入低。2018年全市GDP为350.8亿元，仅占全省GDP的2%，^①市、县两级财力困难，实际上投入的配套资金非常有限。第二，经济增速慢。2018年同比增长9.3%，2019年同比增长10%，增速虽然在全省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但与排名靠前的怒江、楚雄、文山等州市相比差距较大。第三，群众收入较低。2018年丽江市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2835万元和1.0377万元，与全省3.3488万元和1.0768万元、全国3.9251万元和1.4617万元相比^②，差距明显。

^① 崔茂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云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推动丽江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丽江实践前言》2019年第3期，第5页。

^② 崔茂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云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推动丽江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第5页。

（二）短板问题突出，与示范区建设标准差距大

丽江市民族地区发展条件仍十分滞后，与示范区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各民族共同繁荣还需下很大功夫。第一，城市化率低、交通基础薄弱。全市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92.3%，截至2018年底，城市化率仅为40.44%，^①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突出，全市高速公路仅有68公里，不足全省的2%。^②第二，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全市目前还有0.94万人没有脱贫，这近1万贫困人员的脱贫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激发、长效产业支撑及就业支撑还存在诸多不足。第三，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方面与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存在一定差距。全市仅有一家三甲医院，每万人拥有床位数比全省平均水平少8张。

（三）产业结构单一，部分示范点建设特色不突出

丽江市产业发展质量不高，导致部分示范点建设特色不突出，产业支撑乏力。第一，产业结构还十分单一。经济发展主要还是依靠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基础非常薄弱，培植示范点产业的力度不够，不能形成特色优势产业，效应不明显。第二，产业发展互助金的使用尚处于探索阶段。产业发展互助金的使用制度化、规范化不够，农户使用资金呈分散化，使用的管理难度大，尤其资金回笼存在一定风险，产业发展互助金未能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第三，示范点建设中民族特色运用不突出。丽江市民族文化多元荟萃，各民族地方文化底蕴浓厚，但在示范区建设中未能充分挖掘，开发特色资源不足，已打造的点示范带动不充分。

（四）重视落实不够，责任监督问效不到位

示范区建设是推进实现丽江市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应有之义，但从近来开展工作的情况来看，各级各部门不同的程度存在着“调门高、落实差”的情况。第一，对创建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部分市级部门、县（区）对示范区建设工作重视不够，主动参与并承担创建工作的意识不强。即使参与，创建工作的内容形式、方式方法单一，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不够。第二，部门间协同发力不够。示范区创建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系统工作，丽江市虽相继出台实施意见和实施方案等相关制度文件，但不少部门、区县片面地认为创建民族团结示范区是民族工作部门的职责，各自职责履行不到位的问题较为突出，民族工作部门单打独斗，全市还没有形成共创联动的合力。第三，考核问效力度不够。至今尚未出台示范区建设的针对性监督考核制度，对示范区创建的工作进展、落实情况的监督问效主要以民宗部门的检查为主，市级层面对成员单位的压力传导不够、跟踪监督问效落实不足，对涉及创建的其它部门的工作落实情况督查基本没有开展。示范区项目建设工作滞后，示范区项目“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较为突出。

三、推动丽江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工作的路径

丽江市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意义十分深远，当前创建示范区面临诸多挑战，但中央、省委相继出台的文件，为加快推进示范市建设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政策机遇。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围绕中心，突出特色，以务实有效的举措不断推动示范区创建人文化、实体化、大众化，努力营造丽江市各民族群众一家亲的社会氛围，最终为实现丽江市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一）提高思想认识，建构示范区建设的合力机制

习近平同志早在2011年9月就对云南民族工作时作出重要批示，强调“为把云南建设成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不懈奋斗”^③。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思想认识，

^① 丽江市统计局：《丽江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 崔茂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云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推动丽江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第5页。

^③ 民族画报专题报道组：《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云南实践》，2018年4月27日，<http://www.mzhhb.com/dywh/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云南实践>，2020年4月26日。

全力建构共同参与示范区建设的工作格局。

1. 高位推进，建构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

第一，提高政治站位。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丽江市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内在要求。要从思想和行动上增强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云南创建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自觉，努力把丽江市建设成为民族团结示范的窗口，不负总书记对云南的重托和期盼，为奋力实现中国梦谱写丽江市民族团结进步的篇章。第二，加强组织领导。要把示范区建设作为党政一把手工作来统筹谋划落实，高位推进、层层落实、严格考核，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参与、全力推进、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全力全面推进创建工作。第三，健全协调配合机制。创建工作是一项需要多部门积极参与的系统工程，民宗部门要切实当好市委市政府的参谋、助手，强化与宣传部门、统战部门的协同配合，建立三部门通力合作机制，使创建工作深入全市各部门各领域各行业。

2. 加大投入力度，加快示范区产业发展

第一，向上主动争取项目、资金。创建示范区，丽江市确实存在很多短板和问题，任务很艰巨，除自身要积极谋划、主动作为外，应积极向中央部门、省级部门汇报和沟通示范区创建情况，努力向上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争取通过云南省民宗委对丽江市创建工作的初次检验，促成省民宗委推荐给国家民委，以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投入示范区建设。第二，加大整合力度。进一步强化对示范区创建资金使用的管理，做到专项资金专项使用，着力从制度上完善示范区建设各个项目的管理，使其真正产生示范、带动的效应。第三，加快示范区产业发展。科学规划示范区项目建设，立足民族地方的资源优势，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健全产业发展互助金管理制度，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助推示范点支持产业的发展。

（二）深化宣传教育，改进宣传教育的载体和方式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宣传的载体、教育的方式，强化群团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着力推动示范区创建的宣传教育走深走实。

1. 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教育

第一，强化群团组织的作用。各级群团组织联系群众密切，在创建过程中要积极作为，为各民族的交流沟通搭建好平台，引导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使全市各族人民群众树牢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认知，身体力行践行好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第二，强化宣传教育的内容。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全市各行业各领域的力度，深入挖掘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的精华，加强对新中国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宣讲和教育。第三，完善宣传教育机制。从严落实党的民族工作理论、方针、政策作为各级党组织重要学习内容的硬性指标要求，各级各部门主动认领创建示范区的任务，借助全市社会资源、教育资源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研活动和课题研究。

2. 丰富团结进步宣传载体和方式

第一，开展富有地方特色的群众性交流活动。各县（区）积极组织开展“中华民族一家亲”活动，继续办好丽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支持各县（区）举办地方民族节日，并以此为契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凝聚共同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第二，丰富完善宣传的载体和方式。将每年7月定为丽江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加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体现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文艺作品，定期开展民族团结创建媒体行，充分应用新媒体、新技术讲好丽江市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

（三）夯实巩固成果，提升创建工作水平

在夯实和巩固示范区建设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加强示范区和示范单位建设，不断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以推动示范区创建工作向纵深推进。

1. 巩固拓展创建的主阵地、主渠道

第一,深入开展“10+N”工作。全市各牵头单位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履行各自分管领域的创建工作,不断完善测评指标体系标准,巩固和夯实民族团结进步进“10+N”工作。第二,推动创建工作纵深推进。坚持重在基层、分级创建、分级负责,统筹分配资源、投入力量,通过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四级联创,提升创建工作覆盖面,强化干部、青少年、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信教群众等群体的参与力度,尤其使创建工作全面覆盖重点行业、窗口单位、基层政法单位和新经济社会组织。

2. 着力提升各项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第一,强化各民族群众法治意识的培养。不断健全完善涉及民族工作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加大宣传力度,抓好宪法日、普法宣传月等活动,积极引导各民族群众在生产生活中自觉做到尊法、学法、用法、守法。第二,依法开展民族事务工作。丽江示范区建设要始终遵循《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和巩固民族团结。第三,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定期召开会议分析研判民族宗教工作形势,健全完善重大突发事件新闻宣传快速反应机制,对涉及民族因素的舆论舆情及时加以正确引导。

(四) 增进民生福祉,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云南省作为拥有4800多万人口、发展滞后的边疆省份,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是对国家的责任和贡献。^①因此,要不断增进各民族的民生福祉,为使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而不懈奋斗。

1. 加快推进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一,坚持“各民族都是家里的一分子、好日子要一起过”的理念。充分考虑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坚持智志双扶,坚决打赢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加大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特色村寨建设的支持力度,以乡村振兴为抓手,促进民族地区农业全方位的升级、农村全方位的进步、农民全方位的发展。第二,加快推进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全力打好丽江市的“三张牌”,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大数据产业,绿色有机食品,要从政策、资金、项目上予以扶持,加快沙江绿色农产品品牌体系的打造,培养发展大健康产业,以坚实的物质基础深化民族团结进步。

2. 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文明城市创建相结合

第一,强化文明公约的宣传教育。通过倡导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让各族群众追求现代文明生活,将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行业规则、职业规划、团体规则等公民日常行为规范,融入民族团结进步元素,在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同时,积极营造民族团结的社会氛围。第二,服务管理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发挥社区便民中心、民族之家、民族文化室的功能,及时帮助解决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方面遇到的困难,使其更好地适应并融入城市。在公共服务窗口派驻少数民族工作人员,为少数民族群众提供便捷化的服务。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黄小军:《跨越式发展的思想纲领》,《云南理论网:滇云论坛第8期》,2015年3月17日, http://special.yunnan.cn/feature12/html/2015-03/17/content_3648633.htm, 2020年4月26日。

民族工作

和谐校园视阈下滇缅边境国门高校 大学生民族交往调查

——以 D 学院为例

杨楠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云南 临沧 677000)

摘要: 高校大学生的和谐交往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通过探讨滇缅边境国门高校大学生民族交往场域、去本民族固着、学习适应、生活适应、交往评估等方面,进一步对其交往现状进行了解和评估,结果发现:总体上研究对象在校内交往、交流以及适应方面状况良好,形成了和谐的交往现状。为此,应继续拓展高校大学生民族接触与交往的途径、重视课堂教学的思想引领作用、加强对大学生的心理疏导。

关键词: 和谐校园;滇缅边境;国门高校大学生;民族交往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0)03-0049-10

一、问题的提出

努力形成和谐的民族交往是新形势下做好民族教育工作的必然要求。以往研究表明,民族接触是改变消极刻板印象和促进民族关系的重要途径。社会心理学家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对美国不同地区的4个城镇的社会接触与民族态度做了调查,调查表明:民族之间的偏见与接触成反比,即个人接触越多,冲突就越少(偏见、歧视、敌意等)^①。接触理论认为敌意性的刻板观念源于社会性隔离以及受个人相识、了解的不完整的影响^②。国内高承海、万明钢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民族间的接触确实可以减少消极的刻板印象,增加积极的刻板印象,从而减少群际焦虑^③。同时,民族接触与交往还是民族团结教育生成的重要基础。严庆认为,民族团结教育的具体实施是在承认民族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引导受教育者尊重民族特点和文化差异,形成理性认知和对待民族差异的态度、情感和行为,从而在不同民族成员之间形成互相尊重、互相谅解、互相承让、互相接近、友好交往的态势和局面。缺乏具体民族接触与交往的民族团结教育具有较强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视阈下中缅边民跨境交往研究”(YB2019049)。

作者简介: 杨楠,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助教,主要从事民族教育研究。

① [美] Pettigrew T. 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8, P. 49.

② [美] Allport G. W.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54.

③ 高承海、侯玲、万明钢:《民族接触促进跨民族互动的心理机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30页。

的虚拟成分,在主观认识与现实行动之间容易产生差距。民族团结意识是“教育”出来的,也是“交往”出来的,而“交往”本身也是一种教育,同时也是对“教育”成效的检验。^①

滇缅边境国门高校大学生多民族交往、交流是边境地区社会是否和谐、稳定、繁荣的一个缩影,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生源的多元性决定了做好该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滇缅边境高校特殊的地理区位。滇缅边境一带主要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民众以畜牧、农耕为主要经济来源,生产资料结构单一而匮乏。受诸多条件的制约,该地区社会经济水平低、人口观念意识落后。加之,新中国成立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行渗透、颠覆、破坏和分裂活动,境内部分少数民族分裂分子与敌对分子利用边境接壤的特点制造民族矛盾,传播反动思想,企图达到分裂中国的阴谋,边境高校大学生或将成为其重点渗透对象。二是,滇缅边境高校生源具有文化多元性。校内除汉族外共有包括拉祜族、佤族、哈尼族、傣族等在内的38个少数民族,约4182名少数民族大学生,约占全校总人数的35%。在此背景下,同一场域中多元文化的接触、交织、碰撞必然会引起大学生文化心理变化,如不加以重视,久而久之则会形成文化的刻板印象,不利于民族团结、稳定发展。

二、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了西南大学周岚编制的信效度较高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心理适应问卷,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修改。根据研究的具体情况,在原问卷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维度并增删了题目。最终问卷包括:交往现状、去本族固着、观念适应、生活适应、学习适应、交往评估6个维度。以民族为类别分类,少数民族学生共保留18个问题、汉族学生共保留22个问题。

研究对象是位于滇缅边境的国门高校——D学院。样本资料获取以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对该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大学生进行分层抽样,以电子问卷形式向该校学前教育专业本科层次、专科层次、五年制专科层次的大学生发放,收集电子问卷共计547份,包括汉族大学生有效问卷314份、少数民族大学生有效问卷233份。其中,女性居多,共有517位女生,占比约95%;年龄在18—20岁的共有380位,占比约69%,21—23岁的共有166位,占比约30%;还有1位属24—26岁年龄段。本科大学生有209位,占比约38%;专科大学生有223位,占比约41%;五年制大专学生有115位,占比约21%。二是,结合访谈提纲抽取部分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一) 不同民族大学生交往现状

图1显示,各民族大学生交往、交流的主要场合是课堂、宿舍及社团。据了解,学校在编班和分配宿舍时并没有刻意采用以民族为类别的分配方法,而是按照一般学校的分配方法进行随机分配。如此就为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创造了接触相处机会。其次,学校的民族交往活动丰富,为不同民族大学生提供了文化交流、学习的平台。例如,学校利用晨间休息时间,选用了代表临沧民族文化特色的舞曲开展民族舞课间操活动,如佤族和拉祜族代表音乐《彩虹》《加林赛》《莫汉丽》《拉祜迎宾》《再唱山歌给党听》等。不仅如此,学校对于学生自发组织的民族活动也给予批准和极大支持。例如,学校社团组织的篝火晚会、民族舞协会,都吸纳了各个民族的同学,交往交流程度深,形成了较为积极的交往氛围。

^① 严庆、刘雪杉:《民族交往:提升民族团结教育实效性的关键——以内地西藏班(校)为例》,《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9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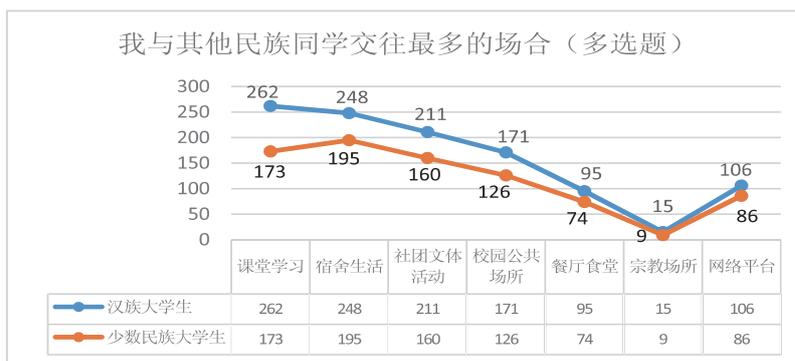


图1 与其他民族同学交往最多的场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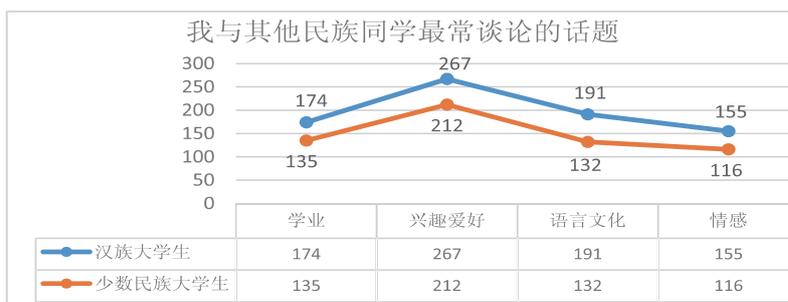


图2 与其他民族同学最常谈论的话题

图2显示，汉族大学生选择与少数民族大学生谈论最多的话题依次是：兴趣爱好、语言文化、学业、情感。少数民族大学生选择与汉族大学生谈论最多的话题依次是：兴趣爱好、学业、语言文化、情感。根据访谈了解到，大学生思维活跃，在交际沟通方面比较重视对方的兴趣爱好和学业、语言文化的交流。根据访谈了解，无论是汉族大学生还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大家都热衷于分享和交流。

(二) 去本民族固着

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团结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前提，每个民族成员都拥有自己的文化风俗，当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在校园相遇时，是否有正确的民族意识以及能否处理好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多民族交往既要反对唯我独尊式的，一味陶醉于本民族文化而固步自封，排斥他民族优秀文化的“一元文化”大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错误倾向，也要反对妄自菲薄一味追捧其他民族文化，甚至厌恶、鄙视、唾弃本民族优秀文化的逆向民族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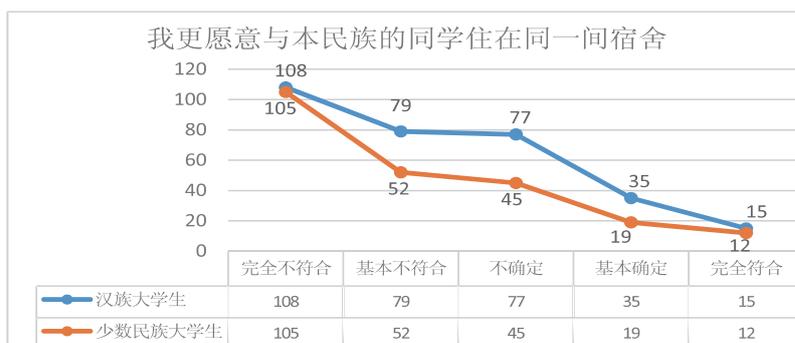


图3 选择舍友时的民族意识倾向

由图3可知，汉族大学生和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选择住宿舍友时，汉族学生中约60%的同学不介意舍友的民族，约25%的同学态度不确定，约16%的同学更愿意与本族同学同住。少数民族学

生中，约67%的同学不介意舍友的民族，约19%的同学态度不确定，约13%的同学更愿意与本族同学同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同学能适应多民族共处的宿舍环境，这反映了他们渴望与其他民族同学进行交流的愿望。根据以往研究显示，一些高校在分配宿舍时尽可能安排同一民族学生共同居住，但一些地方的实践证明这种管理方法并没有真正有效地解决不同民族间学生的冲突，相反，还进一步加强了不同民族学生群体间的排他性，阻碍了学生的族际交流和融合。^①

根据对D学院学生住宿情况的访谈了解，对跨民族混合安排宿舍持积极态度者较多。大学生普遍反映跨民族混合居住比较和谐。一是，大家并不认为民族间有较大的差异，更多感受的是人与人之间共性的特征。其中一名在多民族宿舍入住的汉族同学反映，就读之前以为少数民族和汉族应该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来了之后发现差异不大。二是，宿舍里不时有不同民族、地区家长寄来的特色小吃，大家常常分享，也常聊起各自不同的节庆文化和习惯风俗，交流较多相处融洽。



图4 共同用餐时的民族意识倾向

由图4可知，在与其他民族同学一起用餐的意愿方面，汉族同学中表示愿意的约占62%，不确定的约占21%，约17%的同学更愿意与本民族同学一起用餐。少数民族同学中，表示愿意的约占68%，不确定的约占20%，约12%的同学更愿意与本民族同学一起用餐。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同学能适应多民族共处的校园环境。



图5 遇到困难求助时的民族意识倾向

由图5可知，遇到困难时，对于“更愿意找本民族同学、朋友帮忙”的倾向，汉族同学中持否定态度的约占56%，不确定的约占33%，约11%的同学只愿意找本族同学帮忙。少数民族同学中持否定态度的约占57%，不确定的约占25%，约17%的同学只愿意找本族同学帮忙。调查显示，汉族和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相处中，大部分没有十分明显的以民族为边界相互区隔的族群意识。

^① 谷建杰、李凤兰等：《群际接触理论视角下民汉大学生混合住宿模式探讨》，《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年第8期，第44页。

生活上有困难时大部分同学不会刻意地找本民族的同学、朋友帮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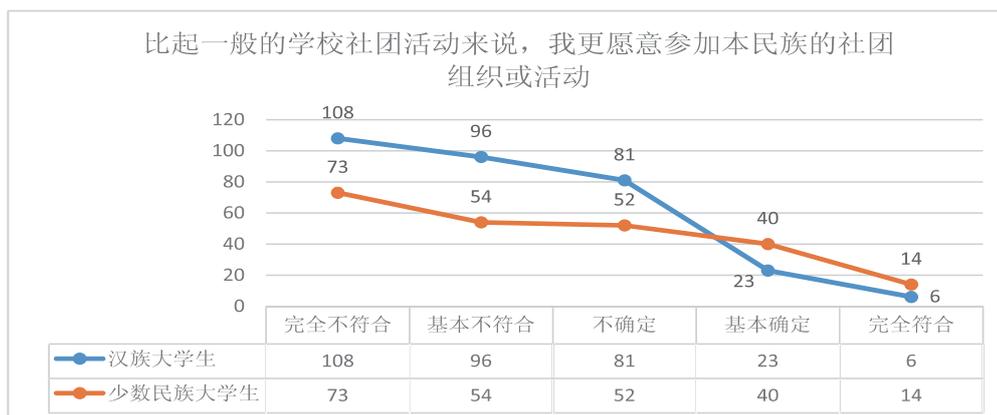


图6 选择参加社团组织或活动时的民族意识倾向

由图6可知，在选择参加社团组织或活动时，对于“更愿意参加本民族的社团组织或活动”，汉族大学生中持否定态度的约占65%，不确定的约占26%，约有9%的同学对此存在民族倾向性。而少数民族大学生中，持否定态度的约占54%，不确定的约占22%，有23%的同学对此存在民族倾向性。据调查，在选择社团时，大家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例如有的同学喜欢跳舞，就参加现代舞社团或民族舞社团；而有的同学喜欢摄影，就加入摄影社团，大多数同学并不会以民族作为选择时的划分标准的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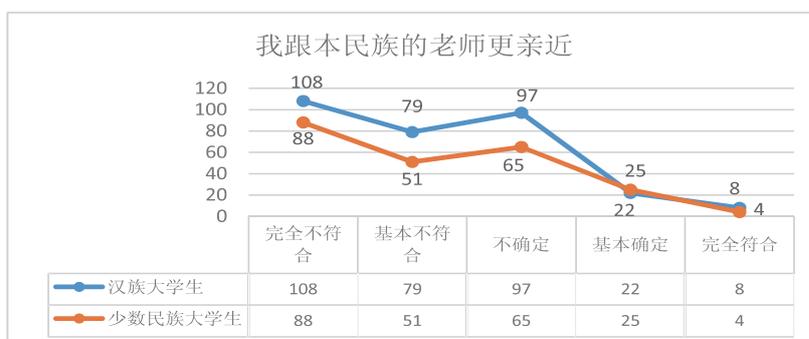


图7 师生关系中的民族意识倾向

图7显示，汉族大学生中约60%的同学不介意教师的民族身份；约31%的同学对此不确定；约10%的同学跟本民族教师更亲近。少数民族大学生中，约59%的同学不介意教师的民族身份；约28%的同学不确定；约12%的同学跟本民族教师更亲近。据访谈了解，D学院共有教师476名，其中汉族教师302名，约占教师总数的63%，少数民族教师174名，约占教师总数的37%。在同一个专业中少数民族教师占比较少，教师们普遍表示他们并未以民族为依据来区别对待彼此或学生，对各民族学生无论在学业还是生活上都给予公平的帮助和指导。

图8显示，汉族同学中对“只有汉族文化才值得学习”持否定态度的约占88%；态度不确定的约占10%；但仍有约2%的同学对此持肯定态度。调查表明，汉族大学生普遍表现出更多“去本族固着”的态度，能辩证地看待汉族文化。

图9显示，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对“摒弃本民族落后思想观念，有助于本民族获得更好的发展”持肯定态度的同学约占70%，态度不确定的同学约占19%，约有11%的同学对此不赞同。调查表明，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能够一分为二地看待自己的文化，而且保持着开放、兼容的心态，随时准备着去改变和接受更好的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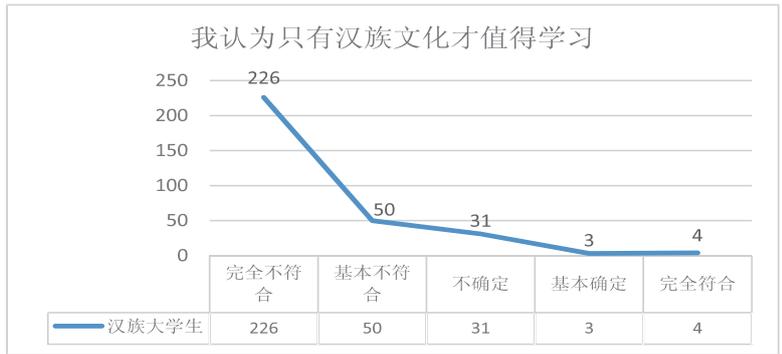


图8 汉族同学对持“只有汉族文化才值得学习”态度的自我评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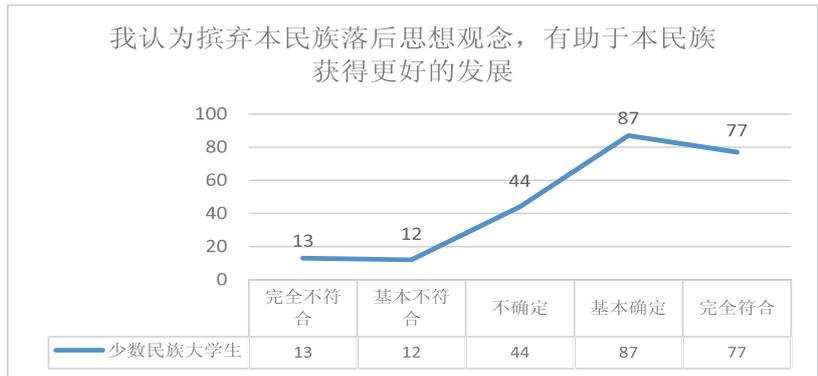


图9 对本民族思想观念进步的意愿和价值评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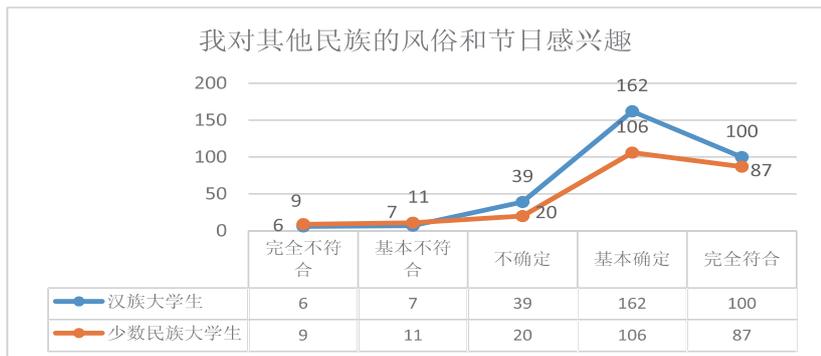


图10 跨民族的风俗和节日兴趣倾向

(三) 生活适应

图10显示，汉族大学生中，“对其他民族的风俗和节日感兴趣”的约占83%；态度不确定的约占12%；只有4%的同学对其他民族的风俗和节日不感兴趣。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对其他民族的风俗和节日感兴趣”的约占82%，态度不确定的约占9%，有9%的同学对其他民族的风俗和节日不感兴趣。调查显示，样本中大学生对跨民族文化交流保持着较高的兴趣。

图11显示，汉族大学生中，“能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生活习惯”的约占72%，态度不确定的约占21%，只有约6%的同学不能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少数民族大学生中，“能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生活习惯”的约占91%，态度不确定的约有5%，约有4%的同学不能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生活习惯。数据显示，总体而言，样本中大学生在族际交往中大都保持着尊重、开放、包容的心态。

图12显示，汉族大学生中，“在多民族校园里生活和学习感到舒适”的约占61%，态度不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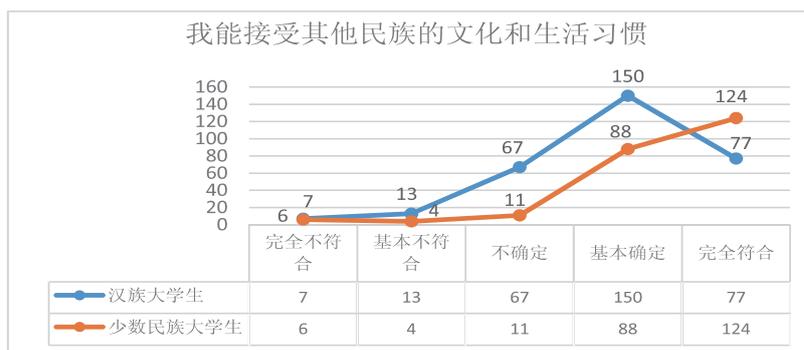


图 11 跨民族的文化和生活习惯接受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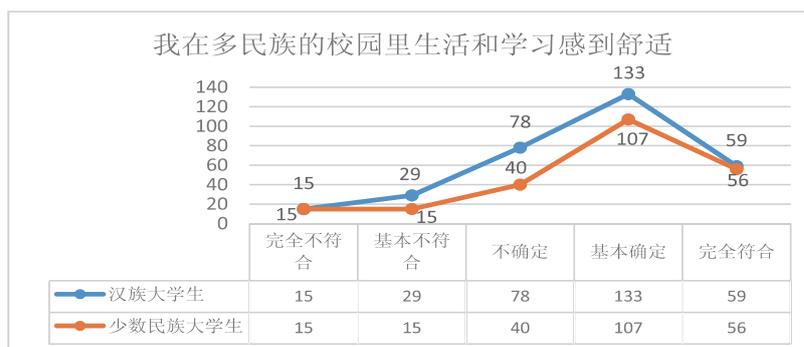


图 12 对多民族的校园生活的接纳和认同

定的约占 25%，约有 14% 的同学在多民族校园里生活和学习存在不舒适感。在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在多民族校园里生活和学习感到舒适”的占 70%，不确定的占 17%，约有 13% 的同学在多民族校园里生活和学习存在不舒适感。调查显示，样本中大学生对多民族校园生活适应度相对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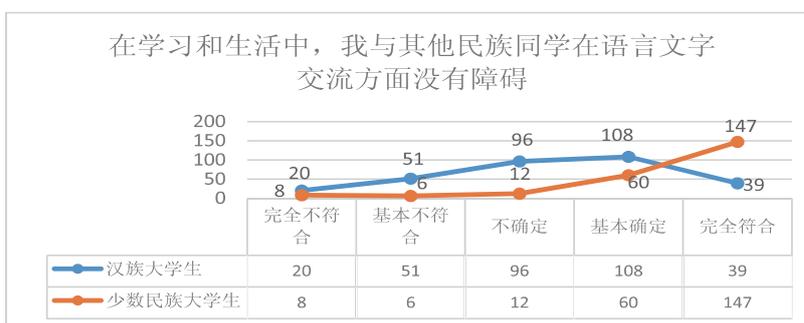


图 13 学习和生活中的跨民族语言文字交流障碍

(四) 学习适应

图 13 显示，汉族大学生中，认为“与其他民族同学在语言文字交流方面没有障碍”的约占 47%，态度不确定的约占 31%，认为在学习和生活上与其他民族同学存在语言文字交流障碍的约占 23%。少数民族大学生中，认为“与其他民族同学在语言文字交流方面没有障碍”的约占 88%，态度不确定的约占 5%，约有 6% 的大学生认为在学习和生活上，与其他民族同学存在语言文字交流的障碍。调查显示，认为多民族交往基本没有语言文字交流障碍的学生所占比例较大，但少数民族学生对汉语汉字的掌握程度远高于汉族学生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掌握程度。这可能是由于样本中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汉字基础较好，普遍使用汉语进行族际交流，所以交流障碍较少，适应能力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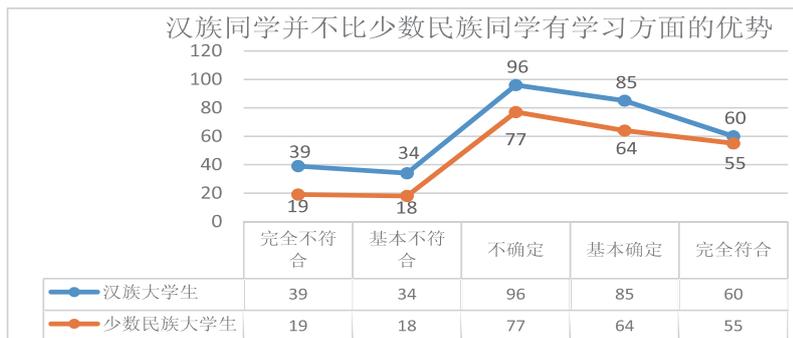


图 14 对汉族同学学习优势的评价

图 14 显示，汉族大学生中，认为在学习方面汉族同学并不比少数民族同学有优势的约占 47%，态度不确定的约占 31%，认为汉族学生存在学习方面优势的约占 23%。少数民族大学生中，认为在学习方面汉族同学并不比少数民族同学有优势的约占 51%，态度不确定的约占 33%，认为汉族学生比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方面更有优势的约占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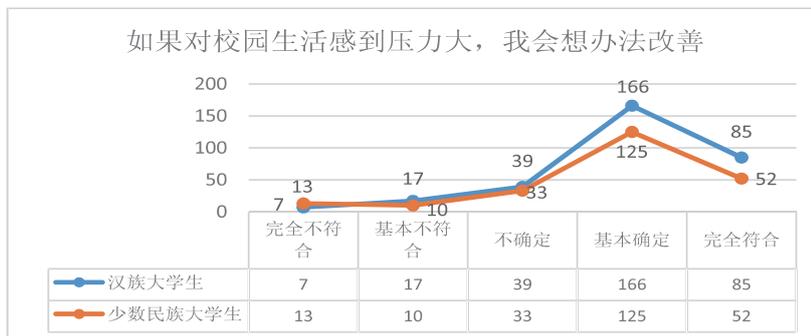


图 15 在应对校园生活压力方面的态度

图 15 显示，汉族大学生中，“对校园生活感到压力大”时会设法改善的约占 80%，态度不确定的约占 12%，约有 8% 的同学“对校园生活感到压力大”时缺乏或没有积极改善的意愿。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对校园生活感到压力大”时会设法改善的约占 76%，态度不确定的约占 14%，约有 10% 的同学“对校园生活感到压力大”时缺乏或没有积极改善的意愿。调查显示，大多数大学生都能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应对校园生活压力，进行自我心理调适。

(五) 交往评估

人际关系更多指的是人与人心理上的关系，人际关系的好坏可通过交往评估反映。一般来说，只有坚持校务公开，管理工作规划合理，体现出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和谐校园，才能建立起多民族大学生交往的互信，也才能促进大学生自觉去遵守和维护良好的秩序。

在发展机会评估方面，约 79% 的汉族大学生和约 88% 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学生能够获得均等的参加学校和社会活动的机会。他们普遍相信学校的文化及管理机制能够承认和尊重每个民族表达自己文化价值、态度的权利，也认可校园的机会均等。

图 17 显示，约 85% 的汉族学生和约 94% 的少数民族学生评估认为自己“与其他民族同学有着比较融洽的交往”；约 11% 的汉族学生和约 3% 的少数民族学对此态度不确定；约有 4% 的汉族学生和 2% 的少数民族学生对此持否定态度。族际交往融洽程度调查显示，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大学生，都对当前校园的多民族交往给予了肯定积极的评价，表明各民族学生普遍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

相关研究表明，缺少对其他民族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会造成更多进行“族内”交往的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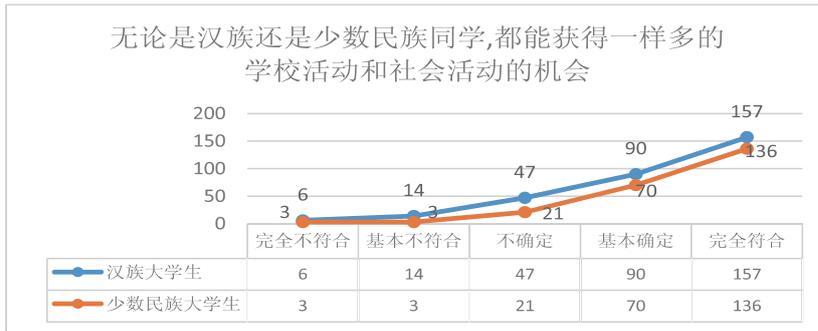


图 16 汉族和少数民族学生获得参加学校和社会活动机会的均等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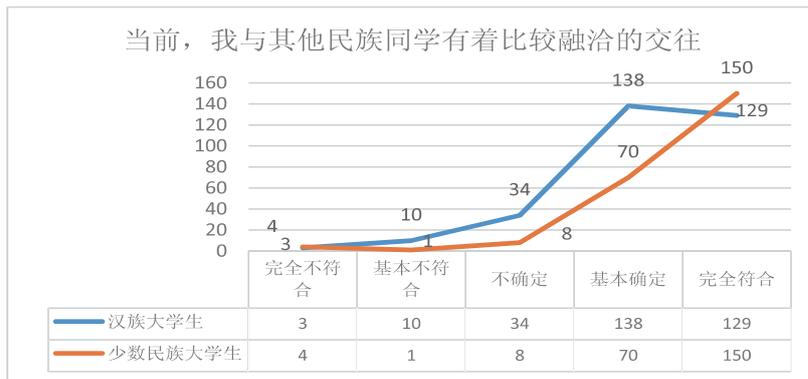


图 17 学生族际交往融洽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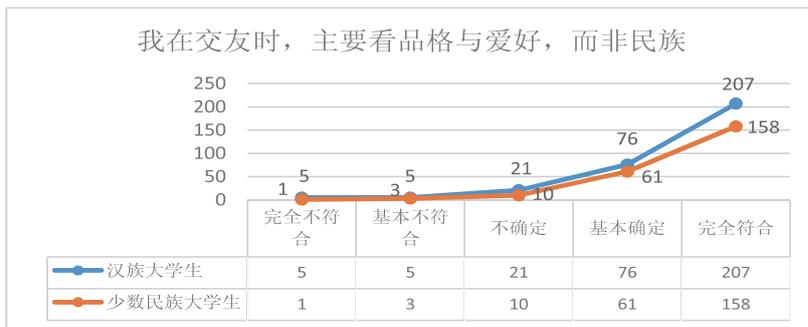


图 18 在交友时更看重品格与爱好还是民族身份

原因。^①图 18 显示,汉族大学生:90%的大学生在交友时认为主要看品格与爱好,而非民族;7%的大学生不确定;3%的大学生持否定态度。少数民族大学生:94%的大学生在交友时认为主要看品格与爱好,而非民族;4%的大学生不确定;2%的大学生持否定态度。通过进一步访谈了解到,校园交往时不会有意关注其他同学是什么民族或是民族差别,主要是看性格和爱好是否与自己相近。说明大部分大学生在交友时持有较理性的态度。

图 19 显示,约 84%的汉族大学生和约 88%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都希望能接触和学习更多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总体上看,无论是汉族或是少数民族大学生都对学习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抱有积极的态度和意愿,这对促进大学生群体和边境各民族族际交往交流、学习互鉴,增进亲诚惠容的边疆民族文化氛围,将发挥良好的推动性作用。

^① 杨萍:《西北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中的几个突出问题研究——以兰州市三高校的回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大学生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8年,第7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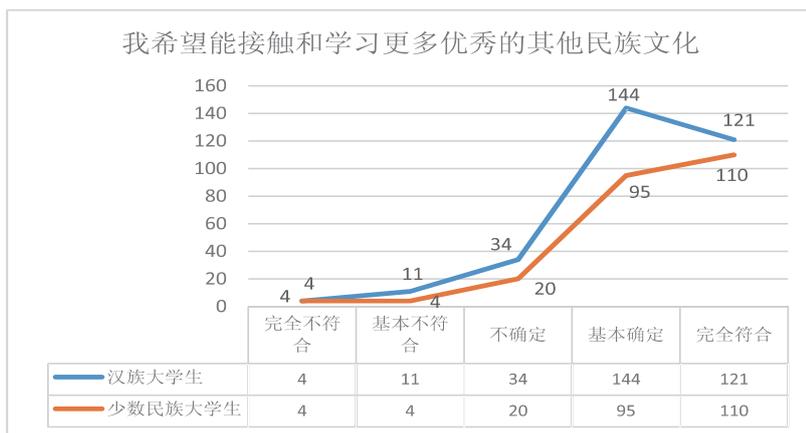


图 19 接触和学习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意愿

四、结论

综上所述，所调查的大学生在民族交往、去本民族固着、学习适应、生活适应、交往评估等方面都呈现可喜的现状和良好的发展趋势，这主要得益于党和国家对边境地区教育的长期扶持和大力投入，得益于党的治边方略，富民兴边和教育、科技、扶贫等多方政策的综合聚集效应。D学院作为滇缅边境上的国门高校，采取一系列举措促进了校内多民族大学生的和谐交往、学习，在构建和谐校园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探索，逐步打造充满活力、章法有序、多民族团结友爱的和谐校园文化，基本上形成了全员参与、全员服务、全方位覆盖的教育管理体系。为此，作为多民族和谐交往的示范校园其经验可资借鉴推广。

一是聚焦民族共性，继续开拓校园大学生接触交往的途径。众多研究表明，文化交往是文化心理适应的前提。心理认同需要通过长期交往、了解、吸纳才能实现。学校应在坚持公正、公平的原则的基础上，继续依托校园文化、课外活动、学校集体仪式、课程建设等方式来增进多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建设好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搭建交往平台中，不应刻意渲染民族间的“差异”，而要更多地寻求其民族间的共性特征，唤起更多的集体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是重视课堂教学的思想引领作用。要充分认识到课堂教学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努力搭建促进学生交往、交流的教学平台。首先，高校教师应全面提升跨文化素养，增强多元文化课程设计的能力，在课堂中通过精心设计、组织，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的个体表达自己具有个性的、特色的“声音”提供空间，促进多元文化的相互理解包容和交流互鉴。其次，学校应开设和完善有关民族交往的课程，为学生族际交往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服务和引导，提升学生的交往技能。

三是加强对大学生的心理疏导。在普遍和谐的校园环境中也存在少数因自我封闭导致交往“困难”的学生，对这部分学生可以提供专门的心理疏导服务，例如定期举办系列讲座与咨询，积极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帮助和引导，使他们养成社会交往的正确行为习惯，找到适合自身的交往方式和方法，为其营造良好的交往环境，拓展交往渠道，促使他们与其他民族同学加强交往交流。

总之，和谐校园主要应体现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宗旨上，坚持教书育生、管理育生、服务育生的宗旨，把培育具有多元文化视野的学生作为国门高校教育的重要理念。通过上述途径，不断建设“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民族和谐校园。

责任编辑：杨松禄

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策略研究

黄敏, 余静芳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湖南 岳阳 414000)

摘要: 对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是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and 本质要求, 有助于个体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幸福观, 建立对待生活的积极态度, 培养和发扬传统美德, 树立民族团结、爱国主义道德意识。对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 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及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个体的共同努力, 需有效整合多方资源, 形成教育合力, 构建四位一体的幸福观教育体系, 以更好地促进个体幸福地成长和发展。

关键词: 少数民族; 留守小学生;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教育策略

中图分类号: G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3-0059-05

幸福对于人生和社会发展有多重要, 科学的幸福观教育就有多重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 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幸福是个体的主观心理体验, 对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 应使个体清醒认识到自我幸福与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息息相关, 与家庭幸福、祖国命运、民族发展、社会进步等紧密联系。^① 社会、学校、家庭通过组织开展符合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的实践活动, 使其在活动中实现自我价值, 获得幸福体验, 这是提升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实效性的关键。

一、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个体对幸福的理解和态度, 是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个体改变世界、改变实践的幸福观, 指导着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实践活动。它从人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理解幸福, 包含主观和客观、物质和精神、劳动和享受、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4个方面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则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基础, 对个体进行正确而科学的幸福认知教育、幸福培养教育, 培养个体感知幸福、把握幸福、体验幸福、创造幸福的客观实践能力与主观心理状态的和谐统一。^②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根源于实践, 超越了感性和理性的抽象认知, 体现为个体幸福观念的再生产过程, 其教育内容基于个体的生产生活实践, 包含幸福是什么、幸福如何存在等本质内涵,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新时期内地西藏学生民族团结教育实践创新研究”(ZJGB2019264)。

作者简介: 黄敏,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教育心理学; 余静芳,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民族教育。

① 贾晓茹:《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视域下大学生幸福观构建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山西师范大学, 2014年, 第31页。

② 滕飞:《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研究——积极心理的视角》, 博士学位论文, 东南大学, 2015年, 第56页。

并通过实践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旨在通过实践活动,帮助个体认识幸福的本质、探寻适合个体提升幸福感的方法,引导个体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创造幸福、体验幸福,促使个体幸福和社会幸福协调统一,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①

二、影响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因素

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湖南湘西地区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300人进行问卷调查,样本对象为父母双方或一方进城务工自己被留在老家的10—12周岁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且集中就读于小学四、五、六年级。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77份。其中男生140人,女生137人;苗族148人,瑶族79人,回族50人;独生子女13人,非独生子女264人。调查发现,该地区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冲动倾向最严重,其次是恐怖倾向、过敏倾向和学习焦虑;从心理健康状况检出率来看,冲动倾向最高,随后依次是身体症状、孤独倾向、过敏倾向、学习焦虑、恐怖倾向、自责倾向、对人焦虑。

表1 少数民族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及检出率

	学习焦虑	对人焦虑	自责倾向	身体症状	孤独倾向	恐怖倾向	冲动倾向	过敏倾向
X±S	5.27±1.58	4.95±1.91	3.96±1.88	2.87±2.48	4.58±2.36	5.37±1.59	5.86±1.76	5.29±1.98
检出率	10.8%	1.8%	4.3%	21.7%	20.2%	7.9%	23.9%	19.5%

调查发现,不同民族的留守小学生幸福观的认知是不同的,但影响他们幸福观的因素却相似,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社会因素。社会是影响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幸福观形成的重要外部因素。目前,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的幸福观教育并未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仅在传统学校教育的思想品德课程中得以体现,且多以理论灌输为主要形式,极大影响了幸福观教育的效果。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在社会中学习、生活,社会实践活动与学校教学和家庭教育相比,教育形式更多样,内容更丰富,也更能让个体切实感受到积极的社会支持和积极情绪情感的传导和激励,有助于缓解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的孤独感、无助感、被抛弃感等不良情绪情感。

2. 学校因素。学校是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主阵地,是科学幸福观形成的重要场所。但不少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的幸福观教育仍存在一些问題,如学校财政困难,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师资力量特别是熟悉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教师匮乏,教师对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心理健康重视程度不够,教学方法较为陈旧,教师欠缺幸福观教育方面的意识且经验不足等。

3. 家庭因素。家庭是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其启蒙老师,家长的言行举止极大地影响着子女对幸福的理解和感悟。但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的父母,因各种原因长期外出务工,将子女交由其他亲属监管,较少有时间陪伴子女。此外,由于父母或监管人可能缺乏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意识和民族文化遗产理念,把子女的教育完全寄托于学校,寄希望于教师,忽视了父母角色对子女幸福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性,易导致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幸福观出现问題。

4. 个体内在因素。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的身心尚未发育成熟,如孤独感、学习焦虑、人际关系焦虑等方面明显影响着个体对幸福的体验,个体幸福观也在形成阶段,感受幸福的意识较为模糊,且他们多处于农村地区,家庭经济条件有限,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机会较少。家长、亲属监管人和教师也更倾向用学习成绩当做衡量个体综合表现的唯一奖惩标准,而忽视了对其兴趣、爱好的培养,个体也逐渐默认了这种衡量方式,压抑个性发展和自己的偏好,形成唯分数论,而去争当家长、监管者、教师心中的“好孩子”。

^① 王红:《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探析》,《教育教学论坛》2014年第1期,第10—13页。

三、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策略

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确立需要多方参与、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个体生活的现实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立足点,个体只有在正确认知世界、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才能不断充实自身的精神世界,领悟到幸福。^①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是长期、复杂而又又有意义的过程。教育过程不是师生单向的知识传输,而是教育者要尊重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个体,针对其现实问题,注重实践和互动,使个体融入实际生活,促使个体身心健康发展,获得长远幸福。

(一) 社会实践活动融入实际生活,丰富教育内容

社会是培育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重要支撑,公平正义是社会良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影响个体幸福的重要因素。让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从内心接受父母需长期外出务工而不能陪伴自己的客观事实,个体才能用心体会生活,才会更关注自己的学业成长。个体知识的积累、学业的成长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基础性内容,是个体未来更好更快发展和幸福生活的起点。社会实践活动则是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认识社会、践行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有效途径和动力源泉。^②调查发现,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学习焦虑的检出率为10.8%,在个体社会化进程中,将知识传输、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实际情况、本民族文化资源和实践体验相结合,促使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形成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能有效缓解个体的学习焦虑。

在现实生活中,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的物质生活条件会影响其精神生活。绝大部分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和能获取的社会支持有限,个体只有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才能更好地感受到幸福。因此,国家、社会需要为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创造良好的生存、生活环境,为其家庭和个体提供较充足的教育资源和公共资源,丰富其个性,激发其潜能,培养其感受幸福的能力,使其能意识到自身生活和追求幸福的意义,能逐渐理解父母长期外出与自己分离的不易。引导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进行心理互动,在互动中积累积极的情绪情感,习得积极的思维方式,并获取一定社会支持,从而达到更高层次的自我幸福和社会幸福的统一。因此,国家、社会要努力实现民生幸福,在政策上、经济上对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这一群体进行必要的倾斜。

(二) 构建和谐校园文化,创新教育方法

学校是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学习、生活、成长的重要场所,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主阵地,是育人的重要载体。调查发现,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冲动倾向最高,学校应针对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这一突出问题,立足于师生共同价值取向,整合全校资源,着力构建适合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身心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在多民族融合的小学就读,学生间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各不相同,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与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的实际情况、本民族特有文化以及教学计划、任务、目标有效融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积极开展丰富的幸福观教育活动,营造有利于个体健康成长的学风、班风、校风。充满正能量的校园文化,是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有效途径,可以实现对个体“润物细无声”的塑造,促使个体养成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在学校的日常教学和管理中,应重视对校园广播站、宣传板、网站、校报等校园文化传播阵地的建设,结合民族节庆日或社会热点事件,适时开展挫折教育、感恩教育、生命教育等主题课程、讲座、活动,让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落在个体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根植于心,指导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体验和追寻幸福。学校通过多主题、多渠道开展寓教于乐的社会实践活动,充实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的心理,使其在缺少父母陪伴的情况下,真切地感受到集

^① 余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在民族地区的实践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民族大学,2016年,第12页。

^② 秦培涛、赵闪、吴猛:《“幸福梦”的文化引领:幸福观教育》,《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73—77页。

体的温暖和力量,使最具活力的校园文化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发挥育人功能,促进个体健康、全面发展,切实提高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的幸福感水平,使学校真正成为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形成的孵化器。

教师是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主要实施者。教师的核心素养、文化水平、行为举止、对幸福的理解,都会影响学生的幸福观和思想道德水平。因此,教师应努力构建和谐师生关系,注重自我道德修养,以身作则,主动提升思想教育理论水平,形成较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从而发挥教师的榜样和示范作用。在教学中,教师应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的心理需求、思想状况和价值取向,以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的幸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与时俱进,积极主动更新教育教学观念。同时,教师还应不断提升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将理论知识和社会要求融入日常教学,关注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的心理变化,做好心理问题预防和危机干预工作,及时解决个体的心理问题、现实问题,增强教学时效性,真正做到教学相长和以学生为本。

学校、教师还应重视家校共建,建立家校信息互通机制,与家长共同建立有针对性、时代性和创造性的幸福观教育体系。调查中发现,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身体症状检出率排在第二位,父母长期缺位易导致个体缺乏安全感、信赖感,从而影响身体状况。学校应加强与家长的沟通联系,定期将学校的教育理念与家长、监管人沟通,将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学习知识和参与实践活动相结合,将个体合理的心理需求与本民族文化习俗、社会发展需求相结合,增强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在教育教学、社会实践等活动中的参与度,激发个体参与意识。同时,也要加强教师的社会实践参与度,运用新媒体教学平台和手段,结合互联网、自媒体、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个性特点、民族文化等进行教育教学方法的创新,把抽象化的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有机融合,使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和教育者之间产生共鸣。

(三) 充实家庭教育,重视德育培养

调查发现,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的孤独倾向排在第三,个体亟需家人的关爱与温暖。家庭是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幸福观形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教养理念、方式、态度、行为、道德素质等都影响着子女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且个体道德素质是影响其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同的重要因素。道德素质体现着个体的道德修养和风貌,对个体积极人格特质的培养和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但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的父母大多常年外出,与子女面对面沟通交流机会不多,不利于个体积极情绪情感的积累,易使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产生孤独感、不安全感、被抛弃感等负面情绪情感。因此,家长、监管者要注意子女的心理特点和变化,多利用微信、QQ等实时聊天工具,经常与子女交流,不仅关注其学习成绩、生活状况和需求等,更应关注其独立人格的塑造和正确幸福观的引导。

父母还需与监管者进行良好沟通,共同积极配合学校教育,了解学校当前阶段的教育教学工作重点和目标,以子女全面发展为导向,形成教育合力,共同促进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形成。家长还需不断适应教育现代化,和教师建立畅通的信息互通机制,及时了解、掌握子女在校、在家的基本情况和心理变化状态。^① 父母、监管者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对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进行挫折教育、感恩教育,引导个体形成自强、勇敢、坚毅等积极人格特质,使其能以敬畏之心、感恩之心勇敢地面对生活。针对出现心理问题的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家长、监管者和教师应有的放矢,及时有效解决问题。家长越重视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道德教育和幸福观教育,那么个体对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认同程度就越高。反之,如果父母仅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而不注重培养子女积极人格特质、兴趣爱好,那么个体的幸福感水平就较低。

(四) 紧抓理想信念教育,加强自我教育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真正的教育是能激发出自我教育的教育。”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方向保障,是其精神支柱。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

^① 黄敏、余静芳:《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主观幸福感培养研究》,《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7年第11期,第76—78页。

心智尚未成熟,其幸福观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更应主动多了解、融入本民族文化,按照社会发展、时代要求,积极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不断提升自我教育能力和水平。^①

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对知识的渴求是个体的突出需求,学业成长是实践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着力点。个体学业成长不仅来源于课程分数的高低,还在于个体知识、能力、兴趣爱好等目标的实现。因此,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需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学习先进的思想,逐渐培养将先进的理论、观念内容内化于心,尝试实现从他律向自律的转化。从个体精神需要实际出发,明确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将共产主义信仰的科学内涵内化为个体的自觉精神追求,通过自我教育,更好地认识世界、观察世界、感悟世界,对客观世界做出正确、合理的评价,建设、充实自身精神家园,使主体自我与所认同的幸福观、价值观有机统一,最终实现自我对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内容的内化和掌握。

(五) 探索实行双语教学,加强个体民族认同感

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从小接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对本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政府、学校要努力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创新,在坚定不移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确保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还要引导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熟练使用本民族文化、语言,做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增强个体的民族归属感、认同感。

学校要充分发挥教师教育教学、学生群体教育实践在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的课堂教学和实践、主题活动中,适时开设民族艺术和民族体育选修课程,积极开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活动。鼓励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学校组织的文体活动,组织开展当地其他学生与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之间互帮互学、建立友好班级等活动,促进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尽快融入当地学习、生活,加强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六) 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形成合力,完善教育保障机制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坚持民族平等,反对民族歧视,尊重民族差异。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的家庭多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活条件较艰苦,父母的外出也造成个体家庭教育的缺失。在国家顶层设计框架下,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需要国家、政府、制度等层面的保障。

上级党委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应通过政策引导激励,实施有倾向性的公共服务,加大财政支持和师资培训力度,畅通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渠道,培养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的感恩心理,凝聚个体民族团结信念。少数民族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应依据当地社会经济情况,紧紧围绕国家关于乡村教育振兴的方针政策,制定具体的方案,如提高乡村教育工作者的工资待遇,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积极与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结对子、给予经济帮扶和教育帮扶,建设完善的教育配套设施等,确保乡村教育振兴战略全面落地实施。

科学管用的制度也是开展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重要保障。例如2017年4月,湖南省人民政府颁布的《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引导各族学生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三个离不开’思想。”从制度上保障了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和汉族学生心理相融,相互帮扶、相互进步,共建和谐校园文化。通过“‘雨露计划’、‘一加一·同心温暖工程’等贫困家庭‘两后生’帮扶项目优先向少数民族学生倾斜”,让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感受到国家、社会对其家庭的关心、关怀。为了不让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因家庭经济原因而辍学,《意见》指出:“要加大少数民族学生资助力度。落实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两免一补’政策,完善经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应助尽助。”从制度层面保障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能顺利完成学业,切实提升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个体的幸福感水平。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李小志:《苏霍姆林斯基自我教育思想及启示》,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3年,第40页。

云南故事

再忆巧渡金沙江之战 弘扬新时代长征精神

刘林华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红军长征在云南巧渡金沙江,成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截堵,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对长征取得伟大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伟大的长征精神是红军长征过云南取得巧渡金沙江之战胜利的强大动力,红军在巧渡金沙江之战中始终坚持崇高的革命理想信念,顾全大局、团结协作,在战略上敢于创新,生动展现了长征精神的云南革命故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外部局势不稳定、不确定性更加突出,我们更需要从中国革命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云南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拥有丰富的革命历史文化资源,红军长征巧渡金沙江的历史是云南革命故事的重要篇章,是学习、宣传和传承长征精神的典型故事,我们要把这一光荣的云南革命传统资源作为讲好云南革命故事的生动教材,传承和发展新时代长征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关键词:红军长征;巧渡金沙江;长征精神;云南革命故事;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0)03-0064-07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云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很多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要把这些故事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检视初心、滋养初心,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①红军长征巧渡金沙江的故事就是云南革命故事的典型代表,深入挖掘红军长征巧渡金沙江之战的历史,对于我们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讲好云南故事的必然要求。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驰骋折返于黔、川、滇三省边缘地带。1935年5月3日至9日,红军巧渡金沙江成功摆脱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截堵,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对长征取得伟大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巧渡金沙江胜利的根源是什么?在新时代如何发扬、传承长征精神?如何利用云南革命资源,讲好云南故事?这些都是我们传承和发扬云南光荣革命传统必须要回答好的问题。

一、探寻巧渡金沙江胜利之源

1935年4月,在金沙江畔,由彭加伦作词的《渡金沙江胜利歌》广为传唱:“金沙江流水响叮当,常胜的红军来渡江。不怕水深河流急,不怕山高路又长……”^②深情的歌声诉说着红军巧渡

作者简介:刘林华,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文化、统战理论。

^①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云南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 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祝各族人民生活越来越好祝祖国欣欣向荣》,《人民日报》2020年1月22日,第1版。

^② 刘成龙:《巧渡金沙江:“神来之笔”的经典战例》,《青岛日报》2016年9月20日,第3版。

金沙江的传奇战斗历史。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蜿蜒穿行于川、藏、滇交界的崇山峻岭之间，江面宽阔，浪急滩险，流水声势浩大，南北跨纬度9度以上，落差3300米，形势十分险要。即便是今日，金沙江的部分险要河段也是难以横渡的。而当年的滚滚江水，是阻碍红军北上的一大险关，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渡江绝非易事。面对全军覆没的危险，中央红军最后成功突围，正是凭借着伟大的长征精神取得了巧渡金沙江之战的胜利。

（一）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信念

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①今天，我们回顾伟大长征转折之战——巧渡金沙江，探寻革命先辈面对重重堵截，跨越险山恶水，饱受饥寒交迫，永远打不散、打不倒、拖不跨的根本原因。历经岁月洗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胸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是长征中屡克强敌、战胜艰险的力量之源和精神支柱。

85年前，一群身穿粗布衣服、脚踏草鞋的红军将士，从江西瑞金出发，渡过于都河，挺进湘西，冲破四道封锁线，改向贵州，最后突破乌江，夺取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一路转战。红军将士每天都面临着被十余架飞机侦察轰炸，地面又有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经历着非常严酷的生死考验，但他们义无反顾，英勇向前。中央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直逼昆明。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再一次改变了在云贵川边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决策。红军将士坚决服从命令，不讲条件，以平均每天急行军50公里以上的速度前进。在抢占金沙江皎平渡渡口时，一天奔袭200里路。部队行军不分昼夜，连续作战。5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从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在此期间，在乌江北岸活动的红九军团，也从云南会泽以西的树桔渡、盐井坪渡过金沙江，与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红军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胜利。

（二）顾全大局的意识，团结协作的胸怀

张闻天曾这样说：“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②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红军将士对革命事业的耿耿丹心，惊天地、泣鬼神。在巧渡金沙江的战役中，每支红军队伍的任务、出发时间、地点、路线各不相同，但大家都能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始终以大局为重，为了革命需要和全局利益勇挑重担，勇于牺牲奉献，互相支持配合。空前的团结使得红军各部之间，分则能密切协同、合则能一致行动，充分显示出革命军队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高度统一。

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兵分三路向云南挺进，为保障主力红军从昆明禄劝渡江北北上，中央红军把牵制敌人的任务交给了红九军团，红五军团则作为殿后部队。4月25日，红九军团进入云南富源县，相继攻占了宣威和会泽县城，一路开仓济贫。红九军团驰骋在滇东北高原乌蒙山一带，攻城扩兵，迷惑敌人。一系列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的行动搞得敌人惊恐万状，蒋介石急调中央军李韞珩、周浑元部尾追红九军团，并多次急令云南省主席龙云和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要求两地将金沙江沿岸的所有船只甚至是可供渡江使用的竹木门板等工具一律隐藏或销毁，并派重兵把守各个渡口。面对险境，红九军团一下成了不是主力的“主力红军”。在顺利渡过树桔渡口后，为确保中央红军顺利渡江，阻止国民党军北上追击，红九军团继续在巧家县活动，佯攻巧家县城，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9页。

^② 李昌禹：《没有理想信念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青年观）》，《人民日报》2016年10月30日，第6版。

打响了龙王庙阻击战，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主力军队，确保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成功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

同样，根据中央指示，红五军团作为殿后部队，在完成牵制昆明敌人的任务后，迅速向金沙江方向挺进。在到达曲靖的时候，总部传来了“围城三日，让兄弟部队迅速通过”的命令。接到新的命令之后，红五军团主力将曲靖围得像个铁桶，吓得敌人不敢出城。红军主力则浩浩荡荡地从红五军团旁边通过，向金沙江急进。准备撤退时，红五军团又接到总部紧急命令：就地选择阵地，构筑工事，准备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中央纵队渡过金沙江。红五军团当机立断在石板河南面沿河构筑工事，拦截敌人的尾追，使得敌人每天最多只能前进七八里。但这时，已有敌军两个纵队云集山下，形势非常紧迫。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从江北返回石板河，传达中央军委最新指示，要求红五军团再坚守三天三夜。面对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危险，红五军团毅然领命。在后期，阻击战打得异常激烈，而红五军团直至激战的第八天下午才接到中央指示：可以“撤退渡江”。红五军团疾行50里，作为最后一支队伍顺利渡过了金沙江，完成了保卫大军渡江的艰巨任务。

（三）借机取巧的谋略，勇于创新的智慧

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在“左”倾冒险主义的全面压制之下，“星星之火”的革命事业面临覆灭的危险。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在事实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红军长征由初期陷入困局到后来踏上坦途，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正确领导下，强渡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无一不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创造性开拓创新的结果。

在作战实践中，毛泽东一直注重通过观察敌军协同关系的亲疏、兵力部署的多少、官兵士气的高低等因素，发现敌军的弱点，捕捉战机。在巧渡金沙江战役中，毛泽东摸清龙云惧怕蒋介石插手云南事务、中央军进驻的心理，借机指导我军灵活变化作战方向，迷惑敌人，创造出多次有利战机。先是派出一支部队，摆出东进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态势，而主力则迅速向南移动，佯攻贵阳。当红军逼近贵阳城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令云南军阀龙云速调滇军来贵阳“保驾护航”。正当滇军匆忙离开云南，向贵阳开进时，红军来一个龙摆尾，转向西行，抓住有利时机，连续急行军，从贵阳、龙里之间的20公里地域疾进，直入黔西南，渡过北盘江，带领红军主力部队向云南挺进。1935年5月2日，在抢占皎平渡战役中，中央军委司令部指示：“令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带电台一部，赶于四号上午到皎平渡架桥……并伪装成敌军抢占渡河点两岸，抢获全部渡船。”为了争取时间，出其不意，先遣营一律去掉帽徽等红军标志，伪装成国民党部队，翻山越岭，昼夜急行军160多里路，顺利抢占了皎平渡渡口，先后缴获渡船数只，然后利用七天七夜全部渡过金沙江，最终彻底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从根本上扭转了被动的局面。

正是有着敢为人先的创新胆略，红军才能成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连国民党追剿部队的指挥官也不得不承认，红军“神机妙算、进出无常”。正因为红军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前进方向，才得以凝聚人心，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了走向胜利的进军。

（四）无所畏惧的英勇，顽强拼搏的斗志

红军的长征之路，是一条用鲜血和生命铺就的征程。漫漫征途，洒遍了红军将士的鲜血；万水千山，掩埋着中华民族的忠骨。中央红军进入云南，部队出现伤亡的原因不是滇军的追击，而是遭受飞机的轰炸。轰炸突然来袭，红军根本没有防备和躲避的时间、空间，硝烟中到处是悲惨景象：散落的担架，炸死的马匹，死伤的人员……如贺子珍也曾在长征途中被轰炸负伤，全身共嵌进17块弹片，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紧急手术，这位坚强的女红军没有呻吟一声。

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记录了连他自己都无法相信的数字：在中央红军历时1年的长征中，进行了380多次战斗，几乎每天一次遭遇战；平均每天行军35公里以上，翻越了18

座山脉，渡过了24条河流；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的封锁包围，击溃了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①在三年多的南征北战中，红军以“革命加拼命”的顽强意志，凭借“敢”的胆识、“斗”的精神、“胜”的信念，不惧顽敌打大仗、不怕牺牲打恶仗、不惜代价打硬仗，绘就了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正是这种战斗血性迸发出的强大攻势，锻造了我军将士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精神利刃。

红军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凭借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成功抢渡金沙江，甩掉了长征以来一直尾随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将中国共产党围困消灭于川滇黔的白日梦，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实现了由滇入川北上的战略转移，也为后人留下了一幅恢宏画卷和一个个悲壮故事。长征精神也激励着我们这一代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矢志奋斗。

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②进入新时代，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迈向新征程，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始终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是对革命先烈的最好告慰，也是对红色文化基因的传承。巧渡金沙江作为长征中具有转折性的伟大胜利，其蕴含的精神光芒对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鲜明的指导性。因此，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守好“初心”，勇担“使命”，让长征精神体现其时代价值，永放光芒。

（一）坚决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不动摇

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回顾历史，回望80多年前的那段苦难岁月，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思想，才能带领人民军队取得革命事业的成功。实践证明，坚决听党指挥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长征时期，支撑红军不怕牺牲、浴血奋战、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就是听党指挥、永不叛党的决心和初心。维护核心、向核心看齐，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法宝。领导核心坚强，党就充满力量；领导核心受到挑战，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

反观20世纪80-90年代，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倡导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失去了领导核心，使得苏联共产党思想、组织上一片混乱。叶利钦公开反对中央政策，结果军队不听指挥，用70多年建立起来的国家大厦，几天的时间就坍塌了。每当反思苏共兴衰的历史，一个政党兴衰规律性的法则便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成败，权威和路线关乎国运，政策关乎民心。^③苏联的土崩瓦解告诫我们，维护

^① [美]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85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47页。

^③ 张树华：《党的权威与国家命运密不可分》，《环球时报》2019年5月28日，第14版。

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天性”、坚如磐石的党性，缺乏领导核心，最终就会亡党亡国。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要坚定信心听党话，永远跟党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神聚气，看齐追随，迈向新时代征程，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二）坚持人民至上，践行群众路线的决心、初心不松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① 我们党领导的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来自人民，依靠人民，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80多年前，带着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共产党人的“初心”，红军集结出发北上。在长征途中，红军一路上打土豪，分田地，争取开明士绅，救济贫苦百姓，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其影响和威望逐渐深入人心、深得民心。在禄劝占领皎平渡后，红军充分依靠当地群众，开展群众工作，找来船只和船工帮助渡江，同时还在生活上帮助渡江船工改善伙食，发放劳务费照顾。沿途经过苗族、彝族、藏族、回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时，由于长期受军阀的压迫和掠夺，少数民族对汉人积怨很深，戒备心重；敌人又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诬蔑红军“共产共妻”“烧杀抢掠”，更加重了少数民族对红军的疑惧，不少人弃家出走，遁入山林。红军通过政策宣传、以身作则，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各项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对当地老百姓秋毫无犯，从而使他们放松了戒备，赢得了他们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一路上，红军谱写了同人民群众生死与共、血脉相连的动人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说：“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②

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只有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团结凝聚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化解重大矛盾，推动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例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而全国人民也以自身力量做出回馈。无论是专家院士，还是普通医护人员、快递小哥、社区工作人员；无论是耄耋之年，还是青春的90后；无论是封城还是隔离；无论是在一线冲锋，还是在后勤保障，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光和热，举国发力共渡难关。这也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价值理念，是新时代长征精神的重要体现。

（三）发扬创新精神，投身伟大斗争决不退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③ 强渡乌江、攻克娄山关、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是老一辈革命家抛弃教条、敢闯敢拼、勇于创新的结果。从“三大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到“两弹一星”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国防，再到改革开放逐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一不是对这种创新胆略的继承与发扬。

当前，国际形势波诡云谲，中美关系复杂，国际反华势力频频生事，资源争夺、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斗争、经济斗争、网络斗争、领土主权争夺等全域拓展。面对复杂的局势，我们要意识到“不创新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

^①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9年7月1日，第1版。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52页。

^③ 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2日，第2版。

局”的战略要求。如若抱残守缺、因循守旧，只会与当代社会的发展大潮渐行渐远。我们要克服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心理；要学习新知识、钻研新技术、掌握新方法；更要紧跟形势找短板，紧抓任务研讨方案，改善知识结构，提高科技水平，站立在科技前沿，积极投身伟大斗争，用优异的成绩迎接时代的大考。

三、继承光荣革命传统，讲好云南革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①从战火纷飞到大国崛起，从任人欺凌到大国担当，百年风雨历程，万千世事变换，我们党在风雨考验中茁壮成长，我们的队伍在历经磨难中发展壮大。虽然时代变幻，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理想和信念始终未变。云南拥有丰富的革命历史文化资源，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好这些革命文化资源，用我们云南的生动故事、云南的光辉人物讲好中国共产党历史、新中国历史、统一战线历史。把传统故事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生动教材，是系统传承弘扬革命精神的有效途径；是增强红色文化吸引力，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的物质载体；也是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让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社会力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一）挖掘云南革命历史资源，把云南光荣革命历史转化为云南故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时强调，党员同志要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如果不了解党和国家的历史，就难以懂得党的初心和使命之可贵，就难以理解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之重要。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②中国革命历史是中国精神的最好营养剂，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把革命历史作为红色基因产生和传承的“基石”。

纵观云南近现代史，云南各族人民拥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是云南历史文化发展史上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除了红军长征过云南巧渡金沙江的历史外，还有西南联大教育救国，改组党中央军事领导权、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的“扎西会议”，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爱国运动，盟军协同抗日并取得胜利的滇西抗战，实现云南全境解放等众多光辉的革命传统故事。因此，我们要加强学习并整理用好这些革命历史文化资源，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资料收集、梳理，进行实地考察调研。针对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和著名战役战例展开系统研究。注重挖掘散落在民间的战斗史学资料，尤其注重做好老同志“口述战斗历史”记录和整理工作，坚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把传统经验总结好，研究分析历史事件的特点规律，把历史故事所蕴含的精神凝练到位，真正把“宝”挖出来、传下去，最后把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我们学习党史及新中国史的重要渠道。同时要充分运用网络载体，注入时代元素，让党员干部群众在多维空间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和感染。

（二）讲好云南革命传统故事，做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革命文化的弘扬和传承。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原兰州军区时强调，要发扬红色资源优势，深入进行党史军史和优良传统教育，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京军区机关时又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到军队要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2017年，第32—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2页。

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这些深意，就是要求我们利用好革命文化资源，讲好革命传统故事，深化红色教育，传承革命意志，有效发挥思想政治的教育引导作用。

在红色基因传承中，我们既要关注传承的过程，更要关注传承的方法。我们在挖掘云南传统革命故事的过程中，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用云南光辉的革命故事和光辉人物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教材，以课堂为载体，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真正做到入脑入心。对于社会主义学院来说，在党外干部教育培训中，要讲好党史、新中国史和统一战线史，结合社会主义学院主责主业开展共识教育，加强统一战线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引领。在具体工作中，我们既要注重“言传”，又要注重“身教”；既要注重“内化”，又要注重“外塑”。分享红色资源及红色资源转化、拓展和利用活动，善于把遥远的“拉近”，使已故的“复活”。积极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立协作关系，开展实地参观革命遗址、纪念馆、重走长征路等实践教学活活动。适时组织党员干部利用纪念日、党课等时机广泛开展忆英雄、学英雄、当英雄活动，让红色文化蕴含的革命精神引领广大党员干部、党外干部及知识分子代表人士自觉传承红色基因，深化对党史国情的认识，树立奋勇拼搏、攻坚克难、不屈不挠的英雄形象，更好地发扬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

（三）用好云南革命历史文化资源，弘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

2015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祖国的命运和党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今天我们讲爱国主义，这个道理要经常讲、反复讲。^① 读史使人明智，鉴往足以训今。红色文化既包含着丰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凝聚着不朽的革命历史，又延续了改革创新的精神品质，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② 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我们要用好云南革命传统历史文化资源，发扬云南革命精神，为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精神养分。

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特别强调要就近就便用好红色资源、党性教育基地等，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前行动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专题教育，让党员、干部学习了解党成立以来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人物，了解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③ 我们要通过大力挖掘和开发云南革命文化宝库，让红色资源真正“活”起来并深入人心，不仅要在课堂上讲好云南革命传统故事，还要利用重要时节开展纪念活动、拍摄影片视频，积极推动和策划、出版、发行一批以“红色革命文化”为主题的文学、音像、书画、舞蹈等红色文化精品以及电子出版物，增强革命文化和革命精神传承的时代性和吸引力。搭建红色文化平台，营造红色文化环境和氛围，让党员干部时刻接受红色文化熏陶和浸润，接受红色文化洗礼，感知革命历史的厚重。积极主动汲取革命文化中散发的养分和内在力量，从而激发民众爱党、爱国热情，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把使命担负在肩，让初心薪火相传。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谱写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云南篇章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29页。

^② 李智：《红色文化为文化自信筑基》，《人民论坛》2018年第13期，第136—137页。

^③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旗帜》2020年第9期，第10—11页。

闻一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马弋涵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闻一多先生是一名纯粹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将爱国诗人、古典文学教授、民主斗士三者合璧于一身。在死亡的威胁面前，闻一多以诗人的气概卓立，他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演讲，彰显出大义凛然的高贵品格；闻一多用壮烈牺牲向学界与世人展现了罕见的人格力量，诠释了知识分子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发展上下求索、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讲好闻一多发表“最后演讲”的故事，既是弘扬云南光荣革命传统的必然要求，又是激励新时代知识分子继续砥砺家国情怀，笃行报国之志，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在奉献伟大时代中实现人生价值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0)03-0071-08

家国情怀，是一种对国和家的热爱，是一种忧国忧民的责任感，既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之中的一种文化传承，也是滋养我国知识分子实现社会价值的高贵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义、勇担当。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①

闻一多发表“最后的演讲”、舍生取义的故事，是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月考察云南工作时专门提到的，他指出，“云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很多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要把这些故事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检视初心、滋养初心，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②

闻一多在中国文化界、学术界、艺术界的卓越成就和一生的过往故事，是有很多研究和传记的。最权威和全面的，当属季镇淮先生《闻朱年谱》、闻立雕先生的《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以及闻黎明先生的《闻一多年谱长编》《闻一多传》。而于云南，我们对闻一多先生更应该再有所纪念。因为他一生中将近五分之一的时间在这里度过，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著作，七成

作者简介：马弋涵，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统一战线相关理论政策。

^① 《习近平：广大知识分子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作贡献》，2017年3月4日，<http://news.cctv.com/2017/03/04/ARTIrtiILPCd70u4wG6Ak0or170304.shtml>，2020年9月1日。

^②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云南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 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祝各族人民生活越来越好祝祖国欣欣向荣》，2020年1月2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1/21/c_1125489987.htm，2020年9月1日。

完成于云南，最终把他伟大的忠魂也留在了云岭大地，成就了他一生的壮丽诗篇。2016年，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省内外专家学者，编写出版了“云南百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其中，由刘文孝教授带领撰写的《文化雄狮——闻一多人生五重奏》^①内容翔实、考证有据，立论高雅、感情宏大，实为云南纪念一多先生树起的一面旗帜，也着实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因此，要想跟随总书记讲好这个历史故事，笔者唯有站在巨人的肩上，综合上述权威记载，把闻一多先生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的事件背景、来龙去脉、时代意义讲清楚，并从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角度谈一些自己的认识。

一、砥砺家国情怀的爱国诗人

闻一多，名家骅，学名“多”，字“益善”，号“友三”，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闻氏家族。浠水闻氏，三世同堂，书香门第，所居院落额曰“春生梅阁”，大门对联书“七十从心所欲，百年之计树人”。这样的家族虽也有过功名之求，但较之陋儒腐儒，却通达开明甚矣。闻先生自幼在家中书房“绵葛轩”熟读经史、饱览群籍，所学既有子曰诗云，也有算数物理。除白日所学，每日入夜，还跟随其父亲读《汉书》，纵论古今忠义人物。13岁时，以全省第一的中文成绩保送清华学校，为便于同学称呼，在好友潘光旦和吴泽霖的提议下，将学名改为“一多”。清华10年后又留学美国，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进行学习。这些经历，使闻一多养成了既刚直不阿又谦虚待人、既尊重传统又革故鼎新的品格，成为我国近现代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

他首先以独具特色的诗人闻名于世。闻一多一生诗作并不算多，但却以感情深厚、艺术精美见长。他一生不作诗则已，一作诗，必然一改再改，务求“尽美”。正如梁实秋所说，“一多作诗的时候拼命作诗，治学的时候拼命治学……可见他自己是全神贯注在艺术里，把人生也当做艺术去处理”。不过，先生所追求的纯粹的艺术，并非是对抗道德、不问是非的唯美主义，而是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表达贫弱民族的尊严。留美期间，这种饱含着神圣爱国情怀的诗艺愈发升华。一次，珂泉学生报《科罗拉多之虎》发表了一个美国学生的诗《Chinee（中国人）》，说中国人面孔活像狮身人面兽，整天板着脸，没表情，不知心想些什么。闻一多当即回敬一首《Another“Chinee” Answering（另一个中国人的回答）》，发表在珂校学生报上：

我脸如狮身人面像，
你说，它使你困惑，
你希望我唇齿清楚，
你要我回答。
不过，要是我的话对你是个谜
因此我宁可保持沉默。

为什么要沉默呢？中国俗话说，“对牛弹琴”牛不懂。“保持沉默”实际就是说，这美国小子是头牛！接着闻先生告诉他：

我将沉默地送你
最好的礼物，
送你一只玉制的茶杯

^① 该书正式出版后，官方书名定为《文化雄狮闻一多》。因书中章节按“闻一多人生五重奏”的顺序编排，故此处使用该书原名，意在突显内容特点和作者初心。

透明而稀薄，
 碧绿如竹林中的朦胧光线，
 我将送你一件锦袍，
 绣满奇异豪华的彩图，
 菱形的彩色块，
 蝙蝠和彩蝶，
 有金色长须、道貌岸然的龙，
 用梦幻般闪亮丝线织成；
 我将赠你花束，
 有桃花、梅花、梨花；
 我将赠你绸面精装，
 充斥着奇怪方块字的典籍。

这首短兵相接的爱国诗歌，不仅在向一个化外之氓讲述丰富优雅的中国文化，而且“功力雄厚，词藻丰赡，不能不使美国小子们叹服”。闻一多留美期间的诗歌创作，除了围绕爱国主题外，还提出了一套创造新格律诗的理论。新诗形式既吸收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又注意保留中国古典诗歌格律的传统，主张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他所倡导的新格律诗理论和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影响了为数众多的诗人，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格律诗派，在新诗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孤雁》《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七子之歌》《长城下的哀歌》《晴朝》《我是中国人》《爱国的心》《故乡》《回来了》等，都是在留美期间写成，这些也都是先生对中国新诗的贡献。其中，最著名的当然要数《太阳吟》和《忆菊》。在《忆菊》中，闻先生写道：“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我要赞美我如花底祖国！”今天，这两句诗已成为新诗中传诵最多的爱国名句。闻一多自己说过，他爱的中国，“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遍观他此时的诗，无一不浸透着中国文化中那种洒脱超然、物我同一、人我兼爱的道墨两家精神。这是闻一多爱国诗歌的第一层思想境界。

1925年6月1日，闻一多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目睹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屠杀中国民众的“五卅惨案”。面对祖国的深重灾难，先生将原来秾丽唯美的家国情怀转化为更加深沉的忧国忧民之心，继续通过诗歌表达极其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表现出深沉、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爱国爱民的真情出发，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厌恶，被压迫民族的悲愤，国土沦丧的痛苦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这是先生爱国诗歌的第二层思想境界。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先生愤怒了，写了《天安门》，以洋车夫的口气，揭露军阀政府杀害人民的罪行；又发表《欺负着了》，为劳苦大众请命伸冤，这是闻一多诗歌所到达的真正的爱国境界。这种境界，与当时那些只会为政府摇旗呐喊或只知片面追求民族主义的所谓“爱国”诗人是完全不同的，也是他们无法企及的。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序》中说：“他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①不仅如此，先生还通过诗词唤醒民众奋起反抗的革命热情，他在《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中说：

但是这哀痛的波动却没有完，
 他要在四万万颗心上永远翻腾。

^① 刘文孝、刘圣雨：《文化雄狮闻一多》，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1—54页。

哀恸要永远咬住四万万颗心，
那么这哀痛便是忏悔，便是惕警，
还要把馨香缭绕，俎豆来供奉！
哀痛是我们的启示，我们的光明。

20年后，先生在“一二·一”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坚定地站在学生这一边，抗议反动派的血腥罪行，甚至在紧要关头献出自己的生命，其心中早已深植真正的清醒的爱国思想。

二、具有高尚人格的古典文学教授

闻一多终其一生，不过一教师而已，但其大师风度和高尚品格就在其间显现出来。闻一多的成就并不限于新诗创作与提倡新格律诗理论，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的重大成就，引起了学术思想界更为强烈而普遍的震动。应该说，闻一多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开辟了中国现代古典学术研究之先河，进行了大量“发千年未发之覆”的探索，他是“前无古人的古典学者”。

除了有大师的成就，先生在教书育人上更是体现了强烈的使命感。一是爱惜人才。先生博学多才，尤其在人文科学方面可称全才，自由创作与学术研究兼而有之，对于学生的各种要求，自能应付裕如。因有诗人的口才，学者的深邃，加上名士的风度，先生讲课深受学生欢迎。甚至在条件艰苦的西南联大，也有很多非文科的学生来挤蹭闻教授的课。除了一般的讲授，对有特长与特殊爱好的学生，他也会给予特殊的指导，如指导陈梦家和臧克家写诗，鼓励荒芜译介惠特曼的诗，点拨赵萝蕤译介现代英美诗歌，扶持费鉴照研究现代英国诗人，指导孙作云研究楚辞，帮助王力探讨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提议张清常以大籀重写诗经……此外，如曹葆华、卞之琳、李广田等人，并非先生的学生，但也常是他家中座上客。^①

二是胸襟开阔。闻一多不仅能高屋建瓴，给学生指出向上一路，就是落到具体实处，也不遗余力给学生以切实的帮助。在西南联大，生活异常艰苦，但闻一多与同学一起兼职、一起吃饭、一起成立新诗社。师生相濡以沫的情感，共度艰辛的乐趣，这是一种骨子里的文化、骨子里的风雅。闻一多是新诗社的导师，赵宝煦说：“我印象里最深的，就是他说你不是首先要作诗，首先是要做人。你先做好人，才能做好诗。”^②此外，闻一多不仅让学生随便抄写使用自己付出心血获得的大叠大叠的还未发表的手抄研究资料，还字斟句酌地为学生修改文章，甚至以自身专长为学生服务。林庚的第一部诗集《夜》的封面，就是他代为设计的。推荐学生的诗文给报刊，当然也是先生的事。费鉴照的文章，臧克家第一次发表的《洋车夫》《失眠》等诗作，都是闻一多先生送到杂志社去的。

三是爱护学生。闻一多除了爱才，对一般学生也非常爱护。虽然他多数时候主张学生少问国事，努力读书，但由于他本人也是经过五四运动陶冶之人，因此对学生的正义感也是同情和保护。如果说抗日战争爆发前，闻一多对学生的爱护，还只是体现为优秀正直的教师品格，那么，抗战爆发后，他对学生的态度就有了升华，与学生建立起了一种同甘共命运的联系。1938年2月，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要继续南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当时，从长沙赴昆明有三条线路：一经香港，二经海防，都有舟车代步。唯有第三条，经贵州入昆，完全是步行。以闻一多的年纪和资格，完全可以选前两条路线，但他最后选择与学生一起，一路

^① 刘文孝、刘圣雨：《文化雄狮闻一多》，第143页。

^② 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257—258页。

跋山涉水步行68日，行程3500多里。到昆明时，先生已是面颊瘦削，额上皱纹深刻，实际年纪不过40，看上去却已50有余。^①但先生并不认为这是受罪，一路上，他采集民谣、民歌，还创作了许多描绘祖国壮丽山河的风景画。在先生看来，这是他认识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的途径，这应是知识分子深入基层、贴近群众，自觉“接地气”的表现了。在西南联大的8年多时间，师生的关系更进一步演变为同志战友关系，相互砥砺，共同革命。闻一多走出书斋，投身民主运动，能够具有那样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既与他在新诗创作及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密不可分，更与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感染力息息相关。

三、为国家和民族进步舍生取义的民主斗士

1944年，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国民党当局就策划发动内战，中共与民盟对此坚决抵制，国统区掀起了反内战、反独裁的浪潮。

李公朴、闻一多等进步知识分子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这边，为和平民主、建立新中国而奋斗。闻一多在中共西南局的建议下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积极参加由中共地下党和民盟同志所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谈学术，议时政，研究斗争策略；并在中共和民盟同志的影响帮助下，认真阅读马列原典和毛泽东著作，阅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等革命书刊，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高兴地和朋友说：“对中国的前途渐渐有信心了。”这一年的昆明，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日益高涨，先后举行了辛亥革命33周年、七七抗战、护国起义等一系列纪念会。昆明的民主运动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中的一面旗帜，西南联大赢得了“民主堡垒”的称号，闻一多也留下了“狮子”的美名。1945年，在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闻一多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后又担任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

眼见民主运动如火如荼，国民党当局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镇压。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大批特务和军人携带武器，分批闯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师范学院和联大附中等五处，袭击学生，以手榴弹炸死南菁中学教员于再、联大学生李鲁连和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又以刺刀刺死联大女学生潘琰，另外打伤学生25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随后，又于1946年2月，制造重庆“较场口血案”；6月，制造南京“下关惨案”；仅1946年6月间，国民党就逮捕了1.3万余名反内战的工人、学生和市民。

时局险恶，然而民盟云南省支部和李公朴、闻一多等人迎难而上，更加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这边，自觉地按照党和民盟组织的要求行事，更加激愤地投入到民主运动中去。闻一多说，我们过去那种严守中立的超然态度是自欺欺人，再不能做袖手旁观或装聋作哑的消极中立者，要站出来“明是非，辨真伪”，要和平，要民主，反对内战。与此同时，朋友们对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的安危非常担心，劝他们尽早离开昆明。据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考证，1946年3月，蒋介石在向西南联大三青团训话时，就给闻一多等人戴上了“不法教师，污辱党国，甘为共匪奴隶”的帽子，要手下“加以还击”。6月，时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拟定了一份包括李公朴、闻一多、张奚若、潘光旦、罗隆基、楚图南、费孝通等十多人在内的暗杀名单，呈报蒋介石圈定。面对朋友的好意劝说，李公朴的回应是：“像我们搞民主运动的人，前脚跨出门，后脚就不准备跨回来！”

^① 刘文孝、刘圣雨：《文化雄狮闻一多》，第145页。

闻一多的回答则是：“形势愈紧张，我们愈应该把责任担当起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①

1946年7月，特务们更加无所顾忌。而此时的西南联大已经宣布解散，绝大部分师生开始分批北返，但两位先生再次拒绝了朋友们的劝告，坚决留在昆明，照常奔走，照常工作，宁可倒下，决不屈服。7月11日晚9时许，李公朴在昆明青云街口至学院坡的岔路上，惨遭特务暗杀身亡。深夜时，有人来告知闻先生，嘱咐他多加小心。但他置生死于度外，第二天一大早，在瞻仰李公朴遗容后，又到民盟讨论起草了《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为李公朴同志被暴徒暗杀事件之严重抗议》，他毫不含糊地在声明中指出这是国民党所为，并冒着生命危险组织李公朴治丧委员会。

7月15日清晨，又有朋友来报信，让闻一多千万小心。闻一多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去，什么事都不能进行，怎么对得起死者。假如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都畏缩不前，放下民主工作，以后谁还愿意参加民主运动，谁还信赖为民主工作的人？”甚至当天下午赴云南大学至公堂参加李公朴悼念会，才一出门，就被两个特务一前一后盯着，闻一多仍然鄙夷不屑，从容前行。^②为了安全，这次追悼会没有安排闻一多发言，但在报告李公朴的殉难经过时，特务们趁李夫人血泪控诉时起哄捣乱，闻一多忍无可忍，遂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他在讲演中先是怒斥反动派的罪行：

“暗杀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污蔑人，说什么‘桃色案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

接着，他赞扬了云南和昆明的光荣革命传统：

“去年‘一二·一’，昆明的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也遭遇了反动派的暗杀，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是昆明无限的光荣！”

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近的如‘一二·一’，这些都是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要发扬！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项任务！”

然后，他指出这次暗杀事件的历史意义：

“他们这样疯狂害怕，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真理是一定胜利的。反动派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反动派的末日，就是我们的光明！”

李先生赔上一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青的战士们的血，换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开会，李先生倒下了，也要换来一个政协会议的召开，我们有这信心！”

最后，闻先生表示了为民主正义的事业赴死的决心：

“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③

这最后一次的演讲所迸发出的勇气和正气，体现了闻一多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发展上下求索、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

追悼会后，闻一多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闻

^① 民盟中央：《民盟的传统，就是“李闻精神”——记“李闻血案”始末》，《大道：多党合作历史记忆和时代心声》，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年，第308页。

^② 刘文孝、刘圣雨：《文化雄狮闻一多》，第228页。

^③ 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王蒙主编：《中国精神读本》，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351—352页。

一多的大儿子闻立鹤担心他的安危，紧紧跟随保护。下午5时，当两人走到西仓坡的家门口时，被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李明山、崔宝山、刘锡林、何毅等前后夹击，左轮手枪、快慢机（德国造的二十响）一齐射向闻家父子。闻一多头中三枪，胸部、左腕也被击中，当场牺牲；闻立鹤扑到父亲身上保护，中了五枪，经抢救活了下来。据他回忆，“父亲满身全是枪眼，血像泉水一样喷出来，鲜血中还合着白色的脑浆。他双目紧闭，面色苍白，嘴唇微动一下，手杖、鞋子和眼镜统统都打掉了”。^①为了民主自由进行拼死斗争，决不退却，是闻一多最后的人格标志。

闻一多的牺牲，激起了国内外上下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应。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表达了愤怒和哀悼。7月1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致电西南联大请转闻一多家属，深表哀悼：“惊悉一多先生遇害，至深哀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特电致唁。”^②

10月4日，中共、民盟、各党派团体、各界人士、普通民众共5000余人，在上海举行了公祭大会。当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宣读他亲笔写下的悼词时，全场沸腾，报以雷鸣一般的掌声。“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至今读来，仍觉字字千钧。

此外，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这样说道：“我们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个人民主主义者的人们，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了起来。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就连20多年没写新诗的朱自清，也写下了《挽一多先生》：“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四、从闻一多到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闻一多是一个在人格上追求进步与不断完善的知识分子。他从一个浪漫的新月派诗人、一位留美的天才画家，转型为一位《楚辞》研究学者、一位古典文学教授，他的学术成就足以照耀中国诗坛、文坛、艺坛。最后，这个沉浸于爱与家庭中的丈夫与父亲，却选择将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置于家庭之上，毅然拍案而起成为民主斗士，最终从“春江花月夜”走向了屈原的大美。闻一多的一生终究不过一书生而已，但面对死亡的威胁，他表现出弘毅刚烈的性格特征，不潜逃、不退缩，用生命向学界和世人展现了他罕见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力量，并非书生之气，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气节和精神。

这种风骨、气节和精神，便是植根于知识分子心中的家国情怀。正是基于对国家的这份认同和挚爱，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才体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国家、民族的发展而不懈奋斗，用一生所学来报效国家、奉献社会。可以说，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而家国情怀正是爱国主义精神最鲜明的情感表现。孙中山先生说，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③关于怎么样爱国，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我们常讲，做人要有气节、要有人格。气节也好，人格也好，爱国是第一位的。我们是中华儿女，要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秉承中华文化基因，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要时时想到国家，处处想

^① 刘文孝、刘圣雨：《文化雄狮闻一多》，第231页。

^② 民盟中央：《民盟的传统，就是“李闻精神”——记“李闻血案”始末》，《大道：多党合作历史记忆和时代心声》，第311页。

^③ 见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97页。

到人民，做到‘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①这是总书记对如何爱国作出的最好注解。

从古至今，爱国报国，还是卖国损国，历来都是仁人志士与奸佞小人的试金石和分水岭。前者名垂青史、令人敬仰，后者遗臭万年、遭人唾弃。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舍生取义的事迹深为全体知识分子所敬仰。他的伟大之处便在于，不管身处何种境地，对祖国的忠贞之志始终不变；不管面对何种顽敌，拼死维护祖国利益的痴心不改；不管遇到再多威胁，慨然实现变革图强的决心不移。

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内容有所不同，但其内在精神意蕴则是始终一致的。砥砺家国情怀，笃行报国壮志，对当代中国每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不仅是本分、职责、情怀，更是指引大家干事创业、建功立业的指路明灯、奋斗航标。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里，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中指出：“新时代的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明大德、立大德，就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把个人的艺术追求、学术理想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同人民福祉紧紧结合在一起，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②

家国情怀需要用热血挥就，靠奋斗书写。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但同时又面临着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因而知识分子担负的责任更加艰巨。广大知识分子唯有保持家国情怀，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发时代之先声，在时代发展中有所作为，发扬敢于担当的精神，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积极发挥知识优势，攻坚克难、锐意进取，致力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方能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责任编辑：朱家麟

① 白凤国：《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北京：红旗出版社，2018年，第25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25页。

教育救国：追寻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

念兴昌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西南联大与全面抗战相始终，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在战火纷飞、亡国灭种的极端苦难中，西南联大不仅弦歌不辍、弦诵不绝，还为抗日战争直接输送了大批军事、科技、翻译等专业人才，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培育了一大批栋梁之才。西南联大师生继承和发展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精神，坚守刚毅坚卓、团结合作、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把大学当作捍卫国家荣誉与民族精神的第二战场，教书不忘救国，读书为了报国，为民族发展和国家建设保存了文化血脉，坚持科学救国、科学报国，是传承和弘扬爱国奋斗精神的光辉典范。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为我们开展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历史素材，是云南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学习和研究。

关键词：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教书救国；读书报国；科学救国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0)03-0079-10

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调研时，专程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考察，详细了解西南联大在抗战艰苦条件下赓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历史。在考察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深有感触地强调：“国难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西南联大，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际，“北清南合，联大花开”，西南联大师生秉持教书救国、科学救国、读书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战火纷飞艰难困苦中弦歌不辍、弦诵不绝。西南联大在云南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光辉的一页。

西南联大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坚守文化阵地，为国家和民族保存文化血脉。爱国主义是西南联大最宝贵的精神内核、最鲜亮的底色。^①西南联大传承和发展了五四运动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精神，联大师生把知识报国、文化立国、科学建国作为教书学习的重要信念，传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崇高民族气节，谱写了一曲教育救国的爱国主义赞歌。

一、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大部

作者简介：念兴昌，云南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讲师，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与政策、云南历史文化。

^① 饶卫：《教育报国守初心 立德树人担使命》，《云南日报》2020年4月20日，第7版。

分大学不同程度地遭到日寇铁蹄的践踏和摧残，各大学纷纷南迁和西迁。“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这种局势下，位于北京、天津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先后迁到长沙等地，众师生在战火中穿越了大半个中国，历经数千里辗转跋涉来到昆明，联合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汇聚了当时中国的教育精华，在文化传承、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典范，甚至成为享誉世界的现代大学。

（一）“绝缴移栽楨干质”，西南联大造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文化长征”

西南联大与全面抗战相始终，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师生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冒着生命危险，历尽艰苦磨难，把国家的文化命脉和教育火种转移到抗战的大后方，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培养和储备了栋梁之才。三校师生从北京、天津长途跋涉近4000公里，最终到达昆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长沙迁移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由250余名联大师生组成，由闻一多、李继侗、曾昭抡等11名联大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队徒步1700多公里，历时68天，跨越湖南、贵州两省抵达云南昆明。通过这次艰苦的跋涉，联大师生深刻体察和感受到了民间疾苦，从“象牙塔”走向现实社会，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体悟。这段漫长的征途锻炼了联大师生的体力和毅力、心志和意志，他们在跋山涉水、草行露宿的迁移中收获了心灵的成长。正如吴晗在1945年西南联大最后一次校庆活动上的演讲中所说，联大师生“受了战争的洗礼，流亡和轰炸的锻炼，原来养尊处优惯的三校师生，在这八年中，过惯缩紧裤带，肘穿肩露的战时生活，从象牙塔走到十字街头，从十字街头跌进贫民窟，也就是说联大生活在人民中，联大的大多数成员都成为真正人民的一员了。物质的困苦铸成精神的坚强，阶层的转变也自然消除了过去和人民隔离的鸿沟，他们不但接近人民，而且道道地地生活在人民中，体验，明白了人民大众的痛苦，遭遇。”^①这些独特的生存考验，使得联大师生睁开了眼睛，看得更远，思考更加深入，也更加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三校从北向南的大迁移，造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文化长征”，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保存了有生力量。

（二）三校合作无间、相得益彰、团结互助、共克时艰、共赴国难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指出，“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具有不同的历史、学风和教风，甚至学科发展、管理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但三校在八年多的时间里能够相互扶持、相互配合、团结合作，正因为怀抱着抗战必胜、民族复兴这一共同的理想信念，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艰苦境况下，联大师生始终能够在包容合作中互帮互助、共渡难关、共克时艰。“清华如云的庄严，北大如海的包容，南开如山的镇静，这三种传统的精神融铸成了今日的联大。”^②三校师生在联合之初还存在一定的嫌隙，但随着日寇加快侵略步伐，大片国土沦丧、山河破碎、人民颠沛流离，亡国灭种危机日益加深，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师生抛弃了所有的分歧，团结协作、共赴国难。联大融合了北大的自由包容、清华的严谨求实、南开的活泼创新，最终铸就了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的旷达胸襟和精神气度。

（三）“中兴业，须人杰”，西南联大大师云集、人才辈出，为抗战建国培育了大批人杰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在就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时的演讲中指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

^① 吴晗：《联大精神》，龙美光编：《刚毅坚卓未央歌——西南联大精神漫笔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6页。

^② 李白雁：《抗战中的西南联大》，龙美光编：《刚毅坚卓未央歌——西南联大精神漫笔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28页。

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①西南联大在昆明筹建之初，连校舍都是租借昆明当地中学、会馆的房屋，但汇集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大师、学者，西南联大以大师立校。据长期研究西南联大的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璋整理统计，八年间先后共有305名教授在西南联大任教^②，如中文系有朱自清、罗庸、王力、魏建功、闻一多、罗常培、刘文典、唐兰等，历史系有陈寅恪、雷海宗、钱穆、郑天挺等，哲学心理系有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沈有鼎、贺麟等，数学系有江泽涵、杨武之、陈省身、华罗庚等，物理系有叶企孙、饶毓泰、吴大猷、赵忠尧、吴有训、周培源等，生物系有李继侗、张景钺、吴韞珍等，地质地理气象系有孙云铸、冯景兰、袁复礼、赵九章等，政治系有张奚若、钱端升、王赣愚等，社会学系有陈达、潘光旦、陈序经、费孝通等，机械系工程有庄前鼎、刘仙洲、李辑祥、孟广喆……联大的教师都是学界泰斗，很多还是学贯中西的大师。雄厚的师资力量为联大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课程，据不完全统计，联大八年共开设了1600多门课程。^③这些课程，特别是基础课程，绝大部分都是由著名教授担任。在八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有约8000人在西南联大就读，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国防等各领域的骨干力量。西南联大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2位诺贝尔奖得主，郭永怀、赵九章、陈芳允、屠守锷、邓稼先、杨嘉墀、朱光亚、王希季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郑哲敏、于敏6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和173位两院院士，费孝通、华罗庚、宋平、王汉斌、彭佩云、朱光亚、钱伟长、孙孚凌等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截至1997年，西南联大师生中，有172人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④西南联大汇集了当时国内外一大批才智超群的学者，也吸引了众多海内外优秀的年轻学子，可谓大师云集、群英荟萃，联大师生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成就，不仅铸就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也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1941年，西南联大建校第四年，正逢清华大学校庆30周年，牛津大学发来的贺信中就有“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之赞誉。

二、教书不忘救国，读书为了报国

“教书不忘救国，读书为了报国”是西南联大师生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写照。联大教师在外敌入侵的战火中仍然坚持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战乱中保持弦歌不辍、弦诵不绝。联大学生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苦难中坚持潜心学习、刻苦钻研，在学校迁移、跑警报、参军抗战等艰苦环境中仍然坚持读书学习，同时又积极拥抱社会现实、支持抗战建国。“当年西南联大师生人人关心国家命运，抗战必胜，日寇必败，已成为联大师生的共识。”^⑤联大师生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始终保持抗日必胜、正义必胜的信心，肩负着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崇高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坚信中华民族在这场苦难中不会灭亡，以“中兴业，需人杰”自激自励，用实际行动恪守和践行这一信念，联大师生通过应征入伍、参与抗日救亡活动等方式支持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

① 梅贻琦：《民国人文读本 中国人的教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年，第123页。

② 吴宝璋：《西南联大二十五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16页。

③ 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87页。

④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修订版）：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14—516页。

⑤ 任继愈：《自由与包容：西南联大人和事》，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64页。

(一) 在艰难困苦中保持弦歌不辍、弦诵不绝

据联大物理系教授任之恭回忆,西南联大在昆明创立之初,“除了人,什么也没有。事实上它一点不像我们习惯于想象的那种学校:没有一间教室、一块黑板或书写纸张。教师没有讲义,学生没有书本。教职员和学生没有住处,没有吃饭的地方,什么也没有。尽管如此,学生们还是通过口信互相告知上课的时间和地点,然后聚集在一起听课和讨论。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能‘上课’。由于常常遭到日本人的空袭,许多人都约好去昆明野外的‘防空壕’去谈论事情,有时也就在那儿上课。”^①联大师生在物质条件极度简陋的环境中,仍然保持着对教书、读书、学习、研究的热情。联大社会学系教授陈达在其日记中曾记下在荒郊野外坟场授课的场景:“晨十时三十五分,忽闻空袭警报!有人提议到郊外躲警报兼上课,余欣然从之。……学生十一人即在树林里坐下,各人拿出笔记本,余找得一泥坟坐下,讲C. Gini氏及Pearl与A. M. Carrsaunders氏的人口理论,历一小时半有余。阳光颇大,无风。在旷野树林下讲学,大家认为难得的机会。其他疏散人等路过此地,亦站片刻听讲。”^②在“跑警报”、躲避敌机轰炸的路上,联大师生抓住一切机会进行读书学习,可以说把教书救国、读书报国做到了极致。虽然物质条件得不到基本的保证,但联大师生教书学习的动力和毅力反而更加强劲,联大学子、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就高度评价了联大的教风学风:“战时中国大学的物质条件很差,然而西南联大的群体,即教师、学生和行政领导,以良好的风气和非常认真的教、学态度弥补了这一缺陷。”^③联大师生用坚韧刚毅的精神把中华民族教书、读书传统很好地延续和保存了下来。

(二) 投笔从戎,直接参军抗战,积极参与抗日救国活动

在国家、民族与外敌殊死抗争之际,联大师生以天下为己任,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先后掀起了三次从军热潮。第一次是抗战初期,三校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学生积极参军抗战。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学校就对学生进行过军事化管理和训练,并设立了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鼓励学生积极参军抗战,有将近300人报名参军,他们主要有三个去向:到军事系统从事技术工作;参加战地服务团赴各地从事救亡工作;从事军事后勤服务工作或者入军校学习。^④第二次是1941年至1944年应征学生做随军翻译官。1941年起,美国政府向中国派遣飞机、志愿飞行员和机械师,担任空中防务,完成飞跃驼峰航线的运输任务,协助中国远征军巩固滇缅公路、开拓中印公路等,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向各个前往内地的大学三、四年级男生征召参加翻译工作一年。1943年至1944年,联大志愿应征参加随军翻译的人数达到400多人,其中包括30多名低年级的学生。^⑤第三次是参加青年远征军。1944年10月,为响应国民政府发动十万青年从军运动的号召,联大教授纷纷作了动员讲话,联大20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奔赴印度和缅甸的远征军。^⑥另外,还有部分联大学生被应招录取为飞行

① 任之恭:《一位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范岱年、范建年、范华译,山西: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第85—86页。

② 陈达:《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8页。

③ 杨振宁:《忆在西南联大的艰苦岁月》,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17页。

④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修订版):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第61—62页。

⑤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修订版):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第65页。

⑥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修订版):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第67页。

员，很多人在空战中以身殉国。据工学院院长施嘉炆回忆，八年间，西南联大学生应征给美军做翻译的，“连同加入青年远征军及空军的西南联大学生，前后共达800余人”^①。据统计，在八年多的时间里，西南联大（含长沙临时大学）至少有1140多人从军。^②除了这三次大的从军行动外，联大师生还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全力支持抗日战争。在参与战争的各种行动中，联大学子进一步增强了爱国报国情怀，提升了民族自信心。“对于联大学子，战争生活是一次思想的炼狱。战争催化了他们的思考，积淀和提升了他们的家国情怀。”^③经过战争的洗礼，联大师生更加坚定了教书救国、读书报国的信心。

（三）把学校作为支持抗战的第二战场，誓死捍卫国家荣誉与民族精神

曾在联大中文系就读的汪曾祺回忆，“到昆明来考联大的，多数是坐公共汽车来的，乘滇越铁路火车来的，但也有利用很奇怪的交通工具来的。物理系有个姓应的学生，是自己买了一头毛驴，从西康骑到昆明来的。”^④西南联大虽然地处西南边陲，但却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爱国知识青年，他们穿越日寇封锁线，历尽艰险赶赴西南联大求学，甚至有很多南亚、东南亚华人华侨学生为了报考西南联大不远万里来到昆明。联大师生“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对国家民族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对敬业、求知的追求”^⑤。联大师生在学校读书学习的同时，积极参与抗战宣传动员，他们一直坚信教书、读书也是另一种方式的救国，秉持文化救国的信念，传承中华民族精神，誓死不当亡国奴。据任继愈回忆，长沙临大时期，联大师生对上前线还是留校念书的问题产生了很多争论，钱穆在辩论中鼓励联大学子无论是上战场还是在校学习读书都需要巨大的勇气，要上战场的激情和勇气来读书报国。

另外，钱穆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期写作的《国史大纲》扉页上就印有“本书谨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的题辞。针对当时国人对我国历史文化缺乏自信的现状，钱穆在《国史大纲》序言中特别强调学习和热爱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才是真正的爱国，他认为在日寇入侵、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是团结全国民众抵抗强敌的一个重要途径。这本书一出版就立即风行全国，在山河破碎之际提振了士气、凝聚了人心。据联大外语系学生赵瑞蕙回忆，1939年8月，朱自清在蒙自为清华第十级毕业生题词时说：“诸君又走了这么多的路，更多的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其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的。”^⑥联大师生把教书、读书作为文化抗战的重要手段，把学校作为支持抗战的第二战场，从文化上捍卫了国家荣誉和民族精神。

（四）积极参与民主革命，支持民主建国

西南联大继承了三校的民主传统，特别是承继和发展了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民主精神。联大师生积极参与和组织发动了爱国民主运动，使西南联大成为当时西南地区乃至全中国的“民主堡垒”。1942年1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宁愿用飞机运送宠物狗，也拒绝搭载联大教授陈寅恪离开香港，联大学生在得知这一信息后，自发组织了“倒孔”运动，并得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的支持，开启了西南联大民主运动的新阶段。1944年，联大进步

① 施嘉炆：《怀念梅贻琦先生》，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5页。

② 吴宝璋：《西南联大二十五讲》，第28页。

③ 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306页。

④ 汪曾祺：《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年，第28页。

⑤ 陈岱孙：《往事偶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09页。

⑥ 赵瑞蕙：《离乱弦歌忆旧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学生举办了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抗议国民党政府要将青年节由5月4日改为3月29日的意图。此后，联大师生还联合昆明其他学校一起组织开展“七七”抗战七周年时事晚会、云南护国首义纪念大会、五四纪念周活动等。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希望实现和平民主建国，但国民党政府却一意孤行，坚持一党专政，悍然发动了内战。194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作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积极响应号召，首先行动起来，投入到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中。联大师生组织的民主演讲、讨论会等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暴力阻挠，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联大师生随即发起了“一二·一”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和支持，把联大师生的民主爱国运动推向了高潮。这一爱国民主精神还直接影响到后来昆明学生的“七·一五”反美扶日运动。联大师生面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敢于英勇斗争，以鲜血和生命捍卫民主自由权利，推动了国家民主政治发展进程。

三、保存知识文明火种，赓续民族文化血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不仅侵占我河山，而且实施奴化教育，试图对中华民族进行文化侵略。但中华民族历经千年风雨，在任何苦难中仍能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最根本的力量在于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持久的精神动力。西南联大师生为了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延续性，在与日寇殊死较量中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中华民族知识和文化的火种。

（一）延续民族文化生命，为民族发展和国家建设积蓄文化力量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京津地区、沿海地区高校纷纷前往抗战的大后方，为国家和民族发展保存了民族文化血脉，其中以西南联大最为典型。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从京津地区先后辗转迁移到湖南、云南、四川等地，汇聚了一批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方面深有造诣的大师，他们以坚韧勇毅的精神在教学和研究活动中坚持继承中华文化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对“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迁移壮举有这样一段评价：“这次长征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跋涉之旅。此后是八年患难，它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才能的象征；因此，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持续不辍的象征。”^①这也是对那一代知识分子坚持文化救国精神的赞许，同时他们艰辛的付出与探索也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南联大师生具有超凡的远见卓识，他们始终在学习和传承中华文化传统的过程中保持着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力，无论是教书育人、读书学习、科学研究，还是参加抗日救国活动，都饱含着强烈的爱国之情，他们的文化救国行动为民族发展和国家建设积蓄了文化力量。1939年1月，潘光旦在《今日评论》第一卷第二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抗战的民族意义》的文章，他在文中特别指出了抗战真正考验的是我们民族的“精气神”。“抗战的最后意义无疑是民族的，而不止是政治的、经济的。”“抗战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测验我们民族的元气，来量断我们民族的活力或竟存力。”^②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人民也无可例外的积贫积弱，但抗战焕发了我们民族的品性和操守，激发了民族活力，聚集起中华民族的元气。这在联大师生的言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西南联大延续了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在抗战中坚持推动文化革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接力者。“在联大，没有人能够武断专横，也没有人敢借势凌人。大家都在讨论商

① [美] 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64页。

② 潘光旦：《优生与抗战》，北京：商务印书局，1947年，第67—68页。

量着如何才能负起推进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使命，如何使抗战建国的大业迅速完成。”^①早在抗战期间，联大师生就已经认识到西南联大为国家为民族培育人才、储备人才的重要性。

（二）转移社会风气，为地方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西南联大在滇八年，不仅引领了云南社会文化、社会风尚的发展，还让云南一时成为引领西南乃至全国文化发展的重镇。“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在昆明，因为昆明有西南联大。”^②正是因为联大的到来，才使中国文化中心转移到了处于西南边陲的昆明。西南联大不仅直接带动了云南教育文化的发展，联大师生在开展调查研究、参与地方社会治理等活动中还对云南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带动和引领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的现代化发展进程。1946年5月，西南联大准备复员北返之际，云南全省商会联合会及昆明市商会代表云南父老送别西南联大，邀请云南大学教授白之瀚撰写文章和对联赠送西南联大，撰文《公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归复校序》中特别赞扬了西南联大对云南文化发展的贡献：“留滇九年，凡所以导扬文化，恢宏学术者无不至，一时文教之盛，遂使昆明屹然为西南文化之中心。”^③这是西南联大对云南乃至西南地区做出的重要贡献，为云南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联大师生在很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云南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1947年，联大哲学心理学系主任周先庚的夫人郑芳在《抗战期中的教授太太们》一文中饱含深情地描绘了联大师生在学习研究之余的生活场景，表达了联大师生对云南接纳、包容和支持的眷恋之情。“谁都说联大搬走了，使昆明寂静了，随着联大的迁移，使昆明街上不再身穿蓝布大褂，手挽菜篮子，出进菜市的教授太太们，看不见文林街上，衣著整齐，活泼可爱，跳跃着跑到学校去的教授的孩子们，一种勤俭，刻苦，耐劳而乐观的态度，曾经不知感动过多少昆明的居民的，希望并没有随联大而消失，却能深深地种在昆明每一个居民的心上，像一个小小的花苞似的，逐渐盛放开来，光明灿烂，把整个城市都披上了一阵美丽的色彩，这就是联大八年在昆明所遗留给昆明的一个永久的纪念品。”^④联大师生的一举一动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云南社会文化风尚的发展，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西南联大为云南培养了一大批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方面的人才，对云南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据档案记载，仅1942年第一学期，联大全校2760学生中就有云南籍287人，占比10.4%；1938年底，联大增设了师范学院，在滇期间师范学院为云南培养了本科生187人、专科生292人、晋修班117人，共计696人。^⑤西南联大结束时把师范学院永远留在了云南，同时联大师生还在云南创办了很多中小学校，如现在的云师大附中及天祥中学、粤秀中学、松坡中学、五华中学、长城中学、求实中学、金江中学、建国中学等，为云南基础教育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四、科学救国，科学报国

曾参加过西南联大中学教师晋修班的马曜先生认为，“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热爱民主，是西

① 何文：《她依旧是文化运动的摇篮》，龙美光编：《我以我血荐轩辕——西南联大爱国运动纪》，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3页。

② 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第37页。

③ 陈友康：《云南读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6页。

④ 郑芳：《抗战期中的教授太太们》，龙美光编：《布东考古布西算——西南联大师生众生相》，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68页。

⑤ 吴宝璋：《西南联大二十五讲》，第94—95页。

南联大留给我们的遗产。”^①西南联大建立和发展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治校传统，联大师生一直把坚持科学研究作为实现科学救国、科学报国之志的重要方式，他们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几乎把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他们一直坚信发展科学技术是使国家民族摆脱危机、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重要途径。正如叶企孙在1929年写的《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②联大师生抱定科学救国、科学建国的信念，在科研条件极度受限的境况下，克服困难，抓住一切机会坚持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取得了很多引起世界瞩目的科研成果，为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国防、工业、医学等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同时，联大师生也积极参与云南地方建设，在西南地区开展经济、社会、文化、民族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对西南民族文化、动植物、矿产、水利等资源进行摸底、勘测调查，为国家进行西南开发、边疆治理做好了前期准备。

（一）坚持科学研究，服务抗战救国，为新中国建设打下坚实科学发展基础

坚持基础研究是联大师生对抗战建国做出的最重要贡献，也是西南联大在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无论条件如何艰苦，西南联大师生都坚持严格教学、严谨治学、刻苦钻研，不仅竭尽所能用科研成果支持抗战，还坚持做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引入和发展了西方现代科学理论，积极推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很多联大大学人对中国社会文化、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联大大学人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又吸收借鉴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创造出了许多精品力作。如中文系朱自清的《新诗杂谈》，闻一多的《楚辞校补》，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罗庸的《鸭池十讲》等；外语系吴达元的《法国文学史》，吴宓的《世界文学史大纲》；历史系郑天挺的《清史探微》，吴晗的《明太祖》，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等；哲学心理学系金岳霖的《论道》，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汤用彤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政治学系张奚若、钱端升主编的《西南联大行政研究室丛书》等；社会学系陈达的《中国人口问题之研究》，潘光旦的《优生与抗战》等。在自然科学方面，联大大学人坚持理论创新和科技创新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国家和民族发展厚植科学发展根基。如算学系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等；生物系张景钺、李继侗、吴韞珍合编的《普通植物学》，经利彬、吴征镒、匡可任等合编的《滇南本草图谱》等；物理系周培源的《湍流论》，吴大猷《多原子分子的机构及其振动光谱》等；地质气象系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王竹溪的《热学问题之研究》等；机械工程系刘仙洲的《热工学》等。据联大物理系教授郭沂曾统计，“1939年至1946年六期的《中国物理学报》共发表文章38篇，其中西南联大（包括清华研究所）师生的文章占26篇。此外，从《中国物理学报》的引文中看到：西南联大教师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尚有16篇。”^③

为支持抗日战争，联大师生坚持科学救国，并用自身所学所专直接参与到抗战行动之中。如

^① 马曜：《珍视西南联合大学留给云南的遗产》，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 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专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6页。

^② 叶铭汉、戴念祖、李艳平编：《叶企孙文存》，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9页。

^③ 郭沂曾：《忆西南联大物理系》，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29页。

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创始人叶企孙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毅然支持其学生熊大缜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研制烈性炸药、地雷和雷管等，为冀中抗战解决了技术难题，用自身的专业特长直接支持抗战。^① 1938年7月，按照国民政府的指令，联大工学院增设航空工程系；1939年2月，联大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又增设电讯专修科，同时还对机械系高年级学生进行机械化部队训练，学生受训后被分配到各地开展工作。为适应抗战之需要，联大工学院还增设了很多军事工程方面的课程，如庄前鼎的“兵器学”，施嘉炆的“堡垒工程”“野战堡垒”，王明之的“军用桥梁”“军用结构”，吴柳生的“飞机场设计”，陈永龄、李庆海的“航空测量”，白英的“船舶设计”等。^② 1943年，联大工学院教师利用学校的设备组建了清华服务社，服务社的机械工程部为美国陆空军提供建筑材料，应用化学部制造了牙水、发油向昆明市民发售，农艺部还提供碾米服务和制售酱油等。^③ 联大学人用自己的科研和专业优势或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抗战，他们始终秉承科学救国、科学建国的信念，坚持读书学习、科学研究。1943年2月，李约瑟（Joseph Needham）以“英国文化科学赴华使团”身份到昆明进行科学考察，并在《科学》杂志发表了其在中国西南之行的所见所闻，高度赞扬了以西南联大学人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艰苦环境中坚持做科学研究的爱国之情：“留在参观这个重要云南省各科学研究所诸人之脑海中者，为他们在我国边远之区所表现的一种不可克服的坚忍与勇气，与其在这样艰苦之中所表现的安然自得之精神。此对于曾有宠幸的看见他们工作于这样环境之下的任何人，将来回想起来，将是一件很有感触的经历，而于其时，这些科学家，必已回复其原来位置，并重建其应享之繁荣了。”^④

（二）参与边疆治理，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

“自联合大学南来，集诸科多数之专家，得悠长之岁月，或以修志躬莅其地，或受委托精究处事，其已集结者，不少成书，其待编者，一应层出不穷。”^⑤ 西南联大在滇期间，不仅对云南社会风气转变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联大师生也直接参与边疆地区的科学考察、社会文化调查、工程项目开发等边疆治理活动，为地方建设、边疆开发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积极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如针对云南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联大师生就进行了多方面、多维度、立体式的调查研究，并提出了很多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⑥ 很多研究成果至今对云南建设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1942至1943年，受政府委托与资助，由陶云逵、冯文潜等教授创办的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团队先后两次对石佛（今云南石屏—勐海）铁路沿线进行综合考察，收集并整理了这一地区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及经济地理学等多学科的丰富资料，第一次对西南边疆地区进行长达10个多月的大规模综合考察；1940年至1945年，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主持的燕京大学与云南大学合组的社会学研究室对云南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关系等

① 胡升华：《叶企孙先生与“熊大缜案”》，钱伟长、虞昊主编：《一代师表叶企孙》，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200—208页。

②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修订版）：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第256—257页。

③ 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四续）》，龙美光编：《笳吹弦诵在山城——西南联大学术风景线》，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5页。

④ [英]李约瑟：《战时中国西南部科学之发展》，龙美光编：《笳吹弦诵在山城——西南联大学术风景线》，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40页。

⑤ 陈友康：《云南读本》，第225页。

⑥ 王浩禹：《国家需要与地方建设：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人对云南经济开发的认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1卷第5期，第114—125页。

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两个研究团队都完成了大量调研成果。如陶云逵的《西南部族之鸡骨卜》，邢公畹的《远羊寨仲歌记音》，高华年的《昆明核桃箐村土语研究》，费孝通的《云南三村》，史国衡的《昆长劳工》，谷苞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的研究》等论著，为后来云南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现实指导。

在自然科学方面，如联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率领“西康科学考察团”师生对西昌、大凉山彝族地区矿产资源、交通情况进行普查和核实，为后来攀枝花矿区开采提供了重要参考；土木工程系教授施嘉炆与资源委员会合作组成“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队”，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两期勘测任务，为云南水力资源开发做出了初步规划，同时设计出腾冲水电站、富民水电站等一批水电站，出版了《昆明水工研究丛刊》；地质地理气象系教授谭锡畴在教学之余，应地方政府之请主持宣威煤矿的勘探和开采工作，并完成了《易门铁矿地质探矿暨地球物理探勘工作概况》《云南矿产概况及其在全国所占之地位》及《世界工业矿产概论》等许多有价值的论著；生物系系主任李继侗常常带领学生到昆明近郊和大理、宾川、鸡足山等滇西地区考察荒地，为边疆开荒和移民进行了大量调研工作。联大师生用自身的专业特长和优势为西南边疆发展注入了现代科技和社会文化方面的新动力。

结语

爱国报国早已深深融入联大师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和工作之中，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生动诠释了教书救国、读书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传承和弘扬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要把个人命运融入祖国富强、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去，将个人事业与国家事业、民族事业紧密相连，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历史具有丰富的内涵，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典型案例。一方面，我们要在学习和研究基础上，深入挖掘西南联大教育救国、文化兴国、知识报国、科学建国的历史，宣传好西南联大师生投身抗日救亡、科学救国、文化救国的典型事迹，用联大师生深切的爱国情怀感染和鼓舞更多海内外华夏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西南联大这一独特的云南历史文化资源，讲好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把西南联大的历史作为讲好云南故事的重要章节，为弘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做出云南特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朱家麟

为国而歌：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战斗青春

朱家麟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聂耳是著名的人民音乐家，也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音乐家之一，他在23年短暂的人生中创作了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37首经典歌曲，为中国音乐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聂耳自幼熟知民间疾苦，从学生时代就积极投身革命，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和超凡的努力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成长为一名出色的人民音乐家。尽管聂耳在音乐创作渐入佳境时意外英年早逝，但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创作的那些鼓舞劳苦大众精神、激励中国人民斗志的不朽作品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披荆斩棘、奋勇争先，他在逆境中艰苦奋斗的精神和诚信友善的宝贵品质也将被人民铭记。新时代，我们回顾聂耳革命和创作的短暂一生，应当继承和发扬他为国为民而歌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关键词：聂耳；义勇军进行曲；爱国主义；革命斗争精神；人民音乐家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0)03-0089-07

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音乐家。聂耳祖籍云南玉溪，出生于昆明。18岁以前，除了曾到湖南郴州短暂参军，他一直生活在昆明。1930年，聂耳来到上海，开始短暂而辉煌的音乐创作生涯。聂耳短暂的一生中创作的37首乐曲，全部创作于其人生的最后四年，其中就包括被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

来到上海之后的短短五年时间里，聂耳从业余音乐爱好者成长为优秀的人民音乐家，从青涩的热血青年成长为成熟的中共党员。研究聂耳最后五年的活动轨迹，对于我们认识聂耳的革命思想和音乐成就，了解其作品诞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在艰苦岁月中走上音乐道路

1930年7月，18岁的聂耳从云南省立师范毕业。由于有人告密，国民党当局知道了聂耳在校期间加入共青团并组织革命活动的事，开始对他进行监视并准备逮捕。为了躲避风头，他的三哥聂叙伦决定让他代替自己到上海远东皮毛公司开设的“云丰申庄”工作。

7月10日，聂耳匆忙乘火车离开昆明，这一走就没能再回来。当时，从昆明到上海没有直达火车，乘客只能先从滇越铁路到越南海防，从那里乘船前往香港，再从香港换船前往上海。7月18日，聂耳到达上海，按原定计划开始在“云丰申庄”当店员。

此时的聂耳，为了糊口，每天做着繁重的工作。当时，聂耳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音乐教育，

作者简介：朱家麟，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教师，研究方向为历史与传统文化。

也没有多少人相信他能在人才济济的大上海走上职业音乐创作的道路。然而,不管条件如何艰苦,聂耳从来没有忘记他的音乐梦想。

(一) 自幼与音乐结缘

据三哥聂叙伦回忆,聂耳从小就对音乐感兴趣。他们家住在端仕街的时候,邻居中有一位姓邱的木匠师傅,平时很喜欢吹奏短笛,年幼的聂耳经常听得入神,并跟着曲调反复哼唱。邱师傅知道后,主动教聂耳吹笛子,并成为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音乐老师。

就读昆明县立师范附小、私立求实小学、云南省第一联合中学和省立第一师范学院期间,聂耳在刻苦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利用校内外各种学习机会掌握了简谱和五线谱,先后学会了演奏二胡、三弦、月琴、铜号、扬琴、笙、古筝、小提琴、钢琴等中西乐器,甚至还接触到了《国际歌》《伏尔加河》《马赛曲》等革命歌曲。^①

在音乐方面,聂耳除了勤于学习,还有很强的表演热情。根据当时留下的资料,从高小(当时的学制把小学分为“初小”和“高小”两个阶段)开始,聂耳就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学生乐团,除了在校内演奏,还经常到翠湖、文庙、大观楼等昆明市内人员较为集中的场所公开表演。除此之外,聂耳和二哥聂子明、三哥聂叙伦还组织了家庭小乐团,除了在自家铺面表演,他们还经常带着乐器到西山、圆通山、金殿等风景名胜演奏,所到之处,行人纷纷驻足聆听。

就这样,在昆明的18年里,尽管聂耳没进过专业的音乐院校学习,却在不断的学习实践中充分发展了他的音乐才能,还通过音乐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为他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音乐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在初到上海的艰难岁月中发掘音乐天赋

1930年7月,刚到上海的聂耳在“云丰申庄”当店员。按商号当时的规定,工作的第一个月没有工资,只提供食宿,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小时以上。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聂耳依然没有忘记他的革命理想和音乐理想。

到达上海仅3个月,聂耳就通过云南老乡的关系加入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反帝大同盟”,再次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同时,通过接触革命文艺作品和阅读相关论文,他对于艺术的“大众化”也有了新的认识。^②

聂耳也把热爱读书学习的习惯带到了上海。在“云丰申庄”工作几个月之后,他每月终于有了15块钱的津贴。工资一到手,他马上就用来买书。为了更好地学习国外的先进文化,聂耳一直重视外语学习。就读云南省立师范期间,他除了主修英语,还选修了日语。到上海后,他又买了《日语读本》《英语周刊》等书籍,继续坚持自学。

当然,聂耳最热衷的还是学习音乐。1930年底,他有了一些额外的收入,马上买了丰子恺的《音乐入门》等书籍,还买了一把廉价小提琴,每天坚持自学,努力提高自己的音乐水平。

但这样的日子没能持续多久,1931年3月29日,“云丰申庄”倒闭,聂耳失业了。为了生存,他只能四处求职。4月1日,凭着对音乐才能的自信,聂耳参加了“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班”的考试,面试官是当时的著名音乐人、被后人称为“中国流行音乐之父”的黎锦晖。根据黎锦晖之子黎泽荣回忆,聂耳在初试时非常紧张,演奏小提琴频频出错,但黎锦晖还是给了这个年轻人复试的机会。^③4月8日复试时,聂耳的表现有了明显提高,终于被歌舞班录取。1931年4月

① 昆明文史研究馆编:《聂耳——从昆明走向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2—153页。

② 《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中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276页。

③ 昆明文史研究馆编:《聂耳——从昆明走向世界》,第210页。

22日，聂耳进入联华歌舞班，取艺名“聂紫艺”，正式走上了职业音乐人的道路。

虽然聂耳从小自学乐理知识和乐器演奏技能，并积极参加音乐活动，但由于没有受过专业音乐训练，刚进入联华歌舞班时他还是遇到了不少困难。据黎锦晖回忆，为了帮助聂耳提高小提琴演奏水平，黎锦晖安排歌舞班的首席小提琴手王人艺来教他。王人艺虽然比聂耳小半岁，在指导聂耳练习时却毫不含糊，要求非常严格。由于聂耳乐理基础不牢，听不懂专业术语，经常招来同龄老师的严厉批评，但他并不因此气馁，反而加倍努力学习和训练，每天在工作之外还要练琴8小时以上，甚至在患病时也坚持不辍。^①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使用“聂耳”这个名字。

聂耳的辛苦付出很快得到了回报。由于小提琴演奏技艺突飞猛进，进入歌舞班第二年，黎锦晖就将他升格为正式登台的小提琴手，在王人艺到北平养病和学习期间，更让他担任乐队首席小提琴手。根据现有资料，聂耳最初的音乐作品，如口琴曲《圆舞曲》和歌舞曲《天伦之爱》等，正是创作于1932年初。^②

1932年3月，联华影业公司精简机构，歌舞班脱离公司组建明月歌剧社，聂耳担任负责音乐研究股的执行委员。至此，聂耳终于在竞争激烈的大上海站住了脚，也在音乐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二、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民音乐家

凭着出色的天赋和超乎常人的努力，没有受过一天音乐专业训练的聂耳在来到上海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就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职业小提琴手。然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紧要关头。中学时代就加入共青团、积极参与爱国学生运动的聂耳，在急剧变化的大环境下，不能更不愿“两耳不闻窗外事”，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中。正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影响了聂耳的音乐和人生道路，让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人民音乐家。

（一）在学艺道路和革命实践中完成自身为人民创作音乐的思想转变

聂耳能在初试表现不理想的情况下入职联华歌舞班，得益于黎锦晖的慧眼识珠；能在短时间内成长为歌舞班的首席小提琴手，也离不开黎锦晖的青眼有加。对于音乐底子薄，在上海又人生地不熟的聂耳来说，黎锦晖无疑是他的恩师与伯乐。聂耳从小就很喜欢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与之合作共事后更是对其尊敬有加。亦师亦友的两人一度关系融洽，经常在一起畅谈对个人发展和中国音乐的思考。

随后，日军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事变，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人民高涨的爱国热情都让身在上海的聂耳受到了很大震动，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和艺术观。他在日记中写道：“所谓 classic，不是有闲阶级的玩意儿吗？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基本练习，几年，几十年后成为一个 violinist 又怎样？你演奏一曲贝多芬的《Sonata》能够兴奋起、可以鼓舞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③由此，他继续苦苦思索如何用音乐表达劳苦大众的呼声和中华民族解放的主题。

1932年4月21日，聂耳第一次与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田汉会面。当时的两人也许不会想到，彼此的合作会成就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作品。相近的革命理想与艺术理念很快让两人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成为了忘年之交。与此同时，明月歌剧社在南京、武汉等地的公演由于

① 昆明文史研究馆编：《聂耳——从昆明走向世界》，第211页。

② 《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上卷），第256页。

③ 《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中卷），第392页。

不能反映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和表演不够纯熟等原因失败了。因此,聂耳更加积极地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各种活动,他的革命音乐理念与黎锦晖的平民音乐理念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聂耳开始用“黑天使”等笔名在各大报纸杂志上发表一系列评论文章,主张艺术应该服务于人民大众的革命和救亡事业。7月22日,他发表在《电影艺术》第3期上的《中国歌舞短论》一文,将矛头直指黎锦晖,批评其在民族生死存亡紧要关头仍然坚持“为歌舞而歌舞”的理念,尤其是为了经济收益而迎合市民阶层的低级趣味。^①由于文中部分言辞比较激烈,这篇文章最终导致聂耳与黎锦晖师徒关系决裂,也让聂耳被明月歌剧社大多数成员孤立。8月5日,明月歌剧社召开全体会议;8月7日,聂耳乘船离开上海前往北平;8月10日,明月歌剧社在《上海时报》刊登启事,声明聂耳已经“因故退出本社”。^②

(二) 在共产党的影响下走上人民音乐创作的高峰

1932年8月11日,聂耳到达北平,住进云南会馆。通过省立师范同学张天虚,聂耳又结识了陆万美、许可、于伶等中共党员和左翼艺术家。在北平,聂耳同样积极投身左翼文化运动,观看了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组织演出的《血衣》《战友》《九一八》等进步剧目,积极参与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的组建。10月28日,他还在清华大学毕业同学会组织的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的晚会上用小提琴演奏了《国际歌》。^③

9月,聂耳报考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可惜未被录取。不久之后,他从朋友来信中得知联华影业公司有意请他回去工作,于是马上向党组织汇报了准备返回上海的事。此时,中共正准备与国民党当局争夺电影这块新兴的文化阵地,刚刚在瞿秋白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电影党小组,正设法派一些左翼剧联成员到各大电影公司。北平的党组织马上批准了聂耳的请求,并请他将三份材料转交上海党组织。

11月8日,聂耳结束了短暂的北平生活,返回上海。回到上海后,他马上找到党组织,向夏衍转交了三份材料。12月26日,聂耳到联华影业公司一厂工作,据他的日记记录,他最初从事的是剧务工作。这一时期,聂耳与夏衍、田汉等中共党员及任光、安娥等左翼音乐家积极联络,研究讨论发展大众化音乐和成立音乐研究会的事。

根据赵铭彝、夏衍等当事人回忆,1933年初,经赵铭彝、田汉介绍,聂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仪式是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的一个摄影棚举行的,当时的条件比较简陋,因为没有现成的党旗,只能临时在纸上画一面。^④出于安全和保密方面的考虑,聂耳本人并未在日记中留下任何相关记录,使得后人无从了解他当时的心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入党以后,聂耳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以更加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到音乐创作中,为我们留下了数十首经典的音乐作品,也为中国音乐开创了一个属于无产阶级与革命群众的新时代。

1933年,聂耳创作了《开矿歌》《饥寒交迫》和《卖报歌》,这是他最早公开发表的三部音乐作品。到1934年,他的创作开始井喷,短短一年内创作了19首歌曲,其中不乏《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码头工人》和《毕业歌》这样的传世名曲。

除了忘我地进行音乐创作,聂耳也没有减少参与革命活动的次数。1933年,在中共党组织的指导帮助下,上海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先后成立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

① 《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中卷),第54页。

② 昆明文史研究馆编:《聂耳——从昆明走向世界》,第215页。

③ 《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中卷),第510页。

④ 昆明文史研究馆编:《聂耳——从昆明走向世界》,第225页。

和“苏联之友社”等组织，聂耳都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职务。此外，聂耳还经常通过具有工会性质的联华影业公司同人会，带领同事与资方势力进行斗争，旗帜鲜明地反对其反动的制片方针。由于这些斗争活动，聂耳成了联华影业资方的眼中钉，终于在1934年1月找借口将他解雇。4月，在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安排下，聂耳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负责录音和作曲。^①

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通过大量的艺术创作实践活动和革命斗争的洗礼，作为青年革命者和作曲家的聂耳快速成长起来，创作了大量为劳苦大众呐喊的音乐作品，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人民音乐家，为他的最高杰作《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音乐基础。

三、为国而歌、为民族呐喊

1934年，聂耳的音乐生涯迎来高潮，在作品数量井喷的同时，其革命性和艺术性也达到了新的高度。然而天妒英才，正当音乐创作渐入佳境，准备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时，聂耳却在异国海滨意外亡故，年仅23岁的生命戛然而止。然而，正是在人生的最后一年，聂耳完成了个人生涯乃至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作品。

（一）聂耳短暂人生的音乐创作巅峰

1934年春，为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协助左翼文艺工作者成立了上海电通影片公司，田汉、夏衍、许幸之等地下党员在公司担任要职，聂耳也为公司创作歌曲。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毕业歌》，是电通公司第一部影片《桃李劫》的主题歌，其很快就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歌曲。

同年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侵略活动的加剧，田汉创作出了《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这是一个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受到革命思想影响，从个人的艺术世界走向民族救亡战场的故事。这个故事由夏衍写成电影剧本，于1935年1月开机拍摄。写完故事梗概后，田汉马上着手创作电影片尾曲，而聂耳在听到消息后马上主动要求承担谱曲的工作。这首歌曲，就是今天每个中国人心中神圣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过程充满波折。田汉刚写出第一段歌词，就于1935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了。聂耳和《电通》画报的主编孙毅师对歌词进行了一些修改，其中“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就是这次改动的结果。由于工作繁忙，聂耳大约到3月才正式开始《义勇军进行曲》的谱曲工作，但他刚完成初稿，就在4月1日得知国民党当局要逮捕他的消息。^②

为了保护聂耳，同时满足他本人出国学习深造的愿望，党组织决定安排他尽快出国。4月15日，聂耳带着还没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匆匆登上了日本邮船“长崎丸”号。

由于没有留下可靠的文字记录，相关当事人在多年后的回忆中也有相互矛盾之处，聂耳完成《义勇军进行曲》曲谱的确切时间已难以考证。结合司徒慧敏、孙瑜等当事人的回忆和百代唱片公司的记录，《义勇军进行曲》曲谱的定稿应该是在4月底从日本寄回上海，于5月3日由电通公司合唱队在百代公司录音棚内演唱录音的。^③也就是说，聂耳是在到达日本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曲谱定稿。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义勇军进行曲》唱响上海滩。不到两个月后的

① 昆明文史研究馆编：《聂耳——从昆明走向世界》，第227页。

② 《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中卷），第563页。

③ 向延生：《影片〈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下卷），第414—424页。

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鹄沼海滨意外溺亡,《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他的人生绝唱。

聂耳逝世后,《义勇军进行曲》继续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传唱。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响应号召的中国文艺界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防音乐”的前奏。1936年6月7日,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出现了数千民众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的盛况。

抗战全面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了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战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在各条战线的抗日斗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更是走向国门,走向世界——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演唱了这首歌曲,美英法印等国的广播电台经常播放该曲,以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好莱坞电影《龙种》也选择这首歌作为插曲。^①

抗战胜利后,《义勇军进行曲》又超越了抗日救亡的主题,成为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不屈不挠、英勇斗争、奋勇前进的爱国精神的象征,最终在632件国歌方案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二) 聂耳的战斗青春在音乐和人民中不朽

聂耳于1935年4月15日登上日本邮船“长崎丸”号离开上海,16日经停长崎,17日下午到达神户后乘电车前往大阪,当晚10点又乘坐火车,最终于18日上午8点抵达东京。聂耳坚持记日记的习惯,让我们得以一窥这趟短暂的旅程的大致情况。^②

根据相关人士的回忆,按照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聂耳原本是计划经由日本前往直、法、德等国,最后到达苏联,一路上学习和创作。根据日记的记录,虽然日本只是此次行程的第一站,但聂耳在赴日之前还是制订了四个“三月计划”——第一个“三月计划”的重点是提高日语水平,第二个“三月计划”主要是提高阅读能力和音乐技能,第三个“三月计划”是开始翻译和创作,第四个“三月计划”主要是学习俄语准备赴欧。

聂耳到达日本后,马上就按照计划分秒必争地开始学习。他18日上午8点到东京后,顾不上舟车劳顿,马上到东亚日语补习学校听了两个小时的课。之后,他每天的日程表都安排得很满,除了听日语课、练小提琴等日常学习活动,还要广泛与日本文化界的进步人士联谊交友,大量观摩电影、音乐、话剧、舞蹈等艺术作品,学习吸收其中的优秀元素。由于太过繁忙,他甚至中断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只能不定期补记近期发生的重要事情。4月到7月,日记的篇目很少,但文中日语词汇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说明这期间聂耳的日语水平稳步提升,掌握的词汇量越来越多。

到了7月份,日语学校开始放暑假,聂耳的第一个“三月计划”基本提前完成。在东京紧张的学习生活暂时告一段落,他准备前往离东京不远的藤泽来一次短期旅行。7月8日之后,他又恢复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而且日记内容也很翔实。

7月9日,聂耳与在日本认识的朝鲜籍好友李相南等人一同乘车前往藤泽,并借宿在李的同事滨田实弘的姐姐家。因着热情外向的性格,聂耳很快就和滨田一家熟络起来。之后几天,他在朋友们的陪伴下游览了江之岛等藤泽周边的风景名胜,还到片濑和鹄沼海滨浴场去游泳,为大家演奏小提琴,与收藏有很多唱片的滨田实弘聊音乐,同时用有限的时间阅读日文报纸杂志以强化日语学习。

即使是在这样轻松愉快的时刻,聂耳仍然不忘反思和自省。7月16日是原定的第一个“三月计划”结束的日子,他在日记中回顾了过去的三个月的学习生活,在看到日语能力的进步之外,也

^① 向延生:《美国影片〈龙种〉与〈义勇军进行曲〉》,《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下卷),第310—311页。

^② 《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中卷),第569页。

检讨了小提琴练习不足、整整三个月没碰钢琴、没进行作曲等。他告诫自己要牢记来日本的原因，从第二天开始加倍努力读书和练琴。^①

未曾想，这篇日记竟然成了聂耳的绝笔。第二天，年仅23岁的聂耳与李相南、滨田秀子、松崎厚等友人结伴在鹄沼海滨浴场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留下了未能完成的旅欧计划和不能继续用音乐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无限遗憾。

由于聂耳入境日本时未办理正式手续，中华民国领事馆拒绝了张天虚等中国留学生提出的由领事馆全权处理善后事宜的要求，在藤泽警方给出验尸报告后，当地火葬场火化了聂耳的遗体。因为这一稍显草率的善后处理方式，再加上当时已非常紧张的中日关系，聂耳被日本特务暗杀的阴谋论从那时候开始流传至今。然而，根据滨田实弘第一时间向聂耳朋友张天虚提交的报告和当时在现场的松崎厚的回忆，以及聂耳日记中关于几年内多次头部受伤导致昏迷的记录，再结合当时聂耳在日本还默默无闻的事实，向延生、崎松等研究聂耳的知名学者倾向于认为聂耳的死的确实只是意外。^②

聂耳去世后，他的中日两国朋友首先悼念了这位热情友善的年轻人。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国各地唱响，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位英年早逝的人民音乐家。吕骥、夏衍、田汉、郭沫若等长期活跃在文艺战线的中共党员都高度评价了聂耳的革命精神和创作成就，肯定了他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聂耳去世次日，日本《朝日新闻》社会版刊登了一条短讯，通报了“民国学生聂守信”溺水身亡的消息，但其中的住址等信息有误，也未提及其作曲家的身份，可见当时日本社会对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完全不了解。5个月后的12月21日，日本进步剧作家秋田雨雀在《朝日新闻》上发表文章，第一次向日本人介绍了聂耳的生平和音乐成就。^③1954年，藤泽当地的友好人士在聂耳溺亡的鹄沼海滨自发建造了“聂耳纪念碑”，并将7月17日定为当地的纪念日，藤泽与昆明也因聂耳的因缘而在1981年缔结为友好城市。聂耳作为最著名的抗日歌曲的曲作者，得到了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尊敬和纪念。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聂耳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化为了一曲曲慷慨激昂的乐章，这些鼓舞劳苦大众精神、激励中国人民斗志的不朽作品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披荆斩棘、奋勇争先。聂耳本人在逆境中努力学习、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有他热情开朗、待人友善的宝贵品质也将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在新时代的今天，当我们再度回顾聂耳革命和创作的短暂一生时，应当从中汲取精神力量，继承和发扬他为国而歌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在逆境中不惧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他为劳苦大众呐喊的人民音乐家情怀，学习他惜时如金、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的良好作风，尽己所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中卷），第585页。

^② 关于聂耳死因的研究，参见向延生：《聂耳死因的调查及郭沫若的墓碑文》，《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下卷），第456—459页；崎松：《聂耳在藤泽遇难的死因探析》，《聂耳与日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3—254页。

^③ [日] 齐藤孝治：《聂耳——闪光的生涯》，庄丽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第232—234页。

历史与文化

滇菜菜名英译助力滇菜文化对外传播

王 齐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近年来,滇菜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而滇菜文化翻译研究却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在我国饮食文化体系中,菜名不只是一个名字这么简单,其不仅概括了菜肴的风味、烹调手法、原材料等特征,往往还折射着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质。在滇菜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处理好滇菜菜名的英译,相当于把握住了滇菜文化对外传播的关键。美国作家乔治娅·弗莱德曼(Georgia Freedman)所著的《彩云之南的烹饪:源于云南的菜谱和故事》一书,给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带去地道的表达和解释。本文基于交际翻译理论视角分析该书中提及的滇菜菜名译文,讨论其所采取的翻译方法,以期为滇菜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参考。

关键词:滇菜文化对外传播;滇菜菜名英译;交际翻译理论;乔治娅·弗莱德曼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0)03-0096-07

古往今来出入红土高原的异乡人,只需和滇菜来一次普通的邂逅,便与滇菜结下不解之缘,谱写了一段又一段美食佳话。南明永历帝一句“救了朕的大驾”,令滇西饵块誉满天下三百余年而不衰;“饮和食德”是革命家孙中山一生之中唯一一次给食品题词,成为了宣威火腿驰名神州乃至蜚声国际的序曲^①;沈从文、汪曾祺等一干西南联大师生终生对云南味道念念不忘并大书特书^②。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美国美食作家乔治娅·弗莱德曼^③(Georgia Freedman)自千禧年夏在昆明第一次与云南美食邂逅之后,一口“滇味”让她难以忘怀。2011年春,她和丈夫终于决定辞职到云南旅居两年,以了解云南饮食文化和风俗,探索云南的风物。历时多年,她写成了《彩云之南的烹饪:源于云南的菜谱和故事》(*Cooking South of the Clouds: Recipes and Stories from China's Yunnan Province*)^④—

作者简介:王齐,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文化翻译。

① 王人天:《浦在廷与宣威火腿》,《云南档案》2014年第4期,第40—41页。

② 罗嘉:《解密滇菜的民族密码》,《今日民族》2019年第6期,第2页。

③ 乔治娅·弗莱德曼,记者兼自由撰稿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供稿于《华盛顿周刊》,《饮食艺术》(*The Art of Eating*),*Imbibe*,*Roads and Kingdom*等杂志。自2000年以来,她多次到访中国,了解中国的美食,学习中国文化。2000年夏,在昆明第一次与云南美食邂逅之后,云南的风土人情让她难以忘怀。2011年春,她和丈夫决定辞职到在云南旅居两年,探索云南的风物,了解云南饮食文化和风俗。(参见网址:<http://georgiafreedman.com/about>)

④ 目前,市面上由外国作者所著的有关云南菜的著作不多,《彩云之南的烹饪:源于云南的菜谱和故事》(*Cooking South of the Clouds: Recipes and Stories from China's Yunnan Province*)是一本介绍云南饮食文化的外文丛书,发行于2018年,在当年先后被《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旧金山纪事报》等西方主流杂志评为2018年年度最佳美食类丛书。(参见网址:<http://chinasouthoftheclouds.com>)

书。乔治娅·弗莱德曼未必深刻研究过翻译理论，但是作为一名英语作家，她用晓畅的行文把云南美食介绍给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以文字再现彩云之南的味蕾诱惑。

本文从彼得·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视角入手，分析《彩云之南的烹饪：源于云南的菜谱和故事》一书中提及的云南菜菜名相关译文，讨论书中所采取的翻译方法，进而探讨如何更好地指导滇菜菜名英译，以期为今后更多云南菜外宣作品提供参考借鉴，为滇菜文化传播尽绵薄之力。

一、滇菜发展现状简述

滇菜虽然不在中国八大菜系之列，但因由多民族饮食文化交融共同酝酿而有着别样风情。由于云南境内不同区域间山川相隔，各有不同的自然风物和民族聚落，所以滇菜的区域性饮食文化派系分支非常明显。方铁在《云南饮食文化和云南历史发展》一文中基于云南省内民族分布、历史发展的影响、区域性动植物资源、区域性气候、地理交通的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将云南的区域性饮食文化分为七个区域：以昆明、楚雄、玉溪为中心的滇中区；以大理为中心的滇西区；以宣威为中心的滇东北区；以丽江、中甸（香格里拉）为中心的滇西北区；以保山为中心的滇西南区；以德宏、西双版纳为中心的滇南区；以红河、文山为中心的滇东南区。^①

乔治娅·弗莱德曼也在游历云南各地的过程中，意识到云南菜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比如滇南傣味、滇北迪庆藏餐和滇中菜式完全不同，滇西的大理白族菜肴又和云南东北部深受川味影响的宣威菜肴截然不同。因此为了更好地将滇菜介绍到西方社会，她在《彩云之南的烹饪：源于云南的菜谱和故事》一书中将滇菜的区域菜系分为滇中区、滇北区、滇南区、滇东区、滇西区等五个区域。^② 这里暂不讨论谁的分区更加科学，可以确定的是滇菜的特色鲜明，包容各种区域性饮食流派，这也是滇菜区别于其他菜系的最显著特点。

近年来，人们不断对滇菜进行创新，努力摸索滇菜的独特气质，目前餐饮业界已经涌现出不少新派滇菜。其中在全国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餐饮连锁，当属红遍京沪的云海肴。云海肴凭借“云南”这个大“IP”（Intellectual Property）和多年的潜心经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新派滇菜的风潮，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将云南丰富的新鲜食材和多元饮食文化带到了全国各地。在全国各地快速开店步伐中，云海肴也顺势将眼光放到海外，在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和南洋理工大学附近开设了两家分店，受到新加坡消费者的热捧。

除此之外，近年来美食纪录片也开始钟情于滇菜。陈晓卿导演用镜头深入云南腹地，探寻云南菜的特质，记录凝结着云南人民勤劳与智慧的地方风味。他的纪录片《风味原产地·云南》将云南菜的喃撇、撒撇、饵块饵丝、乳扇、酸水果等推介到观众面前，让观众隔着屏幕领略彩云之南的滋味。值得一提的是，该纪录片还被美国流媒体巨头 Netflix 收购了海外版权，可谓实现滇菜文化“出海”的绝佳范本。还有国内著名视频博主滇西小哥，在国内各大网络媒体和海外媒体平台 YouTube 上推荐滇菜。尽管滇西小哥在 YouTube 上的视频字幕大部分都是由谷歌翻译自动生成的，但是仍不妨碍她在海外狂吸五百多万粉丝，这一方面说明了各国人民都对中式田园生活充满向往，另一方面也证明地道云南菜的魅力确实征服了世界各地的网友。

虽然滇菜在国内的受关注程度处在上升阶段，但是要打响滇菜的牌子，打破人们对于滇菜只有米线、饵块的偏见，仍需对滇菜体系中各具特色的区域性菜系进行整合，拿出具有一定文化内

^① 方铁：《云南饮食文化与云南历史发展》，《饮食文化研究》2007年第3期，第41—42页。

^② Georgia Freedman, *Cooking South of the Clouds: Recipes and Stories from China's Yunnan Province*, London: Kyle Books, 2018, P. 2.

核和浓烈地方特色的产品,让业界涌现更多知名的滇菜品牌,也让云南饮食文化走出边疆为更多人所品味。

同时,要实现滇菜顺利“出海”还需要更多正确且诱人的推广,尤其要注重对滇菜的译介。

二、滇菜菜名英译的必要性

对于中式菜肴来说,菜名往往囊括了菜肴的烹饪过程,或者风味,或者外观等特征,好的菜名是让菜肴格调得到升华的点睛之笔。同理,在滇菜这个菜系中,菜名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在饮食文化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如何使滇菜菜肴的名字恰当地传递到外国友人耳中,使菜名翻译助力滇菜文化“走出去”,让滇菜文化得以扩大影响力的“版图”,是值得我们翻译工作者加以深思的问题。

当前的滇菜菜名翻译仍然面临良莠不齐的困境,英文译名要么让人不知所云,要么没有顾及英语国家的饮食文化风俗,所译菜名让外国友人难以接受,等等。除此之外,很多译界同行认为翻译菜名需要兼顾传达“中国特色文化”。该提法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在实际翻译操作中,由于在译入语中找不到对应的文化负载词,结果还是生硬地保留了部分中式文化负载词,这种译名往往使得译文读者更加不知所云,往往需要花费时间解释该文化负载词,给交际过程徒增难度。

因此,笔者认为参考母语使用者(native speaker)笔下对中国菜肴的描写就很有必要。一方面,能帮助我们译者熟悉英语国家的友人是如何看待中国饮食文化的,了解他们能接受的限度。另一方面,能让译者了解怎样的翻译才能“有效”,即让所译菜名在英语国家读者看来符合他们文化中的菜肴命名特点。

然而,学术界目前对于滇菜菜名翻译不甚重视,比起以川菜和粤菜翻译为主题的论文数量,以滇菜翻译为主题的文章着实稀少。目前能检索到的讨论云南菜菜名翻译的文章,数量不多,一共四篇,笔者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大而全的概括类,一篇是字庆锋的《基于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滇菜英译策略》^①,另一篇是王彤峻和贾晓庆的《从语用等值角度看云南菜菜名翻译》^②。以上两篇文章都较为系统地探讨了当今滇菜翻译的难点,阐发了他们各自秉持的翻译方法,并给出一些翻译实例。第二类侧重云南菜中的民族菜的英译,一篇是侯丽香和王志雄的《从“文化传播”视角看云南民族菜名的英文翻译》^③,另一篇是何芳的《文化翻译视域中的云南民族菜名英译研究》^④。这两篇文章都从一定的理论角度切入,把焦点落在带有民族特色的云南菜菜名英译方法总结上,并得出一定结论。

从交际翻译视角来解读滇菜菜名翻译是可行的。所谓“交际翻译”,指的是力求目标文本产生的效果接近源文本的翻译。交际翻译首先忠于目标语和目标文本读者,源语服从目标语言和文化,不给读者留下任何疑点与晦涩难懂之处。^⑤既然目标语在交际翻译中起指向性作用,那么在翻译中注意借鉴母语为目标语的作者所著的文本不失为一种有效办法,这也是本文逻辑思路的关键所在。

① 字庆锋:《基于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滇菜英译策略》,《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年第12期,第165页。

② 王彤峻、贾晓庆:《从语用等值角度看云南菜菜名翻译》,《英语广场》2016年第2期,第26—27页。

③ 侯丽香、王志雄:《从“文化传播”视角看云南民族菜名的英文翻译》,《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12期,第112页。

④ 何芳:《文化翻译视域中的云南民族菜名英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师范大学,2009年,第40—48页。

⑤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2页。

三、滇菜的命名特点

从语言构成特色角度来说，滇菜命名方式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是写实型菜名。所谓写实就是用简练的语言，不加渲染地给菜肴命名，菜名着重突出菜肴的原料、发源地、烹饪方法和器皿等信息，使人一看便了解菜肴的构成和特色。突出原料的菜名，如：油焖牛肝菌、菠萝饭、豆花米线、豆面汤圆；按发源地命名类，如沾益辣子鸡、曲靖韭菜花、宣威火腿；按烹饪方法和器具命名类，如舂牛干巴、包烧罗非鱼、汽锅鸡、竹筒饭、小锅米线。

二是典故型菜名。滇菜中根据历史典故或街头传说来命名的菜肴很多，可以营造一种古朴典雅的饮食氛围。如“大救驾”的典故。传说清初吴三桂率清军打进昆明，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逃往滇西，清军紧追不舍。农民起义军领袖李定国命大将靳统武护送永历皇帝至腾冲，当时天色已晚，一行人走了一天山路，疲惫不堪，饥饿难耐，找到一百姓家歇脚，主人做了一道把饵块、火腿、鸡蛋、青菜炒在一起的菜。永历皇帝吃后赞不绝口，仰天长叹：“此乃救了朕的大驾。”这便是腾冲炒饵块封号为“大救驾”的由来。从此以后，腾冲饵块身价倍增，更以“大救驾”的美名闻名于世。^①

又如“过桥米线”。相传，清朝时滇南蒙自县城南有一湖，名曰南湖，湖心有一小岛，县城内有一姓杨的秀才到岛上刻苦读书，秀才贤慧勤劳的娘子每日坚持为他送饭，但等她赶到岛上时，饭菜已不热了。后来偶然有一次送鸡汤的时候，秀才娘子发现鸡汤上那层厚厚的鸡油有如锅盖一样，可以为鸡汤保温，若把配菜和米线等放入鸡汤，便能达到“无火烹饪”的效果。后来，她用肥鸡、筒子骨等煮好鲜汤，上覆厚厚鸡油；米线在家烫好，将配料切成薄片，带到岛上后余入滚烫的鸡汤之中，而后再加入米线，口感鲜香滑爽。杨姓秀才被妻子的良苦用心感动，刻苦攻读，终于金榜题名。此法一经传开，人们纷纷仿效。因为这位贤妻送米线到岛上时要过一座桥，为了纪念她，后世就把这种米线吃法叫作“过桥米线”。^②

三是民族特色型菜名。在少数民族云集、民俗文化浓郁的云南地区，菜名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反映独特的民族风情，如景颇鬼鸡、白族吹肝、傣家烤鸡、傣族手抓饭，等等。

四是音译型菜名。由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融合境内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饮食文化之外，云南人民还吸收了不少东南亚饮食文化，因此直接把少数民族语言或东南亚语言菜名音译过来的情况在云南菜中也很常见。如“撒撇”（傣语，凉拌米线）、馍尼亚布绕（佤语，鸡肉烂饭）、泡鲁达（缅甸，一种源于缅甸的特色饮品）。

四、滇菜菜名翻译策略

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认为交际翻译首先要忠实于目标语和目标文本读者，也就是说，要求源语服从目标语言和文化，要让目标语文本所产生的效果接近源文本。^③ 由于地域差异、文化差异，部分滇菜菜品所用食材之独特、烹饪方法之奇特，在西方社会难以找到同样的原材料或者烹饪器具，因此在《彩云之南的烹饪：源于云南的菜谱和故事》一书中，对于部分滇菜，乔治娅·弗莱德曼不得不用西式烹饪技法代替传统滇菜烹饪方法，用部分西方常见食材替代传统滇菜食材等，以便西方读者能理解滇菜的做法，帮助西方读者在厨房里“还原”云南的风味。乔治

① 许联超：《腾冲美食“大救驾”》，《粮油市场报》2017年3月23日，第A04版。

② 丁生：《云南蒙自过桥米线的文化蕴涵》，《商业文化》2010年第4期，第184页。

③ 高华丽：《中外翻译简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9页。

娅·弗莱德曼这些“下意识”的写作行为，恰好体现了以目标语言和文化为中心的思路，这无疑遵循了交际翻译的理论准则。由此笔者基于交际翻译理论视角分析该书中提及的云南菜菜名相关译文，讨论书中所采取的翻译方法，以期为今后更多云南菜外宣作品提供参考借鉴。笔者按上文所划分的滇菜命名的类别——写实型、典故型、民族特色型和音译型，从《彩云之南的烹饪：源于云南的菜谱和故事》中所记载的102道菜谱中节选具有代表性的英译菜名，分析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后，发现书中主要采取直译法和意译法两种翻译方法，也偶尔使用音译法进行翻译。

（一）直译法

根据纽马克的观点，交际翻译要求通顺、简朴、清晰、直接、合乎习惯，并倾向于欠额翻译。同样在跨文化交际中，简洁、清晰、合乎目的语习惯的直译是最为常见的方法。^①云南菜中大多数写实型菜名（突出原料类，按发源地命名类，按烹饪方法和器具类命名），由于含义相对明确，人们从菜名就足以了解大部分信息，故该书中大部分写实型菜名适用直译法。

1. 突出原料类菜名。这类菜肴的原料构成比较简单，烹饪手法也比较常见，采用直译足以应对。比如，炒灰树花（Maitake Mushrooms with Dried Chilies）、酸笋炒牛肉（Beef with Pickled Bamboo shoot）、牛肉炒薄荷（Stir - Fried Beef with Mint）、蕨菜炒蚕豆（Stir - Fried Fern Shoots and Broad Beans）、炒南瓜花（Simple Stir - Fried Courgette Flowers）等。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乔治娅·弗莱德曼在英译滇菜菜名过程中，尽量突出菜肴本身的原料构成和原料本味，有限度地省略常见的烹饪方法，翻译过程中往往以食材主料和重要辅料为中心词，将滇菜的烹饪手法或者滋味作为修饰成分，以保证菜名的简洁通顺。

2. 按发源地命名类菜名。给菜名挂上发源地的标签是中国菜肴命名的常见模式，滇菜当然也不例外。翻译这类菜名时，同样适用简洁明了的直译法，但为了服务一些缺乏云南背景知识的西方读者，有时不得不采取欠额翻译的标准，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彩云之南的烹饪：源于云南的菜谱和故事》一书中涉及的带有发源地标签的菜名，有些是滇菜菜名中本来就有的，乔治娅·弗莱德曼在英译时予以保留或稍作调整。例如，沾益辣子鸡（Zhanyi Chili Chicken）、芒市凉粉（Mangshi - Style Cold Pea Curd Salad）、丽江粑粑（Lijiang “Baba” Filled Flatbread）、永平黄焖鸡（Dali - Style Yellow Stewed Chicken）、坝包杂酱米线（Babao - style Breakfast Noodles）、维西凉拌黄瓜（Northern - Style Cucumbers with Vinegar and Chill）。而有的菜名原本没有体现发源地，为了加深读者对于菜肴地域特色的感知，乔治娅·弗莱德曼在翻译时特地加上了地域标签。比如，锅贴乳饼（Yunnan Grilled Cheese Slices with Ham）、大救驾（Yunnan Rice Cakes Stir - Fried With Ham and Chives）。

无论是在译入语中保留菜肴发源地作为菜肴的标签，还是在翻译过程中给在源语语境中没有发源地标签的菜名加入发源地标签，都是为了服务于“交际”这个目的。当然这也使得交际翻译指导下的译文显得相对冗长，因为增添了辅助译入语读者理解的词汇。^②

3. 含有烹饪方法和器皿类菜名。烹饪的手法和器皿对菜肴的味道有很大影响，同样也对菜肴的命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多民族和谐共生的云南，菜肴的烹饪方式更是独具特色，相关统计表明，滇菜除了有煎、炸、蒸、煮、炒、烙等全国各地常见的烹饪技艺之外，还有着爨（cuan，将食物直接置于木炭上烧，如景颇族的“火烧鳝鱼”）、炮、焐（wu，将食物埋在炭灰中，利用柴火余热使食物变熟，如基诺族的“灰焐猪尾巴”）、舂（chong，将食物放入竹木制成的筒臼之中

①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第213页。

② 高华丽：《中外翻译简史》，第289页。

捣碎，如傣族的“舂鸡脚”)、捶(将食物置于案板上用木槌敲打松软，如傣族的“手捶干巴”)、筒炙(以竹筒等作为炊具，将食物放入其中用火烧烤至熟，如傣族的“香竹饭”)、石炙(将食物置于烧至高温的石板石块上面炙熟，如独龙族的“石板粑粑”)等古老烹饪方法。^①

由于烹饪手法的独特性和器皿的不可替代性，部分滇菜只有在云南才能做出来。乔治娅·弗莱德曼深知这是滇菜的独特之处，因此她在书中也频繁提及这类菜名，并采用直译加释义的方法来体现这类滇菜的特色。比如，包烧鸡(Chicken Grilled in Banana Leaf)、包烧蔬菜(Vegetables Grilled in Banana Leaf)、丝瓜尖汤(Boiled Squash Green)、酸笋炖牛肉(Stewed Beef and Bamboo Shoots with Fresh Mints)。其中“包烧”指的是将食物包在芭蕉叶里烧制的烹饪方法，“Grilled in Banana leaf”这一翻译恰到好处地概括了“包烧”的烹饪特征。再如乔治娅·弗莱德曼在书中提到了两道采用舂制方法制作的菜肴——佤族舂牛干巴(Wa-style Pounded Gan Ba)和舂茄子(Mashed Aubergine with Herbs and Chilies)，所谓“舂制”指的是将食物和调味料放在研钵里捣碎后食用，这是一种云南地区独特的烹饪手法，“pounded”和“mashed”皆是对于“舂”这一动作的解释性表达，选词的差异则在于成果的形状差异，对于糊状的“舂茄子”用“mashed”，而条状固体的“舂牛干巴”则采用“punched”来表达。

此外，对于菜名中突出烹饪器皿的菜肴，乔治娅·弗莱德曼在翻译时也对这类菜名的特色加以保留，并加上菜品主要原料，也就是把烹饪技法作为修饰成分，食材原料作为中心词。比如，汽锅鸡(Steam Pot Chicken with Ginger and Goji Berries)、小锅米线(Clay Pot Noodle soup)。

(二) 意译法

交际翻译理论提出了“以目标语和目标文本读者为核心”的标准，为达到这一标准，纽马克又提出检验“目标文本”的好坏，须看译者是否理解原作，对源文本内容所抱的态度，是否保留了源文本的笔调风格，以及目标文本是否行文自然。笔者结合这一检验标准，遍检《彩云之南的烹饪：源于云南的菜谱和故事》中针对滇菜中的典故型、民族特色型和音译型菜名的翻译方法后发现，乔治娅·弗莱德曼在翻译这几类菜名时，多采用意译法，有时配以背景解释来达到“以目标语和目标文本读者为核心”的交际翻译标准。

1. 典故型菜名。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发源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凝聚着人民的智慧，带有浓烈的人文特征和时代烙印。滇菜文化深深植根于云南红土地，凝结着云南各族人民的集体智慧，“过桥米线”“大救驾”“老奶洋芋”等滇菜菜名中还蕴藏着历史典故或有趣传说。对于这类菜名，乔治娅·弗莱德曼英译时在注意保留滇菜菜名本身结构的同时，为了使得菜名翻译更“达意”(符合目标文本读者阅读习惯)，大都采取意译的模式来翻译，并在食谱中对菜名背后的历史故事和传说作必要解释。如大救驾(Yunnan Rice Cakes Stir-Fried With Ham and Chives)，这个翻译可以看出她倾向于译出目标语读者“易懂”的文字，因而在英译菜名中删繁就简，将源文本中的文化要素弱化，而在菜谱中对源语言文化背景加以补充说明。

乔治娅·弗莱德曼翻译这类蕴含典故和文化内涵的滇菜菜名时使用的方法与国内学者刘清波所著的《中式菜名英译的技巧和原则》一文中所提及的“避虚就实原则”不谋而合。“避虚就实原则”指的是当遇到有些菜名通过比喻、联想的方式融合了动植物名称、自然景物甚至成语典故时，选择抓住菜肴的实名(菜肴的主料、烹饪方法、口味)来翻译，省去高雅的联想或者形象的比喻。^②

① 罗嘉：《解密滇菜的民族密码》，第10页。

② 刘清波：《中式菜名英译的技巧和原则》，《中国科技翻译》2003年第4期，第53页。

2. 民族特色型菜名。云南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在26个民族的世代交往过程中,孕育了滇菜的民族特色,在处理这类菜名翻译时,乔治娅·弗莱德曼很重视菜名中的民族特点,并力求保留这份独特的民族标签。例如,景颇鬼鸡(Jingpo Ghost Chicken)、傣味柠檬撒撇(Dai-style Lime and Rice Noodle Salad)、特色树番茄喃撇(Raw Vegetables with Charred Tomato-chili Sauce)、傣味柠檬春干巴(Dai Dried Beef Salad with Fennel and Chilies)、傣味烤鸡(Dai Grilled Chicken with Herbs)、川芎汤(Carrot-top Soup)。民族特色烹饪方式,民族特色口味,都必须得让“目标语文本”读者一目了然,这也就是为何乔治娅·弗莱德曼采取简化意译的原因。

(三) 音译法

由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云南与缅甸、老挝和越南三国接壤,在饮食文化上难免也会带有东南亚的异域风情,因此有些菜名翻译为了保存异域风情,音译就成为一种重要方法。比如,泡鲁达(Bubble Ruda)。泡鲁达一词本身就是缅甸语音译而来,这对翻译的拿捏更是考验,乔治娅·弗莱德曼通过对该甜品实质的理解,创造性地采用逐字对应形式进行翻译,故有“Bubble Ruda”一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部分云南少数民族菜名英译难度较大,选择对这部分菜名进行“音译”也是国内翻译界所认可的,并且在跨文化交际的实践中得到了成功的反馈。比如,陈晓卿导演的纪录片佳作《风味原产地·云南》被著名流媒体平台网飞(Netflix)收购海外版权后,该片英文字幕中对于傣族风味食物喃撇(Nan Piě)和撒撇(Sa Piě)的翻译就是直接采用汉语拼音来代替,并在简介部分做出相应解释。

五、结语

乔治娅·弗莱德曼所著的滇菜译介著作——《彩云之南的烹饪:源于云南的菜谱和故事》(Cooking South of the Clouds: Recipes and Stories from China's Yunnan Province),由于作者是外国人,为了顾及英语国家读者的可接受度,加上文化背景差异巨大,介绍滇菜时难免挂一漏万。但是,该书处处充满“目标语和目标语文本读者至上”的气息,无意中实实在在地体现了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的原则。笔者分析讨论了乔治娅·弗莱德曼所翻译的云南菜菜名相关译文和她所采取的翻译方法,以期证明在纽马克交际翻译理论指导下的直译法、意译法和音译法在处理滇菜菜名翻译时的应用价值。

当然,滇菜菜名的翻译并非只有这三种方法。在交际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凡是能够体现菜名的语言特点和文化特质,又能让目标语读者容易理解的翻译方法,都值得我们尝试,这样才能为滇菜文化的国际化传播提供有力保障。

当前,滇菜文化的影响力在国内外都处于上升期,抓住滇菜体系包容各区域性饮食文化派系的特点,对云南菜进行整合,拿出具有一定文化内核和独具地方特色的产品,注重滇菜菜名的翻译,对于滇菜文化影响力扩张都有积极作用。相信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彩云之南的独特风味一定能走出边疆,让更多人为之折服。

责任编辑:朱家麟

党恕轩迁居韩城的动因分析

刘国菊 黄德海

(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 农民移民问题是推动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以党家村党姓始祖党恕轩迁居韩城的动力为切入点, 将其置于我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背景之下, 结合党家村在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变迁过程, 分析最新搜集的《党家村家谱》及相关史料, 认为党恕轩迁居韩城主要不是社会、气候、地理等外部因素导致的, 而是一种农民的主动移民行为。通过总结前人建设家园的历史动力, 可以为我国研究当代农民移民行为变迁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 党恕轩; 韩城; 气候因素; 地理因素; 农民移民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3-0103-06

一、问题的提出

党恕轩是今陕西省韩城市^①党家村的党姓始祖, 从在元至顺二年(1331年)恕轩公孤身从陕西朝邑(今陕西省大荔县朝邑镇)范家乡营西村来到韩城算起, 党家村至今已有689年的历史。元明清时期, 凭借经营山庄子, 党氏一族步入韩城望族之列^②。依靠远赴河南经商, 党氏一族又创下了“日进白银千两”的商业传奇。党家村先祖数代勇于开拓、苦心经营, 给后世子孙留下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 村中至今仍保存着123座元明清时期的古民居四合院, 它们和散落在村里的文星阁、节孝碑、泌阳堡、看家楼、祠堂、私塾、戏台、关帝庙等建筑错落有致地排列在一起, 犹如一座村落博物馆, 向人们展示着它的历史和沧桑。2003年, 党家村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第一批)名单, 获得“东方人类古代传统居住村寨的活化石”的美誉。党恕轩迁居韩城是党家村历史的重要开端, 在探究党恕轩建立党家村聚落的研究中, 笔者从生活空间入手, 以实态调查的方法为基础, 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普遍性考察, 力求较为客观地考察党恕轩移民的动机及趋向。

有关党恕轩迁居韩城原因的探讨, 对我们研究元明清时期的农民迁移行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 由于年代久远, 史料匮乏, 我们对党家村历史的研究仍留下许多空白点。在此背景下, 家谱作为人口迁移的重要史料, 对我们研究党家村历史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早在1984年,

基金项目: 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春风基金项目(2020Z99CFW050)。

作者简介: 刘国菊,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东欧历史与文化、商业史; 黄德海,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理论、健康产业与管理、医院运营与管理。

^① 元世祖忽必烈执政时期, 韩城的建制与名称曾几度变化。至元元年(1264年), 将“栎州”废为韩城县。至元二年, 又立“栎州”。至元六年, 州废为韩城县。此后, 元代韩城建制始终为韩城县([明]张士佩:《韩城县志》卷1释地, 韩城:韩城县志编纂委员会, 1985年, 第16页)。

^② 这时, 韩城有“八大家”的说法, 城里四大家, 姓氏依次为苏、牛、薛、张; 城外四方各一家, 为东丁、西杨、南胡、北党。称其为“大家”, 主要是富有。而其财富来源, 虽说没有哪一家不事稼穡, 但没有哪一家因为经营农业而富甲一方的, 八大家主要是经商发的财(党康琪:《千古韩城》, 内部资料汇编, 2019年, 第134页)。

我国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中便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挖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它不仅对开展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而且对当前某些工作也起着很大作用。”2001年,文化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再次强调,“家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它与方志、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家谱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尽管近十几年来受到了我国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但总的来说,其文献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事实上,家谱一般都详细地记载了先辈在何时由何地迁到了何地,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该家族迁移的历史。对于一些自发的、小规模、分散的移民,相关的家谱可能已是唯一的文字记载来源。即使对于那些大规模的、官方安置的、集中的移民,正史和其他史料的记载也往往失之粗略,而家谱正可补其所缺、详其所略。因此,把家谱联系起来,即可窥知古往今来人口迁徙之端倪,有利于中国移民史的研究。^①笔者在协助党家村家谱编撰委员会搜集和整理家谱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2020年最新搜集的《党家村家谱》及相关史料,将党恕轩迁居韩城的原因,置于我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总体背景之下,结合党家村在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变迁过程,来探讨党恕轩迁居韩城的动因,并试图为我们研究农民的移民行为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经验。

二、研究现状及焦点问题

“党恕轩迁居韩城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党家村党元恺先生撰写的《党族祖宗党恕轩公自朝邑迁居韩城北乡创建党家村之事实考证纪要》一文,第一次提出党恕轩“于元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因时事变乱,又逢歉年,遂弃儒逃难避乱,离乡来韩城,选择移居于安谧的韩城北乡郭庄村以东、下干谷以西、赔庙东南之泌水河北边土崖下的高坡崖,即今之小坡崖”,论述了党恕轩迁居韩城后所从事的活动,以及党恕轩创建党家村的历史过程^②。党元恺先生从比较宏观的视角考证党恕轩迁居韩城的原因,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2000年以后,聚焦于党家村历史研究的相关著作纷纷问世。党康琪指出,元至顺二年,党恕轩孑身一人由朝邑县逃荒至韩城县城北泌水河东阳湾,尔后钻窑成室,以农耕为生^③。李文英也认为,因年饥党恕轩逃离了家乡朝邑,来到了党家村北塬上^④。最新编撰的《党家村志》也有类似表述,元至顺二年,已经大旱了7年的关中地区,饥民们纷纷走上了逃难的道路。出逃的人群中,有个叫党恕轩的年轻人,他由同州府朝邑县逃到了韩城县的西庄地界,那里有一条细小的泌水河,河的北岸塬上有一座敬奉三皇五帝的白庙^⑤。黄德海则提出“播迁说”(释义:迁徙、流离),他依据史料考证,从朝邑到韩城不过120千米,中间无高山深水阻隔,再加上流民逃亡行为在当时就已经较为普遍,因此党恕轩在元末播迁司马迁故里一说当属可信^⑥。

专家学者关于党恕轩迁居韩城原因的考证给予我们许多启示,同时“移居”“播迁”“逃荒”或“避乱”等说法,也留给我们继续深入探讨的空间。正如党元恺先生续修《党家村家谱》时所述:“夫国有历史,朝代相传记载。而家亦有史,世代相传记载。”元至顺二年,农民出身的党恕

① 葛剑雄:《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6期,第3页。

② 党元恺:《党家村家谱》,手抄本,1995年,第4页。

③ 党康琪编:《党家村人说党家村》,内部出版物,陕渭新出批(1999)字第20号,2001年,第1页。

④ 李文英:《民居瑰宝——党家村》,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⑤ 陕西省韩城市西庄镇党家村志编纂委员会编:《党家村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8年,第3页。

⑥ 黄德海:《党家村的白银时代》,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第13页。

轩为何来到韩城呢？笔者将依据最新发现的《党家村家谱》及相关史料来一起探究：党恕轩的移民行为是“被动”还是“主动”？以此来考察农民选择从事农商活动的影响因素。

三、因天灾人祸被动迁徙韩城说

根据我国古代农民迁徙的规律，一般因天灾人祸造成的被动迁徙较多。1985年出版的琼斯的《欧洲的奇迹》运用了对比的方法，考察了欧洲和欧洲以外地区的四种天灾人祸：一是地理的，如地震、火山等；二是气候的，如干旱、洪涝灾害等；三是生物的，如人畜疾病等；四是社会的，如战争等^①。琼斯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探究党恕轩迁居韩城的动因提供了重要参考。笔者将结合社会历史背景、气候、地理（地震、火山）和生物（人畜疾病）等因素来展开研究。

（一）社会因素

1328年到1329年，元朝政局动荡，帝位四易其主。虽然1328年的两都之战有陕西行省军队参战，但战场不在陕西。1329年，元朝还爆发了“明文之争”，元文宗图帖睦尔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夺得皇位，但在此期间并未爆发令陕西受灾的战争。而元代瑶民起义，据统计其影响范围都是在湖南、两广、云贵一带，1330年前后也并未波及陕西^②。秃坚叛乱（1330年）、禄余反元（1331年）也都发生在云南、四川一带^③。元文宗执政后，大兴文治，建奎章阁，编修《经世大典》，为研究这一段元朝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所以上述战争皆有史料可查。可见，党恕轩在元文宗至顺二年来到韩城时，他的家乡没有发生战祸，他不是因为战争被迫迁移。因此，战争等社会因素不是党恕轩迁居韩城的决定性因素。

（二）气候因素

元泰定二年（1325年）至天历二年（1329年），关中地区发生了特大旱灾。据《元史》卷三十二《文宗本纪》记载：“陕西自泰定二年至是岁不雨，大饥，民相食。”可见，1329年以前陕西确实发生过罕见的旱灾，党恕轩迁居韩城前家住陕西朝邑，自然也会受到旱灾影响，如果因旱灾迁移，党恕轩不晚于1329年迁徙更符合史实，但他是1331年迁往韩城的。据《元史·本纪三十五·文宗四》记载，元至顺二年一月，大名魏县民曹革输粟赈陕西饥，旌其门。这是《元史》中至顺二年陕西唯一一处灾情记录，说明陕西旱灾已经大为缓解。而旱灾缓解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朝廷及时赈灾。据《元史》卷六十五《河渠志二·洪口渠》和《元史》卷三十三《文宗纪二》《文宗纪三》记载，自1329年至1330年，元政府采取了赈济、蠲免减租、祷告等救灾措施^④。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命陕西行省以盐课钞十万锭赈流民之复业者”；“罢大承（乘）天护圣寺工役。囚在狱三年疑不能决者，释之。民间拖欠官钱无可追征者，尽行蠲免。”“有陕西饥，敕有司作佛事七日”。二是旱灾后大规模降水。元至顺二年，“陕西行省言终南屯田去年大水，损禾稼四十余顷，诏蠲其租”^⑤。可见1330年陕西行省降水颇多，甚至形成局部水灾。三是朝廷实施灾后重建方案。“二月，陕西行省遣官分给复业饥民七万余口行粮。”

元文宗时期的赈灾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至顺二年八月，金州及和州频年旱灾，民饥，赈以陕西盐课钞五千锭^⑥。这表明陕西灾情已大为缓解，还能够支援金州及和州缓解灾情。据此合理推测，原因之一是陕西1329年大旱后元朝的赈灾措施行之有效，百姓得以生息。此外，陕西行省

① 马克垚、邹兆辰：《我对世界通史体系的思考——访马克垚教授》，《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2期，第23页。

② 丁海艳：《元代瑶民起义史料辑成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1年，第20页。

③ 沈乾芳：《论禄余、撒加伯领导的反元斗争》，《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84页。

④ 《元史》卷65《河渠志》2，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619页。

⑤ 《元史》卷33《文宗纪》2，第733页。

⑥ 《元史》卷35《文宗纪》4，第780页。

大旱之后部分地区有过大水，大规模干旱持续时间不长，陕西行省能够重新在朝廷支持下恢复民间农业生产。因此，通过史料分析，“逃荒”不是党恕轩迁居韩城的主要原因。

为深入考察气候因素对移居的影响，笔者查阅了《党族祖宗原籍家谱考察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记载，党籍祖宗本籍山西永济县陈村，远代裔孙党利南宋初年来到陕西朝邑。党利先在黄河滩租地耕种，而后经商贩盐，生意兴隆，遂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在陕西朝邑营田庄（今营南村）落户，后迁营西村。党利系党恕轩之太高祖，至轩辈已第六世^①。党恕轩的父亲党焕（字慎贞），育有七子：长子三立无嗣；次子三为，迁河南陕州会兴镇；三子三变居营南村；四子三泰，守营西村祖居；五子三云迁居北平；六子三毅，迁郃阳县吴仁村；七子三寅（字恕轩），迁韩城并创建党家村。据此分析可知，党恕轩兄弟七人中有四人迁至外地，占当时家庭总人口数的一半，没有举家迁移并且留在营南村和营西村的父兄没有因饥馑而折损，说明旱灾对党恕轩全家的影响并未达到显著地步。

同时，比较党恕轩的迁出地朝邑和迁入地韩城来看，也不支持因旱灾被迫迁徙的说法。元史记载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设栎州，领韩城、合阳二县。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废州为县，二年又复设栎州，县址迁至今县城西北二十里^②。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撤栎州，改属同州，县址迁回原址。改属同州后，朝邑与韩城归同州府管辖。查阅历史地图可知，同州、朝邑、郃阳、韩城四地相邻。从党恕轩的故乡朝邑至韩城不过120千米，若遭遇干旱及洪涝灾害，则郃阳、韩城也不能避免。因此，党恕轩并非因气候因素被迫迁徙韩城。

（三）地理和生物因素

历史上，元英宗至治元年到元文宗至顺元年（1321—1330年），多灾并发的现象较为明显，当时全国旱灾、水灾、雪霜灾、雹灾、蝗虫灾、疫病、地震等数灾并发，其中江浙、辽阳、云南行省灾情较重。1330年至1332年，陕西行省史料可查的火山喷发、地震、疫病等灾害则较少，没有对社会生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因此，地理和生物因素也不是造成党恕轩迁居韩城的主要原因。

四、因家族理念为施展抱负主动迁徙韩城说

如前所述，社会、气候、地理、生物等四个因素均不是迫使党恕轩迁居韩城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党恕轩的移民行为就不是“被动”的。笔者将结合迁入地韩城概况、家族理念和心理动机、高效益生产区域的选择和人口因素，来考察影响党恕轩迁居韩城的主观因素。

（一）迁入地韩城概况

党恕轩迁居韩城时恰逢当地建立许多新村庄。依据《元史》、《新元史》、赵文林与谢淑君所著的《中国人口史》以及吴松弟所著的《中国人口史》统计，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朝户数为14002760户，估79816000人。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户数为13400699户，估84873000人^③。这37年内，元朝总人口数大幅增长，韩城也新建不少村庄^④。例如，至顺年间统

① 概况如下：一世党利，二子，长首昌（无嗣），次首中。二世首中，一子。三世羽，一子。四世锐，一子。五世焕，字慎贞，妻倪氏。

② 《元史》卷35《文宗纪》4，第781页。

③ 户口统计本身也存在一定的误差，蒙古贵族军将领们又有大量的私户，此外还有军户、匠户等均不纳入人口统计，不计入户口统计。

④ 在韩城，有许多以姓氏冠名的村庄，是同族聚落的代表类型，其发生与发展反映了整个农村聚落的兴衰变化，并可显示农村人群的聚散和分布倾向。韩城农业最早发达的是东部川塬区及丘陵区，这里村庄与人口相对密集，经济较为发达。以龙门镇、咎村乡、大池塄乡、西庄镇、苏东乡、城关镇、夏阳乡、芝川镇、芝阳乡、龙亭镇这10个乡镇为例，元代已有同族村庄85个，其中姓氏冠名村达34个，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二，相关姓氏27个。以姓氏冠名的这些同族村落在建村之初，规模均相对较小。

称许庄，明代更名独立出去产生的田许庄、雷许庄、高许庄；元至顺二年以前建村，因地处泌水河下游，河水经常干涸而得名的干谷村（因两村所处地理位置而分上下）。那时候还没有至元年间才建的史带村和至正年间建立的薛村寨。因此，党恕轩迁居韩城时，迁入地已经具备了迁入所需的空余土地，并且这里有建村所需的水源。换言之，如果党恕轩主动迁居韩城，迁入地无阻碍。

（二）家族理念和心理动机

迁入地没有阻碍，迁出地没有逼迫。党恕轩有主动迁出家乡的理由吗？从党恕轩的家庭背景来看，祖上经营商业，从事农耕，并且有读书经历。党恕轩名字中的“恕、轩”两个字，释义为“宽恕”和“高昂”，有很深的文化内涵^①。不难看出，他的父辈是崇尚文化、重视读书的人。党恕轩没有女儿，共生有四个儿子，取名君显、君仁、君义和君明。他自己给四个儿子取的名字都带有“君”字，是希望自己的后代都能成为正人君子，而四个儿子名字末尾四个字连起来便是“显仁义明”。由此可见，党恕轩继承了家族对于文化的崇尚和对读书的重视。先祖农商并举，耕不废读的理念根植于心。

事实上，这种“耕读传家”的行为，不应理解为一般的耕田和读书，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有它特定的含义。“读”字的意思是，通过诵读儒家经典接受儒家思想；“耕”字的意思是，读书以后要从事社会基本经济活动——在封建农耕社会就是归耕陇亩。在躬耕田亩的同时不忘圣人教诲，穷则修身齐家，达则兼济天下。^②

由以上分析可知，党恕轩受农商并举、耕不废读的家族理念影响，加上自己三个哥哥都迁居外地，自立门户，年轻的党恕轩自然也希望自己可以自立门户、有所作为。如果守在父母和哥哥们身边，留在家乡，是远没有迁居出去更能激励自己施展抱负的，这是党恕轩迁居韩城的情感动机。

（三）时局环境下高效益生产区域的选择

如果仅考察党恕轩迁居韩城的情感动机，而不考察其理智动机，那么难以认识其迁居韩城谋生的现实动力。元朝是一个由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为打造正统王朝的思想根基，忽必烈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修缮韩城司马迁祠墓，用正祀规格祭祀司马迁。他还重修龙门大禹庙，祭拜大禹王。《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元年七月，龙门禹庙成。赐名建极宫。”明《韩城县志》载：“建极宫蒙古字圣旨，至元十二年二月立，在龙门建极宫。”^③元朝借此为大一统的民族融合政权做理论宣传，肯定元政权建立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同时，元朝宣传发展藏传佛教，为元朝等级制度做舆论铺垫，如建立普照寺、法王庙等。元政府重视宗教的另一个表现便是允许寺院拥有大量的寺田和工役，遇天灾人祸则更加重视寺庙的祈祷功能，如元至顺二年发卫卒三千助大承天护圣寺工役^④。“壬辰，以所籍张珪诸子田四百顷，赐大承（乘）天护圣寺为永业”^⑤。因此，党恕轩根据当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选择去元朝的朝拜祭祀和教化圣地韩城谋生是一种明智之举。

元至顺二年，党恕轩初到韩城时就靠租种“赔庙”的寺田——主要是种菜，附带开荒谋生。“赔庙”，曾经位于韩城党家村西塬上，因辽国一批军马撞倒原有小庙，大辽萧太后拨库银两千两重建而得名，明时毁于火灾。庙内敬奉三皇五帝，当地方言也称其为“白庙”。据传“赔庙”规模宏大，金碧辉煌，终年香火不断，火工道人众多，有寺田两百余亩。党恕轩租种东阳湾的寺田

① 党鉴泉：《田舍郎诗联存稿》，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9年，第147页。

② 韩城市档案局编：《韩城古民居门额题字集解》，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9页。

③ 宁永泉编：《元代文化与韩城》（内部资料汇编），2016年，第154页。

④ 《元史》卷35《文宗纪》4，第778页。

⑤ 《元史》卷33《文宗纪》3，第756页。

后，短短几年便略有积蓄，随后在向阳高坡之上，即今小坡崖上方，打有三孔大土窑、几孔小土窑作为居所。不久，党恕轩娶邻村下干谷村樊姓女为妻，开始繁衍生息。

（四）人口因素是促进创业的动力

党恕轩奠定了党氏家族人丁兴旺的基础。党恕轩没有女儿，四个儿子均各立门户，称为长门、二门、三门、四门。明初朝廷实行“三屯”制（军屯、民屯、商屯），四门君明奉父命携妻率子赴甘肃河州屯田，兼营贸易。君明夫妇逝世后归葬故里原“西场”坟。据近年调查，其子孙后代在甘肃永靖县刘家峡乡盐锅峡镇繁衍发展，创立党家洼村。因四门屯田迁出，故村中无四门后裔。四子分别娶郝氏、冯氏、程氏和相里氏为妻。《陕西省韩城市地名志》记载，相里氏于金承安四年立村，元至顺年间已是当地名门。按元代门当户对的嫁娶风俗推断，党恕轩家在当时已经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积累。

到第三代，党姓全族已增加到二十多口。农商并举让家族增加了人口，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他们仍保持耕不废读的传统。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党恕轩长孙党真中举，未出仕。据《党家村党族长门家谱》，“党真因父母年迈，居家事亲。”^①实际上，不入仕与党家耕读传家的传统理念有关，党真中举后继续从事农耕活动，并将归耕陇亩的活动与党家村的发展联系起来。党真撰写了《党家村家谱序言》，不仅为子孙后代续写家谱奠定基础，而且在序言中确立了村名，提出了村落发展的初步规划。党真提出将党家村村落下迁，并界定出长门、二门、三门居住与发展区域，开启了党家村建设的序幕。党真的远见卓识不仅表现在其制定的村庄建设规划中，还体现在他留下的一篇极为珍贵的《家谱·序文》中，为后世子孙续修家谱奠定了基础。

党恕轩在元朝人口增长，自己家庭人丁兴旺时，选择迁居韩城外创业，利用当时的人口红利农商并举，奠定下党家村的第一代财富基础。同时他娶妻生子，以家族理念和自己的财富为基础，教育培养党家子孙，依靠家族人口增长带来的创造力继续巩固和发展自己创业积累的家族基业，并鼓励子孙继续创业。这个家族式的人口创业反哺循环不但使他在某些地方突破了小农经济模式发展的局限性，还让党家村得以不断壮大，这也表明人口因素是促进创业的动力。

五、结语

由于党恕轩迁居韩城的史料较匮乏，可资对照的实物又少，加之学界对党恕轩移民史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研究的空间。从实际出发，党恕轩迁居韩城的历史，也是党家村家族移民史的一部分。探究党恕轩迁居韩城的原因，不仅可以为我们研究农民迁移的原因及动机提供参考，而且也打破了以往对农民经济行为的某些认识误区。学术界的许多著作在论及小农经济时，总免不了使用“传统”“保守”“商品观念淡漠”等词语来描述农民的经济行为，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非理性经济，因为他们不懂得扩张和积累财富，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描述就是不懂得“储蓄和投资”^②。随着对党恕轩迁居韩城的动因分析和对党家村家族移民史的不断深入研究，再结合其他家族移民史的考察，笔者发现：只要能在动荡的时代里寻求一块适合的土壤，发现具有更高投资效益的生产区域，农民的储蓄和投资意愿就会像一颗种子一样在阳光雨露中茁壮成长。

责任编辑：朱家麟

^① 《党家村党族长门家谱》，手抄本。

^② 黄德海：《党家村的白银时代》，第3页。

发展问题研究

风险社会视域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空间治理策略研究

仲昭慧

(淮阴工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3)

摘要: 风险社会的到来给网络空间带来了安全隐患。当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空间已成为高风险领域。研究通过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空间风险样态分析, 以期对认清高校网络空间风险形势, 全方位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空间安全防范能力, 有效施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空间防范对策有所助益, 从而更好地规避和防控网络环境境遇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生态风险。

关键词: 风险社会;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空间; 空间安全; 防范对策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3-0109-05

风险社会给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安全带来新的更加复杂的境遇。当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空间已经成为高风险领域。据此, 全面客观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空间所面临的风险, 重视和抑制风险源头, 规避风险因素, 提升风险防范和化解能力, 对于提高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科学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风险社会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空间风险因素分析

(一) 全球化风险: 霸权主义影响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风险社会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自身活动的结果。全球化是风险社会的背景, 其发展轨迹现实表明, 生产力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给人类自身生存带来根本性威胁, 使生产力之外产生反生产力效应。换言之,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人类文明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共享, 它一方面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 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各国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资金、信息等方面的先发优势, 以不平等交换获取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巨额不当利益, 从经济、技术等方面制造东西方之间的落差。这样的现实导致高校部分大学生产生了社会主义信仰危机和思想上的不稳定、无中心现象。同时, 发达国家凭借其大国强权政治干预别国政治, 狭隘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不断侵蚀着大学生的思想认知, 影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题项目“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研究”(2019SJB671); 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苏北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研究”(20SYB-128); 淮阴工学院高教研究课题“应用型本科院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能力提升研究”(2020GJ04)。

作者简介: 仲昭慧, 淮阴工学院党委宣传部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响学生对国情和形势的判断。基于此,高校如何建立与全球化相适应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正确引导大学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自觉抵制西方腐朽意识形态的冲击,切实增强“四个自信”,坚定“四个意识”,成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临的现实课题。

(二) 市场经济风险:多元化利益主体充斥高校网络思想政治空间

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认为,“利益是思想的基础,利益决定思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①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对经济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其对于社会带来的风险不能简单地仅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政治文化。市场经济促使经济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一方面奠定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影响着师生的社会关系和思想文化意识,其实质就是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关系格局重新调整,而调整的过程和结果始终都影响着人们的认识、思想的变化,这就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在网络空间中,基于不同的利益需求,多元主体利用其多元化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影响学生对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认知,无形中使得学生物质化倾向日趋明显,而削弱了协作、团结与服务意识,产生读书无用论思想,增加了社会不和谐因素。为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利益格局调整的表面回答上,而应强化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深刻阐释,引领学生朝着正确的思想方向发展。

(三) 社会思潮风险:多元文化冲击高校网络思想政治空间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高校学生活动的物理空间转向网络空间,网络空间已经成为“高校大学生重要的聚集、活动和实践场域,网络虚拟实践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实践形式”^②。在此网络生态环境下,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在网络空间中粉墨登场,挑衅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加剧了思想领域的复杂性。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有着专门的理论和思想,标榜“去中心”“反本质”的解构主义,公开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无生命力和存在的价值,攻击别国社会制度,干涉他国政权,打着民主的旗号抨击社会主义制度,迫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边缘化。这些思潮在网络空间中肆意传播,大学生由于缺乏对网络思潮的正确辨识和分析,产生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倾向,甚至出现价值迷茫、信仰混乱等现象,这无疑给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挑战,增加了教育者进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困难。面对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种种挑战,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进行积极回应,给予有力批判,促进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四) 信息技术风险:大数据云技术带来数据拜物教风险

“数据拜物教”思维易使人们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以自然事物和自然力为崇拜对象的宗教。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类由早期对自然物的崇拜演化为对上帝的崇拜。通过所拜之物,人们实现了自我认识”^③。马克思对拜物教进行了深刻批判。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存在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三种形式。整个资本主义就是资本拜物教运作并完成的过程。技术拜物教从属于资本拜物教,它作为“物”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的大数据,其数据本身也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6页。

② 陈志勇:《网络空间治理背景下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对》,《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12期,第110页。

③ [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王大庆、刘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9页。

历了商品化的过程。从拜物教的角度来讲，其容易生成大数据拜物教，也容易导致处于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发生。这种异化一方面表现为大数据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渗透，无所不在的覆盖面使人们痴迷于大数据技术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另一方面，人们将一切事物的形态均以数据化的形式再现，甚至将其态度、情感、行为等量化为具体可分析的数据形式。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它产生的后果在于人们在数据面前盲目随从，态度绝对化，更严重的是放弃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近年来，西方国家利用大数据商品，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世价值输入我国，企图削弱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基础。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的观点来看，颠覆性的大数据拜物教，削弱了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认同的社会与个人基础，使各种传统或现代形态的对物的跪拜构成了普遍化的意识形态渗透。因此，高校必须正确认识大数据意识形态消极影响的一面，规避大数据拜物教带来的风险，抵制域外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渗透，增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安全风险的防范能力。

二、风险社会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空间风险的现实透视

（一）教育模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模式有待转换

在高校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灌输与被灌输的固化关系，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主要以校园网、两微一端等作为工具载体和平台阵地，传授的内容多为理论知识，采用的教学方法多为讲授法，受教育者则被动地接受教育者单向度的灌输，造成其对教育者灌输内容认同度不高。在网络虚拟空间内，网络阵地不断推陈出新，受教育者通过各种平台感知社会的变化，需要教育者对当前变化的社会现象给予回答。反观当下，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互动关系依然是“我说你听”的单向度互动关系。在此种教育模式下，高校网络思想教育者的静跟不上受教育者的动，两者间缺乏“同频共振”效应，目标受众一旦“下课”，主客体关系解散，直接带来的后果便是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认同度大打折扣，接受教育的实效性不高。为此，高校在网络环境境遇下要及时转变观念，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加强学生的风险意识教育，让有限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接上庞大的受教育群体，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效果。

（二）信息技术：高校大数据技术保障有待完善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呈现给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是庞大的信息流，井喷式的信息总量给高校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增加了信息获取、辨识、更新的难度和风险。网络信息的无限丰富超出了教育者管控的范围，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空间领域存在诸如个人隐私泄露、数据管理难度系数变大、网络安全漏洞频发等风险。面对海量信息涌动的大数据时代，作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教育者显得力不从心，体现为高校在网络空间技术风险应对和处置上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大数据网络技术人才较为缺乏，网络管理部门普遍存在信息管理疏漏，智慧校园建设推进力度不够等，一旦发生危机，容易导致高校不能快速从海量数据中挖掘有效信息，难以做到及时引导应对，甚至在应对网络风险时无能为力。为此，高校要善于运用大数据监控技术，进一步提升自身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推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安全开展，不断提高风险意识，强化政治意识。

（三）机制体制：高校缺乏完整的风险防控体系

目前，高校有效防范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空间风险威胁，是一项高难度、高级别的任务。当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网络空间风险和网络安全的认知尚处于感性认识阶段，特别是在防范和应对网络空间风险上更是捉襟见肘。国外的经验表明，“那些最成功的实施风险预警的学校或企业已经

把风险预警渗透和融入他们决策性、战略性和操作性活动之中。”^①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安全风险是可以预测、评估和预警的。高校要重视和抑制风险源头，做好风险的前期管理，实时监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风险，并将其纳入高校日常管理中，有效规避和预警风险要素，评估风险等级，建立预警制度，风险爆发后及时制定处置方案，将风险降低到可控的范围内。为此，充分认识和把握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表征，建设集监控、评估、预警、处置于一体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风险防控体系，是新时代规避和防范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风险的应然之道。

（四）文化渗透：高校网络文化生态环境有待优化

高校学生的生存状态越来越网络化，其网民权利意识亦随之日益觉醒，但部分学生对网络内容缺乏理性分析，在实践过程中往往会误用、恶用网络，使网络文化多样性受阻，导致网络文化生态结构失衡。一方面，网络信息的流动量和流动速度很大，有些虚假信息会混杂其中。大学生遇到一些负能量思想蛊惑时，很容易产生一些错误的思想认识，并在网络空间内发出不正确、不理智的声音，做出不正确的选择，甚至发展成群体性、极端化的情绪和行为，使网络生态陷入混乱。另一方面，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充斥着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由于高校缺乏行之有效的信息监管措施，加之大学生的思想认知呈现不成熟、不理智、不稳定特征，当受到情绪化影响时，他们可能会不自觉地随着网络舆论出现一边倒，最终沦为网络暴力的推动者和施暴者。为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要着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教育者要因材施教，有效引导网络舆论，加大网络信息的有效监管力度，切断不良信息进入高校的路径，着力保障高校网络空间的洁净。

三、风险社会视域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治理策略思考

（一）话语建设：创新高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

在现阶段，解决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安全风险的基本前提和有效基础，在于牢牢把控住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话语的本质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决定了在阶级社会中话语和权力必然要结合到一起而形成话语权，并为特定的阶级服务。”^②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深刻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统统领高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传播主流价值观念。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不断丰富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内容。教育者要主动了解和回应学生在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利益诉求，探究解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思路并将其反映在理论建设中，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来阐释网络空间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提升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和思想认同。另一方面，不断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话语表达和传播方式。高校教育者要结合网络空间意识形态传播的特点和网民心理接受习惯，综合运用视频、音频、图片、文字等表现形式，提升话语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同时，结合网络空间信息传播的及时性、互动性、共享性等特点，建立开放互动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话型传播机制，有针对性地进行内容推送，多种形式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实效，进而实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内化和行为外化。

^① 熊德明、王建梁：《高校风险管理——来自英国的认识和实践》，《清华大学德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08页。

^② 陈锡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3页。

（二）机制搭建：建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空间风险防控机制

网络境遇下，完整有效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风险防控机制，应集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处置等要素于一体。首先，加强网络空间风险监测和评估，全天候、立体式、全方位地发现和识别风险要素，收集危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风险信息，“分析信息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准确评估好预测危机的所属类型和可能危害的程度，并尽可能找到风险的源头”^①，递交给高校管理决策层。其次，制定风险防控应急预案。有效的风险防控应急预案，可避免风险传播的转化升级，有效缩短网络空间风险响应的周期，遏制风险的肆意传播与蔓延。最后，建立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建立一整套科学有效的处置流程，利用大数据技术，挖掘事件潜在信息，精准探寻风险源头，力争将风险的危害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建立高校网络空间风险事后评估与反馈机制。高校要建立一支大数据人才保障队伍，研究成立大数据网络研究分析中心，建立较为完整的网络风险数据库，通过数据完整记录风险运行的全貌。在对网络事件处置后，要及时对风险危害进行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尽快从风险中恢复正常。

（三）课程开发：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慕课”+“微课”

在开放的网络环境里，作为教育主渠道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须按照网络信息传播的规律，利用网络技术平台优势，构建“慕课”+“微课”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一方面，“慕课”的优势在于实现了物理空间向网络空间课堂的转化和升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网络空间中的正式课堂。它涵盖完整的教学计划、教学视频课件、课程交流论坛、随堂测验与章节测验等部分，并把这些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实现了传统课堂的网络化。为了提升“慕课”的运营效果，高校可以以协同的方式，联合校内、社会、科研机构、企业等力量，借助互联网技术平台优势，多渠道进行“慕课”精品的开发与运营。另一方面，高校要推动课程的个性化建设，打造多样的“微课”。微课是以微型教学视频为载体，针对某个学科知识点而设计开发的一种情景化的新型在线网络视频课程。它以短小精悍、表达方式多样化等著称，是“慕课”的搭档，能够对“慕课”未能阐释的部分进行补充说明，并实现优势互补。为此，多渠道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帮助教育者实现线下课堂的网络实体化，在网络空间内将一整套的思想政治理论完整、系统地传授给学生，实现育人的教育目的。

（四）环境建设：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空间生态圈

有效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离不开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圈。在良好的网络环境里，教育者可以利用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种传播载体，宽角度地使学生学习和接纳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内化为自身的行动力量。一方面，加强网络生态文化环境建设。高校要充分利用校园网和两微一端等平台，整合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引导学生知晓思想政治相关内容，升华学生的思想境界和道德素养。同时利用网络监管技术，协同地方执法部门，清除网络违法赖以生存的空间与土壤，严厉打击网络违法行为，维护网络空间的道德纯洁性。另一方面，改善高校网络思想道德教育环境。高校要加强网络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建充满正能量、和谐的网络环境。要彻底清除网络空间有害内容，特别是色情、暴力等网络污垢，净化网络语言环境，减少网络语言对汉语的污染，防止暴力语言、过度吐槽等现象，多传递正能量，限制网络语言任性程度，正确引导学生的网络情感表达，共同构建良好的网络环境。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魏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风险预警体系建构初探——基于网络境遇的思考》，《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88页。

脱贫攻坚视阈下边疆民族地区传统乡村 现代化路径研究

——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传统乡村为例

李亚强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 脱贫攻坚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中国长期扶贫工作的理论和实践, 根据中国已经变化了的国情、民情、贫情做出的战略决策, 旨在通过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从根本上解决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 彻底消除中国大地上存在多年的绝对贫困人口问题。通过积极动员各方力量, 运用各种手段, 坚持大扶贫格局, 协同推动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决定性进展。在中国已经变化了的社会主要矛盾下, 用超常规的手段和方法加快推动边疆民族地区传统乡村的现代化进程, 运用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延伸现代化中国地域治理的边界, 加快解决我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步伐, 补齐短板弱项, 释放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 释放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潜藏的人口红利, 加速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 助力我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①。本文在脱贫攻坚的视阈下, 看待和分析我国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传统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现状、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并就其后续现代化路径进行探讨。

关键词: 脱贫攻坚; 边疆民族地区; 传统乡村; 现代化; 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0)03-0114-07

消除贫困现象, 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自阶级社会形成以来, 由于社会分工的客观存在, 不同群体的人们必然会从事不同的分工, 隶属于不同的阶级, 因为“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②。分工的规律, 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差异, 导致了城乡、工农、脑体三大差别的出现, 导致了贫困现象的长期存在, 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后, 生产力的大发展、科技的大进步进一步加大了不同区域间发展的差异性, 从而出现了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的区域性整体贫困、绝对贫困现象。如何对贫困情况进行精确掌握, 进而为政府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依据等问题成为困扰每一个现代国家的共性难题。

作者简介: 李亚强,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人类社会发展理论。

^① 王政淇, 宋子节:《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习近平这样阐述新发展格局》, 2020年7月22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0/0722/c1001-31793969.html?form=rect>, 2020年9月27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 第439页。

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边疆民族地区传统乡村的现代化难题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和文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①。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共产党和其带领下的中国人民进一步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自信，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现实这一目标，必须不断补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短板弱项，优化结构，配置资源，着重解决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绝对贫困现象，建成惠及全体人民的高水平、高标准的小康社会。

我国的经济发展呈阶梯性，其基本面貌与我国的地理阶梯有很大的重合性，基本呈现出东部发展程度高，中部次之，西部再次之的发展规律。边疆地区，特别是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传统乡村，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于一体，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短板中的短板。边疆民族地区的传统乡村由于历史和现实多重因素的制约，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诸多欠账，短时间内难以弥补，特别是现代化的快速推进，进一步加剧了发展的差距。从社会发育的整体程度来看，边疆民族地区的传统乡村社会发育程度偏低，传统的甚至是封建的因素仍在某些地区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制约着该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国家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为政府管理者提供了更加科学、合理、高效的国家管理工具，延伸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边界。中国经济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压缩了贫困的存在空间和范围，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已经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整体贫困局面彻底扭转，现阶段的短板和弱项聚焦在如何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和小范围的绝对贫困问题。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要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略攻克横亘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道路上的重大障碍，彻底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多年的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难题。

云南省在我国边疆省份中有很大的特殊性。一是地理位置特殊。云南位于中国大陆西南端，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其中山地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88.64%^②，特殊的地形限制了云南省产业发展的现代化、规模化程度，极大地制约着云南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云南的传统乡村来说，人地矛盾尤为突出，“这样的资源禀赋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各地都像欧美那样搞大规模农业、大机械作业”^③。二是民族成分多样。在云南省，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特别显著，“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16个跨境民族、15个特有民族、8个人口较少民族”^④。多民族的社会成员结构使得云南省民族、宗教、边疆问题交织，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和难预见性。三是生态环境多样且脆弱。从地理位置看，云南处于低纬度区域，本应该形成亚热带气候类型，但由于云南海拔起伏多变，在云南范围形成了立体化、多层次的特殊气候分布，“在一个省区内，同时具有寒、温、热（包括亚热带）三带气候”^⑤。多样化的气候类型形成了多样化的生态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8页。

② 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网上新闻发布厅：《云南省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工作和公报新闻发布会》，2020年8月26日，http://www.yn.gov.cn/ynxwfbt/html/2017/zuixinfabu_1020/501_2.html，2020年9月27日。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259页。

④ 蒲跃主编：《云南民族关系和谐研究》，北京：开明出版社，2016年，第244页。

⑤ 云南省人民政府：《云南概况：气候特点》，http://www.yn.gov.cn/yngk/gk/201904/t20190403_96257.html，2020年9月27日。

环境,云南因其独特的自然禀赋,“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宝库’‘香料之乡’‘天然花园’的美誉”^①。云南虽然具有多样化的生态环境,但其生态同样非常脆弱,一旦破坏难以恢复。高原明珠——滇池,从20世纪90年代受污染程度不断加剧,生活污水、工业废水不断注入滇池,使滇池水体的富营养化程度越来越高。1996年和2003年,滇池两次爆发蓝藻,水质一度下降到劣V类,污染触目惊心。此后,云南省政府、昆明市政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始了为期十多年的滇池净化工程,仅2018—2019年,治理滇池累计投入资金137.69亿元^②。滇池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治理之路仍然漫长。滇池治理是云南生态环境脆弱性的一个典型事例,举此例旨在说明鉴于云南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一旦发生生态破坏,投入的治理成本是相当巨大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不可逆的。四是边疆民族地区传统乡村的贫困问题。云南是我国“贫困面最大、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③的省份,这决定了云南省开展脱贫攻坚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好脱贫成效,对于云南打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考察云南时指出,云南要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④。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云南的发展就是要立足已有的实际,走出一条与全国其他省份不同的发展路子。就云南的特殊性来说,其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势必与其他省份不同,云南特有的民族构成、特有的生态环境、独特的区位优势使云南具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要完成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要杜绝“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用新时代视野和思维方式破解云南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

相较东部沿海省份,云南经济社会的发育程度偏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现象较为明显,特别是云南省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大。但分散于云南传统乡村的可转移劳动力资源丰富,待开发的区域市场广阔,基础设施等方面发展潜力巨大,潜藏在云南传统乡村中的生产力规模庞大,这些因素都为云南经济社会的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云南生态潜力巨大,动植物资源、水力资源、地质资源丰富,气候呈现立体式分布,这些要素都为云南发展高原特色农业、产业提供了必要条件,云南完全可以借此打造自己的生态旅游基地、动植物研究基地、高原特色农产品培育基地,“打好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这‘三张牌’”,以良好的生态环境换取经济社会发展的巨额生态红利,并将其转化为经济优势。云南可以以和谐团结进步的民族关系,良好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抓手,开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

二、脱贫攻坚:加速推动云南民族传统乡村的现代化进程

2015年11月《决定》发布以来,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脱贫攻坚的高潮,各种制度安排和项目资金第一时间覆盖到攻坚地区。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起的脱贫攻坚战,是史无前例的民生工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不断增长,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

① 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 组编:《新发展理念与云南跨越式发展案例》,昆明:云南出版集团、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5页。

② 云南省人民政府:《昆明全力打好滇池保护治理三年攻坚收官之战》,2020年7月26日, http://www.yn.gov.cn/ywdt/zsdt/202007/t20200726_207952.html, 2020年9月27日。

③ 陈豪:《奋力谱写中国梦的云南篇章》,2020年1月1日,《求是》2020年第1期,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1/01/c_1125402712.htm, 2020年9月27日。

④ 陈豪:《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2018年6月5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605/c40531-30037109.html>, 2020年9月27日。

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后续的发展中将差距逐渐拉大。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新华社发布一条新闻标题为《70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超170倍》的文章，指出“当今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外资流入国”^①。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990865亿元”^②。

中国经济体量的持续稳步增长，为中国经济转型，为调整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为开展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但全球性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因素仍然存在。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的爆发及蔓延，更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外部环境的日趋严峻，一方面需要我们以更高的智慧来应对和化解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进一步调动和发展内部的潜力，补齐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利用全球经济发展调整期的空档，不断优化自身结构，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③发展格局。

稳定的内外部环境，科学的制度设计，坚强的领导集体，勤劳的人民，为中国积蓄了巨大的经济动能，使得在新时代中，我们可以有能力和实力完成那些以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难以实现的国家战略。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响了脱贫攻坚战。云南以脱贫攻坚为契机，先后出台多个文件支持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从政策、资金、人员、项目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保障。几年来，云南省脱贫攻坚成效显著。省扶贫办数据显示，“到2019年年底，全省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累计脱贫61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5年的14.03%降低到2019年的1.32%”^④。根据省扶贫办对2020年上半年云南脱贫攻坚情况的掌握和研判，认为云南省剩余未脱贫人口已达到脱贫退出标准，为年内完成剩余未脱贫人口的清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云南人民与全国人民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筑牢了根基。

云南是边疆民族省份，由于历史及现实因素的制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不少短板弱项，在省内不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突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要补齐这些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时针对云南的实际情况指出，云南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⑤。脱贫攻坚的开展，正是以超常规的手段和方式，加快推动云南的现代化进程。在脱贫攻坚中，加快推动落后地区的发展，在产业、生态、乡风、治理、生活等方面重塑云南发展新面貌，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调整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用大保护代替大开发，发展高原特色产业，实现云南产业发展的大转型，推动云南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布局，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守住云南的绿水青山，创造云南未来发展的金山银山。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70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超170倍》，2019年9月21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9/21/content_5431979.htm，2020年9月27日。

②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2020年9月27日。

③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8月25日，<http://www.12371.cn/2020/08/25/ARTI1598310923548272.shtml>，2020年9月27日。

④ 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云南：交出高质量答卷》，2020年8月31日，<http://ynfp.yn.gov.cn/f/view-8-3ac37e0d2b32417dab49f3b6a3a8dc44.html>，2020年9月27日。

⑤ 陈豪：《奋力谱写中国梦的云南篇章》，2020年1月1日，《求是》2020年第1期，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1/01/c_1125402712.htm，2020年9月27日。

三、云南已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提升脱贫成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脱贫攻坚战进行到今天，特别是通过国家脱贫攻坚第三方验收、通过国家脱贫攻坚普查的地区，应该说这些地区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消除了困扰这些地区多年的难以根除的绝对贫困问题，脱贫攻坚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从长远来看，在脱贫成果巩固、脱贫成效提升方面，已脱贫地区后续发展仍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部分群众内生动力难以激发。推动事物的发展，内因是根本，是关键，是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而外因只是起到推动、辅助、催化的作用，外因要通过内因来发挥作用。在脱贫攻坚过程中，要着重处理好主客体、内外因的关系，注重并善于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将“引入式”扶贫扭转为“走出式”扶贫，调动尽可能多的贫困群众参与到脱贫攻坚工作中，从而从根本上扭转部分贫困群众“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①的心理状态和生活姿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众参与是基础，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努力激发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反对党委政府大包大揽，项目、资金的安排要尊重当地群众的实际需求，合理安排部署。

二是产业发展动能不足。要实现已脱贫地区的稳定脱贫，离不开后续产业的持续拉动。传统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产业模式普遍存在小而分散、多而雷同、政府主导、产销脱节、标准多样等特点。乡村特色产业多为粗放式、简单加工、家庭作坊式的发展模式，呈现生产化、机械化程度低，卫生条件差、生产工艺低劣、产品市场认可度低的特点。特别是在未经充分调研，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的情况下，就盲目发展的产业项目，产品往往与市场脱节，抗风险能力弱，极易失败，挫伤群众的参与积极性。

三是脱贫成效难以巩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现行扶贫标准，既不拔高，也不降低。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存在尺度拿捏不准的现象，多种扶贫指标不仅复杂而且其中的部分指标存在难以量化的问题。在已经脱贫退出的贫困群众中，存在部分群体是通过政府兜底保障实现脱贫退出的。换言之，这部分群体的脱贫是依靠绝对的政策红利实现的脱贫。有关研究显示，该群体的构成基本为老弱病残孤，而且该群体的数量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随着脱贫攻坚的不断深入，乡村振兴的逐步开始，国家划定的贫困线也在逐年调整。由此，要在扶贫开支中考虑投入的“红利式保障扶贫资金”数额也会不断增长，呈现高位运行，加大各级政府的财政负担。一旦资金不足，已脱贫地区可能会出现一定范围内的返贫现象。

四是后续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中国有句俗语“要想富，先修路”，讲的就是一个地区的发展首先要解决与外界的交通问题。脱贫攻坚任务繁重的地区，同时也是我国交通闭塞的地区。在脱贫攻坚的指标中要求打通贫困村（行政村）与乡镇的陆路交通，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但贫困村（行政村）各村组间的硬化路并没有全部实现。要打通这一“经济大道”存在一个投入和产出的比例问题，打通这些“经济大道”是否真的可以给贫困地区的快速发展带来机遇，还有赖于与其他诸多关联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在道路的另一端不一定存在可资交换的有价值的产品或资源，等等。要疏通这些扶贫道路、经济脉络上的“毛细血管”，不仅需要巨大的投资，还要处理好道路沿线开发建设与自然环境资源保护的关系。

五是部分群众观念落后，传统生活生产方式难以转变。边疆民族地区的传统乡村，特别是地

^① 刘成友：《摒弃“等人送小康”的脱贫心态——如何扫除“脱贫攻坚战”障碍》，2015年12月15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5/1215/c1003-27928309.html>，2020年9月27日。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40页。

处偏远山区的传统乡村，其闭塞性导致封建的、小农式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长期发挥影响。由于与外界接触交往有限，半自给自足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仍将长期存在。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使得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蓄养着一定规模和数量的家禽、家畜，用于日常生产、食用及运输等。为了维持生活，人和用作生产、运输功能的牲畜都艰辛地生活在该区域。疲惫的人以及成规模、不断运动的牲畜、家禽，从主客观方面致使村容村貌、环境卫生难以保持。近年来，各方扶贫力量深入到脱贫一线，使得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发生巨大改变，但特定地区的社会意识在短时期内难以实现根本性扭转，从而在精神层面出现“错位”，具体表现为部分贫困群众的自强、诚信、回报国家社会的观念有待加强，其认为自身的贫困是外部原因客观造成的，要求帮扶力量必须解决自己所有的难题和困境，缺乏自立自强的精神和诚信、回报的观念，造成了不良的示范作用和恶劣的社会影响。

四、持续拉动云南已脱贫地区后续发展的“四驾马车”

我们的脱贫攻坚战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除了一些特定的必须要解决的刚性指标外，仍存在一些需要久久为功的柔性指标。脱贫攻坚战不但要打得赢，而且要将脱贫成果稳住，还要使脱贫成效能持续。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4月在重庆考察时，在“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将脱贫攻坚工作中的问题概括为三类：“直接影响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实现的问题、工作中需要进一步改进的问题、需要长期逐步解决的问题”^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鲜明指出了脱贫攻坚中各种指标的定位，简单地说就是轻、重、缓、急四个层次。目前，刚性的指标都已经达标，例如“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但是仍存在一些需要长期持续发力的指标，如产业发展、移风易俗等。因而，贫困地区脱贫后的一个时期里就是要聚焦解决那些尚未完全达标的柔性指标。对于如何实现已脱贫地区的持续发展，进一步释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也可以将其称为持续拉动已脱贫地区后续发展的“四驾马车”。

（一）不断改善和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改善和解决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这些地区在道路、通信等其他公共设施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从时空上缩短和便捷了贫困地区与外界的交流，对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总体来看，云南的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交通方面取得了巨大发展，创造了“一步跨千年”^②的奇迹，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处于弱势地位，在公共基础设施的等级、数量等方面仍存在不少短板。要解决贫困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就必须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疏通好这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动脉”和“毛细血管”。

（二）不断发展好各层次的教育，特别是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级教育

贫困地区发展受限，有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也有微观的人的因素。对于某个贫困地区而言，微观的人的因素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的发展，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各阶段、各层次优质的教育。目前，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均等化，更多的体现在硬件的均等化上。在不少乡村，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硬件设施的完备与城镇相比完全不逊色，有的乡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软件方面，特别是在师资力量方面，乡村就显得尤为不足。乡村

^① 习近平：《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2019年8月15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815/c64094-31298180.html>，2020年9月27日。

^② 陈豪：《奋力谱写中国梦的云南篇章》，2020年1月1日，《求是》2020年第1期，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1/01/c_1125402712.htm，2020年9月27日。

长期以来教育教学发展的滞后性,使得身处其中的人们难以通过优质的教育走出去,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贫困的代际传递。教育更像是为社会生产产品,难以保障优质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级教育,就很难使更多的孩子接受高级教育、高等教育。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为贫困地区发展培养和储备更多的人才,就必须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的扶持,特别是在教育过程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初级教育。

(三)因地制宜,发展经过科学论证的、规模适度的、群众广泛参与的、市场前景较好的、经营风险较低的、企业与合作社联合经营的、规模适度的产业

已脱贫地区的后续发展,最管用、最根本、最长远的就是发展适合当地的产业。云南多山地、丘陵的地形不适合发展大规模的种养殖业,但多样化的气候类型、多层次的地形适合发展经济附加值高的高原特色农业。应立足当地实际,运用大数据平台进行分析,建立区域性的农业生产分工和布局,打破小而分散、多而雷同的发展格局,尽可能地为农户规避市场风险,用产业化的思维、工厂式的运作发展农业,将产业链末端向乡村前移,将传统农民向农业产业工人转化,就近解决务工需求,在产业发展中扭转农民的社会身份,将其逐渐转化为农业产业工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四)持续发动贫困地区群众外出务工与就近务工相结合

从效率和效果来看,巩固脱贫成果和提高脱贫成效最直接的手段和方式就是动员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外出务工、就近务工。贫困群众可以在务工的过程中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学习技能、增加收入、提高认识、转变观念等,是一举多得的收益。在务工过程中,尽可能实现稳定地走出去,一方面实现自身社会身份的转变,完成农民向工人等其他身份的转变,同时也可消减贫困地区医疗、养老、婚娶等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地区城镇化水平,逐步打破城乡发展不平衡局面,消除城乡发展差距。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自社会分工形成以来,人类社会形成了城乡、工农、脑体三大差别,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具体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消除三大差别给经济社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和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的不充分。”^①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起了脱贫攻坚战的总动员令,在脱贫攻坚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的攻坚目标。其实,脱贫攻坚最大的目标不仅仅是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的问题,而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加速推动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传统乡村的现代化进程,旨在解决中国社会已经变化了的基本矛盾,进一步释放中国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和经济社会发展潜力,为中国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实基础,这是一项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参与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旷世伟业。

当前,全体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昂首阔步、勠力前行在“两个一百年”的伟大征程中。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一伟大历史征程中,我们既是亲历者,也是见证者。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仍将继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责任编辑:罗雷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255页。

云南统一战线智库加入云南新型智库联盟

经云南新型智库联盟理事会2020年第一次会议研究批准，云南统一战线智库成为云南新型智库联盟大家庭的一员，截至该次会议，云南新型智库联盟已有36家成员单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可以说是一个大智库。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同志强调，要加强理论研究和智库建设，为新时代统战事业提供理论支持和智力支撑。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也指出，具备条件的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可以建立统一战线智库，开展统一战线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

云南统一战线智库成立于2020年4月，由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共同发起。智库在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的领导下，有效整合统战系统内外资源，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学院作为统一战线人才培养基地、理论研究基地、方针政策宣传基地的重要作用，全面服务大统战工作格局，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支持。智库成立的宗旨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研究和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我省统一战线事业发展，突出战略性研究，强化运用性研究，积极探索我省统一战线各领域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破解之策，扎实推进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努力推出更多对统战工作有实践指导意义、对党委和政府决策有参考价值的理论和政策成果，更好地服务新时代云南统一战线工作创新提质增效。

作为智库依托单位，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长期致力于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的教学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近年来，学院共主持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上科研项目28项，公开出版专著、学术论文集15部，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48篇，获省级及以上科研奖励13项，已经成为我省统战理论研究的主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

（供稿：杨松禄 责编：罗雷）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季刊, 1999年创刊)

2020年9月 第3期(总第87期) 第22卷

主管: 中共云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主办: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印刷: 云南省人大机关印务中心
发行: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地址: 昆明市五一路221号
邮编: 650031
电子邮箱: ynsyxbbjb@163.com

ISSN 1671-2811
CN 53-1133/D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Quarterly, Started in 1999)

Sept. 2020 No.3 (Sum.87) Vol.22

Responsible Institution: United Front Department of the
CPC Committee of Yunnan Province
Sponsor: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Printed by: Printing House of General Office of Yunnan
People's Congress
Distributor: 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Address: No.221 Wu Yi Road, Kunming City, PRC
Post code: 650031
E-mail: ynsyxbbjb@163.com

广告经营许可证: 5300004000090
出版日期: 2020年9月20日

ISSN 1671-2811



9 771671 281203

定价: 9.00元